

2004年3月號

批判與再造

5

台灣的高等教育改革與市場化
教育市場化，肥了哪些人？（上）

批判·進步·解放

反全球化運動中的兩條路線——MR 2004與WSF大會親歷記

嚴寒未摧傲霜枝——訪RCA自救會黃春窈女士

熱極之爭不歇，台灣民主鞏固之日

學術界有人爭著賣國

前車之覆 後車之鑒——一位美國學者對蘇聯解體原因的分析

為全人類的解放而奮鬥！——美國人陽早、寒春：一輩子做中國牛郎

向陽早寒春同志學習

霜降（五）

從文學看二二八真相

革命詩抄

若水堂
water-like

gaming@waterlike.com.tw
www.waterlike.com.tw
www.waterlike.com.tw

我們販賣知識

全台最大最專業大陸圖書專賣店

文學、藝術音樂、歷史地理、哲學宗教、社會科學
商業、醫學、理工、生活、影音產品..

最新消息

東海店：供應最新圖書及影音產品
中原店：2002年11月開始試賣
高雄店：2002年11月開始試賣
成人店：2002年11月開始試賣

若水堂書店，歡迎您的蒞臨
或經由若水堂網路書店訂購

bookstore

東海店
台中縣龍井鄉中港路100號1樓
TEL: (04) 263-2200 FAX: (04) 263-2201
高雄店
高雄市多雅區林敏街1號1樓
TEL: (07) 531-8888 FAX: (07) 531-8888

成人店
台南市東門路一段100號1樓
TEL: (06) 231-0000 FAX: (06) 231-0008
中原店
中壢市大正路100號1樓
TEL: (03) 261-8890 FAX: (03) 261-8893

>> 台灣焦點

01 台灣的高等教育改革與市場化

■侯念祖

11 教育市場化，肥了哪些人？（上）

■張戡

>> 全球化批判

17 反全球化運動中的兩條路線

——MR 2004與WSF大會親歷記

文■金寶瑜 / 圖■苦勞網 提供

>> 社會現場

【RCA職工系列專訪之四】

23 嚴寒未摧傲霜枝

——訪RCA自救會黃春窈女士

訪問■杜繼平 / 整理■林育群

>> 時局評論

29 統獨之爭不歇，台灣民主無鞏固之日

■張懷思

>> 大陸形勢

31 學術界有人爭著賣國

——在烏有之鄉書吧的講座【2003年9月20日】

■左大培

>> 國際視野

38 前車之覆 後車之鑒

——一位美國學者對蘇聯解體原因的分析

演講■大衛·科茲 / 整理■任大海

>> 歷史檔案

42 為全人類的解放而奮鬥！

——美國人陽早、寒春：一輩子做中國牛郎

■李彥春

48 向陽早寒春同志學習

■《環球視野》編輯部

50 霜降（五）

——顏世鴻的回憶錄

著■顏世鴻 / 編註■藍博洲

>> 文化廣場

57 從文學看二二八真相

選註■曾健民 / 藍博洲

61 革命詩抄

譯■鍾喬

歡迎捐款贊助

郵政劃撥帳號：19803670

帳戶：批判與再造雜誌社

零售	90元 / 本	
訂閱	台灣地區（一般訂戶）	一年 1,000元
	（榮譽訂戶）	5,000元
	歐美地區	一年 50美元
	大陸、港、澳地區	一年 40美元
	亞洲地區	一年 45美元
【美金支票請寫明 Pay to Huang Te-Pei】		

發行人 范振國
 社長 黃德北
 總編輯 杜繼平
 執行編輯 陳乃慈 宋文揚

發行所 批判與再造雜誌社
 社址 台北市羅斯福路三段284巷12號
 編輯部 台北縣新店市德正街27巷29弄60號3樓
 電話 (02) 8914-7520
 傳真 (02) 8914-7520
 電子信箱 critra99@yahoo.com.tw

北市建商商號092字第255400號

台灣的高等教育改革與市場化

■侯念祖

從九〇年代之後，不斷攀高的高等教育學費（參見表1）〔註一〕，開始成為各項教育事務中引起關注的焦點之一，同時也因此引發過幾次的「反高學費運動」。我們不能孤立的來看待或譴責學費逐年走高的趨勢，這個趨勢正是近十年來所謂「教育改革」的一環，而且，同時，這個所謂的教育改革也不是孤立地、僅僅只在台灣發生，它亦趨於國際上的共

同脈絡與發展，亦即，在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擁護者的鼓吹下，世界各國的教育改革也都具有共同的特徵與趨勢。

高等教育市場化改革的國際概況

自一九八〇年代末至一九九〇年代初，以世界銀行（World Bank）為代表的新自由派經濟學者，即在第三世界國家鼓吹高等教育的

表1：台灣高等教育學雜費近十年調漲一覽

學年度	學雜費（元）		學年度	學雜費（元）	
	公立	私立		公立	私立
82	30,512	88,488	88	47,584	99,264
83	30,512	88,488	89	51,954	103,950
84	34,112	92,088	90	54,210	103,994
85	37,902	94,778	91	55,692	103,986
86	41,680	94,778	92	56,832	104,082
87	46,246	99,972			

（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不含技專院校）

註一：若以82學年度為基準，至92學年度大學院校學雜費之調幅為：私立大學為17.6%，公立大學則高達86.2%。公立大學院校之調幅遠高於私立院校，主要在於這項（與國際趨勢相同的）高等教育改革，主要計畫之一就在於公立教育系統的改造，這一部份將在後文中討論。

改革〔註二〕。世銀所倡導的改革方案主要是在於縮減政府對於高等教育的支出〔註三〕（美其名為「放權」），並要求高等教育必須具備效能、回應經濟與社會的需求（亦即在經濟上有較高的投資報酬率——在市場效用的觀點下），同時主張教育系統的私有化與市場化。

在世銀的鼓吹與第三世界政府的配合實施下，第三世界的教育幾乎因此完全崩潰：例如，在阿根廷，文盲的人口比例在1996年回升到14%，與過去的數字相比，1970年這項比例是7.4%，1980年則為6.1%；而在初級學校中的輟學率，全國平均為35%，在一些省分，甚至高達70%左右；十五歲以上的人口則有35%從未完成基礎教育；大學中教師的薪資維持低水平，並以有價值的研究成果（以對於市場的貢獻來評價）作為誘餌，來作為其薪資的主要補充部分，而使得大學教師失去對於教學的興趣與動機，而專注於「有價值的」研究，從而造成大學中教學品質的嚴重低落；另外，在各項測驗裡，基礎教育中的學生成績普遍低落，政府卻以處在惡劣的工作條件中的教師作為歸咎之對象，進一步鎮壓各個教師工會或協會的對抗行動（Puiggros, 1996）。

除了在第三世界之外，西方已發展國家也

在八〇年代所興起的新自由主義的潮流中進行高等教育的市場化改革。例如，在美國、英國和德國，市場化的做法和私有化的財政紀律也成為左派政黨的政治綱領——而這些長期以來都是保守政黨的標誌（Johnstone, 2003）。1980到1990年，美國大多數州的公立高等學校學費快速增長（整個八〇年代上漲了49%）；1997年英國工黨執政，英國卻成為第一個將高等學校收取學費作為政府政策的歐洲國家〔註四〕；德國社會民主黨在1999年重新執政之後，並未重申原來在高等教育總綱法（Higher Education Framework Law）所保證的，德國學術性中學畢業生免費接受高等教育之條款（ibid.）。

高等教育市場化改革下的台灣

以上僅是很簡略的說明了在新自由主義的進攻下，國際之間高等教育市場化改革的一些狀況，並特別指出其在第三世界所造成的災難性後果——其尤其值得我們警惕。

以新自由主義的鼓吹作為意識型態基礎和更為廣泛的背景，不僅是教育，台灣的市場化與私有化改造，也同樣展現在其他領域，例如，公營事業。1989年，台灣正式開始啟動公

註二：這個高等教育改革的計畫，也是國際貨幣基金（IMF）對於第三世界債務國進行所謂「結構調整計畫」（SAPs）的一環，結構調整計畫要求第三世界債務國必須縮減國家的教育公共支出，以便能有較高的償債能力。

註三：世銀的主要（表面）理由為「公平性」，亦即，世銀專家認為高等教育主要是為較富裕者所享用，因此，為了公平性，應縮減高等教育的支出，而建立起一般人都可接近（access）的較完善的基礎教育系統。然而，事實上，在經濟緊縮以及政府對於基礎教育支出並未因此增加的情況下，這些第三世界國家的基礎教育卻未因此獲得利益，反而瀕臨崩潰邊緣。對照台灣，一個有意義的現象是，世銀在第三世界倡導高等教育改革仍以基礎教育所能達成的「公平」目的作為藉口；但在台灣，似乎連這個表面功夫都可以略去不做。依據教育部的統計，從民國82到91會計年度，在中央歲出中，教育部的預算數用於國民教育的支出，共計減少了137.8億元！尤其令人可議的是，在這十年中，台灣卻恰好在進行著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國民教育課程改革！一方面進行著大規模的課程改革，一方面卻又大幅減少投入之預算，這項課程改革的成敗，恐怕是可以預期的了。

註四：2003年1月，英國政府宣佈，到2006年學士學位的學費為現行標準的3倍左右。

表2：台灣公營事業私有化概況

公司名稱	完成私有化時間	公司名稱	完成私有化時間
中石化公司	83年6月20日	台汽公司	90年7月1日
中工公司	83年6月22日	台機公司製造廠及公司本部	90年11月19日
中鋼公司	84年4月12日	中興紙業公司	90年10月16日
台機公司鋼品廠	85年5月20日	唐榮公司運輸處	91年8月1日
台機公司船舶廠	86年1月10日	唐榮公司公路車輛事業部	91年9月1日
台機公司合金鋼廠	86年6月30日	唐榮公司鋼鐵廠	91年9月1日

(資料來源：經濟部國營會)

營事業私有化的腳步，至今，已完成私有化轉移的公營事業如下（參見表2）：

和國際上其他國家相對照，台灣各項改革的市場化與私有化腳步可以說是亦步亦趨，同時這些又是在台灣自身的政治經濟脈絡下所發展、並取得正當性基礎的。1980年代中期之後，台灣的反對運動論述主流逐漸形成一套「國家vs.民間社會」的說法。這套論述就是，簡而言之，國家所代表的是權力的集中化、官僚化與非民主，而「民間社會」則是分權（decentralization）或多元、活力（或效率）與民主（或自主）；事實上，由於刻意忽略了「民間社會」中的階級（利益）分化，因此，便（刻意或無意的）無視於在向國家（或國民黨政權）爭權的過程中，明修「自由」與「人民」之棧道，卻從陳倉暗渡了「市場」與「私有資本」這兩項做法，並藉此連結了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型態，協助其取得道德與論述上的正當性，開展出爾後的一系列「改革」。

上述所略微提及的公營事業私有化是一例，而後來所謂的「十年教改」更是此一意識型態實踐下的產物。因此，對於教改的批判，

並不能僅僅著迷於各種枝節的方案辦法，而必須將其置放在此一更為寬廣的脈絡下來予以適切定位，並尋求應對模式。

1993年〈大學法〉第四次修正，可以視之為台灣高等教育市場化改革的啼聲初試。在這次的〈大學法〉修正中，關於界定大學宗旨的〈大學法〉第一條內容經修正成為：「大學以研究學術，培育人才，提昇文化，服務社會，促進國家發展為宗旨。大學應受學術自由之保障，並在法律規定範圍內，享有自治權。」〔註五〕。原先宗旨被界定為「以研究高深學術養成專門人才為宗旨」的大學，在此次修正中，其宗旨加入了「服務社會、促進國家發展……並享有自治權」，表面上看來，這個修正後的宗旨似乎冠冕堂皇，但其正是呼應了世界銀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者）的高等教育觀點：享有自治權即為「放權」（devolution，或可稱之為「分權」[decentralization]、「自由化」、「去管制化」[de-regulated]等），而「服務社會與促進國家發展」事實上則是回應經濟和市場的需求。除此之外，亦放寬了大學設立的標準，以「各大學之發展方向及重點，

註五：修正前該條條文為：「大學依中華民國憲法第一百五十八條之規定，以研究高深學術養成專門人才為宗旨。」

由各校依國家需要及學校特色自行規劃，報經教育部核備後實施，並由教育部評鑑之」（修正後的〈大學法〉第四條），來回應市場對於大學的需求。

大學院校的快速擴充及其性質

〈大學法〉經修正後，台灣的高等教育從此產生了質與量上的雙重變化。首先，由於大學設立的標準放寬（政府的管制放鬆），在量上，自82學年度到90學年度，台灣的大學院校（大學與獨立學院）校數急速的增加（見表3）。

從表3我們可以發現，在將近十年間，台灣的高等教育校數有著非常快速的增加，自82學年度至90學年度近十年間，整體增加比例為264%，增加了兩倍多，而其中私立學校校數在放寬大學設立標準以回應經濟市場的需求下，增加比例更高達369%（公立校數增加比例約為200%），增加的比例幾乎為3.7倍；公私立大學院校比例從1.22:1逆轉為1:1.7。由這個數字中，我們可以看出私有部門已取代公共部門，而成為台灣高等教育的最主要提供者。

除了校數的快速增加之外，大學就讀人數

的增加也十分快速，下表即是自82學年度至90學年度大學生人數及入學錄取率的一些狀況（參見表4）。

從表4中我們可以看到，自82至90

表3：82-90學年度，大學院校擴增概況

學年度	獨立學院	大學	學年度	獨立學院	大學
82	30(15)	21(8)	87	45(23)	39(18)
83	35(18)	23(8)	88	61(36)	44(23)
84	36(18)	24(8)	89	74(50)	53(28)
85	43(22)	24(8)	90	78(55)	57(30)
86	40(19)	38(18)			

（括弧內為私立校數）
（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

表4：82至90學年度大學生人數及入學錄取率（括弧內為私校學生人數）

學年度	大學生人數	入學錄取率(%)	學年度	大學生人數	入學錄取率(%)
82	285,982 (165,081)	-----	87	409,705 (255,814)	60.45
83	302,093 (175,180)	44.35	88	470,030 (305,879)	59.83
84	314,499 (183,223)	44.31	89	564,059 (385,550)	57.70
85	337,837 (199,947)	49.24	90	677,171 (481,561)	61.35
86	373,702 (227,421)	60.18			

（資料來源：依教育部統計處資料計算）
（說明：91與92學年度錄取率分別為80.41%與83.22%）

學年度，大學學生人數的增加比例達236%，其中私校人數之增加比例更高達292%，82學年度時，私校學生約為公立學校學生人數之1.37倍，至90學年度時，私校學生人數已增為公立學校學生人數的2.46倍。而在這近十年中，公立學校學生人數僅不過增長了61%，相較於私校學生人數增長了192%，我們可以再

次看到高等教育中私有部門已成為最主要的教育提供者這一趨勢。

除了在量上的劇烈變化外，在大學的性質上，也有著顯著的變化，我們可以以歷年大學部學生就讀類科和畢業生就讀類科的變化來考察此一趨勢（參見表5與表6）。

從表5及表6中，我們很清楚的可以看到，

表5：歷年大學部學生就讀類科的變化趨勢（括弧內為百分比）

學年	人文	社會	科技	學年	人文	社會	科技
82	69,791(24.4)	93,804(32.8)	122,387(42.8)	87	86,790(21.2)	141,828(34.6)	181,087(44.2)
83	71,673(23.7)	100,660(33.3)	129,760(43.0)	88	94,630(20.1)	162,545(34.6)	212,855(45.3)
84	72,639(23.1)	106,684(33.9)	135,176(43.0)	89	103,216(18.3)	197,279(35.0)	263,564(46.7)
85	75,692(22.4)	115,382(34.2)	146,763(43.4)	90	113,969(16.8)	241,858(35.7)	321,344(47.5)
86	80,548(21.6)	128,911(34.5)	164,243(43.9)	91	125,626(16.3)	278,454(36.1)	366,835(47.6)

（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

表6：歷年大學畢業生就讀類科的變化趨勢（括弧內為百分比）

學年	人文	社會	科技	學年	人文	社會	科技
81	15,439(26.0)	19,676(33.1)	24,363(40.9)	86	21,792(25.4)	28,822(33.6)	35,188(41.0)
82	15,826(25.1)	20,704(32.8)	26,630(42.1)	87	17,897(20.5)	30,303(34.7)	39,221(44.8)
83	16,242(23.8)	22,823(33.4)	29,209(42.8)	88	19,862(19.8)	34,671(34.6)	45,638(45.6)
84	16,622(23.5)	24,467(34.6)	29,659(41.9)	89	21,285(18.1)	38,971(33.2)	57,174(48.7)
85	17,163(23.1)	25,832(34.8)	31,260(42.1)	90	23,600(16.1)	50,258(34.4)	72,308(49.5)

（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

在強調大學市場化與經濟考量的趨勢下，大學生就讀科技類科系的比例穩定的上升，而所增加的比例幾乎完全來自於就讀人文科系學生比例的下降（減少將近九個百分點），社會類科系因為包含了管理、法律與經濟商業等與市場關係密切的科系，因此就整體比例而言，也有些微的上升。

此一因強調市場價值而對於大學在知識上所應該扮演的引導性與未來性角色的破壞也類似於Puiggros在第三世界國家中所觀察到的現象（1996）。在這裡，所牽涉到的問題十分的重要，其影響也甚為深遠。大學的「服務社會」意義是否僅在於反映社會經濟與市場的需要？大學之價值是否僅是依附於市場而提供其所需的工具性與實用性知識？抑或，大學是為了追求、擘劃一個更理想、更美好的社會，因而必須在知識上扮演著獨立性與導引性的角色，也因此必須有能力隔離於「市場立即的需求」而具有自主性的存在？如果，大學為了一味追求市場價值，那麼，那些無市場立即需要、但對於人類整體社會具有重大意義的知識（科系），將會因為失衡而受到嚴重的破壞，而我們的社會在不久的未來也將會開始嚐到這一惡果。

教育市場化改革下直接的受衝擊者——公立大學

在世界銀行的新自由主義意識型態主導下的高等教育改革，其主要目標之一就在於對於國家所提供的公立教育系統進行改造，因此，公立教育系統的破壞是此一教育改革下最為顯

著的現象之一。同樣的，在台灣，在十多年來的教育改革中，公立大學系統首先遭遇到了最直接的嚴重衝擊。

首先，在「成本分擔」（cost-sharing）的理論下，因為認為接受高等教育者，其個人受益高於社會受益，因此接受高等教育的學生與家庭，不能自私的享受由「全體納稅人」所為其付出的教育成本，其自身與家庭必須分擔此一教育成本，如此才能符合「公平」原則（Johnstone, 2003）〔註六〕。

同樣的，台灣的教育部在面對學費高漲的質疑時，也是以此一「成本分擔」的理由來進行說明（<http://210.69.7.199/qa/300000000s5422000309.htm>）：

我國高等教育非屬國民義務教育範疇，學生必須繳交學雜費，以支付部分教育成本，如此才能讓教育資源有效運用，如刻意採低學雜費而由全民負擔其教育成本，固然一方面可減輕家庭之負擔，使其子女可充分就學，但由全體民眾負擔部分人士接受大學教育之成本，其公平性有待商榷〔註七〕。

在這種觀念的操作下，其結果正如同我們在上述表1所看到的，在近十年學費調漲的過程中，公立大學學費之調漲幅度高達86.2%，遠高於私立大學17.6%的調漲幅度（就絕對值而言，私校之學費仍遠高於公立學校）。同時，自八十八學年度起，教育部以「各校依發展特色提升辦學品質」為由實施「彈性學雜費方案」，授權公立學校每年可自行在10%的範

註六：「成本分擔」理論是以世界銀行所資助的實證研究為基礎所提出的，Johnstone為此一理論的重要奠基與提倡者。

註七：陳水扁總統於去年（民國92年）的「阿扁電子報」所提出的，「要讀大學就要做好個人的財務規劃」，其實也是這一成本分擔理論下的呈現，亦即，大學教育係屬於個人生涯投資一個人受益的一部份，因此受教者家庭必須進行「投資管理」。

圍中決定學費之調漲幅度，此一形同以「複利」方式調漲學費之政策，為公立大學學費快速增漲提供了空間〔註八〕。

除了學費之外，在公立大學制度上，教育部也進行了兩項相關的改革政策：「校務基金」制度與「公立大學法人化」〔註九〕。

校務基金制度與公立大學法人化其實有著一體兩面的關係，其主要是在「自由化」與「分權（自治）化」的表面理由下，要求公立大學必須「獨立」與「自主」，從而將公立大學朝向市場化更推進一步〔註十〕。換言之，我們可以做這樣的比喻，在這兩項制度的改革下，公立大學與教育部（國家）的關係，將由過去的「直營店」變成為「經銷商」的關係，國家不再對公立大學的經營提供最主要的資金來源，而必須由各校自負盈虧〔註十一〕。

民國八十四年，教育部制訂公布了〈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在這項辦法中，明訂除了「政府預算撥入款」一項之外，校務基金尚有其他來源〔註十二〕。

從這項辦法中，我們可以看到，國家的意圖乃在於藉由校務基金的成立，使各校獨立籌措學校運作經費來源，亦即，國家不再作為公立大學財務的主要提供者的角色。

至九十學年度止，所有的公立大專院校皆已實施了校務基金制度，各校自籌經費之比例，也從85年度的37.13%，提高至91年度的58.62%，亦即，國家已不再扮演公立大學運作最主要的提供者的角色。

由於國家卸卻了對於公立大學的財務提供的責任，因此在經費來源的壓力下，各校除了以調漲學費來補足缺口之外，更必須進一步的與市場緊密結合，期望藉由市場上私人資本的挹注，來取得校務運作的必要經費來源。

在學費方面，我們可以看到，在校務基金制度實施之後，學雜費收入佔校務基金之比例年有提高，從85年度的12.03%，提高至91年度的20.37%〔註十三〕。而在與市場更為緊密的結合方面，例如，藉由「場地設備管理收入」之經費來源，許多學校在校內紛紛引入營利商

註八：雖然在〈大學學雜費彈性調整方案〉實施後，公立大學的學雜費調漲幅度每年並未真正達到10%，就調漲幅度而言，還要低於彈性調整方案實施之前，但這主要是由於近年經濟景氣之因素所影響，因此各校皆「自我克制」了調漲幅度。

註九：公立大學法人化的最後實施方式雖仍未定案（其關係到大學法之修正），但公立大學之組織朝「獨立法人」方向調整，已經是既定之方向。

註十：簡言之，國家所謂「放權」的實質內涵，其實正是「國家退出、市場介入（接手）」。放在這個脈絡下來看，我們要說明的是，公立大學朝法人化方向轉型，就鬆脫國家公務體制的綁縛、而有利於教學與研究自主環境的塑造，是有其正面意義的。但問題是，若是國家卸除了經費提供者的角色，而迫使學校必須面向市場來籌措運作所需的財源，則無異於使學校雖脫狼吻、卻入虎口，對於法人化所意圖達成的學術自由環境的目的來說，會產生完全不同預期的後果。

註十一：國公營事業的「公司化」，也是在同樣的觀念與操作下進行的。

註十二：「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第七條：「校務基金之來源如左：學雜費收入；政府編列預算撥付款；推廣教育收入；建教合作收入；場地設備管理收入；捐贈收入；孳息收入；其他收入。」

註十三：根據教育部人員分析，除了少數知名國立大學外，國內多數國立大學校院所收的學雜費，占自籌經費的6~9成。見〈民生報〉，2004年2月12日。

店（如台大由舊學生活動中心整建而成的商店街）；或是設立「創新育成中心」，由私有資本進駐學校試圖創發市場商品；更鼓勵教師之研究與私人廠商結合（建教收入），以期獲得更多的經費來源與資助。

另外，今年2月11日，行政院科技會報更通過了「公教分離」的方案，亦即，日後公立大學教師之薪資，得以不再比照公務人員的固定薪給，最快自今年8月起，國立大學校院在核報一定比例額度內，可以彈性發給教師額外的「績效獎金」與「學術獎助費」，而這項獎金將來自各校之自籌財源（包含學雜費收入）。這項薪資彈性的改變可以說是將一般勞動力市場中的薪資觀念與給付方式，第一次正式引入公共的教育部門之中，這不啻宣告了，公共教育部門的教師，日後亦將如同私部門的勞工一般，視其（市場價值、利潤）貢獻，來決定其所得。

一旦大學教師薪資彈性化實施，我們將可預期，在各校必須為自籌財源而與市場需求更為接近的前提下，日後將迫使大學教師必須進行與市場需求更為緊密的研究，將自己的研究當作商品，以作為其「績效」表現之判準，否則其薪資將有縮減之虞〔註十四〕。

教育部的這項「公教分離」的彈性薪資做法，與世界銀行在第三世界所推動的高等教育改革如出一轍，而這項制度的實踐，在第三世界的大學教育中卻引發了嚴重的後果——大學教育的品質低落。亦即，大學教師為了追求理想的收入，將時間與精力耗費於與市場需求相關的研究中，而淡化了教學的熱情與對於教學的投入。

這項做法亦有其政治上的謀量，世界銀行的經濟學家認為，「經濟的甜頭就是最好的意識型態控制」，換言之，賞之與胡蘿蔔以為誘因，大學教師將因此失去挑戰既有秩序的動力，實踐性和改造性的知識追求與動機，將會因此而大大降低，這也就是Puiggros所謂的「市場自由主義與意識型態保守主義的交會」（1996）。

公立大學改革對於私立大學所產生的連帶效果

雖然這十多年來台灣的高等教育改革對於公立大學所造成的衝擊是比較直接的，但由於公立大學與私立大學同處於一個教育（法令）系統與社會環境之下，因此，公立大學改革的效果勢必也會連帶影響到私立大學。

首先，公立大學校務基金制度的實施，使得公立大學產生了自籌財源的壓力，由於公立大學過去長時期在國家資源的挹注下，有著比私立大學較為優良的體質，同時，公立大學畢業者，一般而言，主要是來自於社會的社經地位較高家庭，再加上系出同校的親近因素影響，使得公立大學畢業者往往比私校畢業者在市場上有著更高的「競爭力」與更高的社經地位。這些因素的交織，使得公立學校享有比私立學校更可欲的自籌財源空間。再者，由於捐贈制度的不全，捐款給公立學校者可以享有免稅之優惠，因此，一旦公立學校加入競食既有資源而滿足自籌財源之需求時，將會對於私校的資源募集產生排擠的作用。

從歷年私立大學院校學生學雜費收入佔學校總收入的比例變化來看，我們可以看到這種

註十四：根據報導：「表現好的老師，學校可大幅加薪；相對地，如果表現不理想的教師，學校則可酌情扣減既有的「學術研究費」。見〈台灣立報〉，2004年2月12日。

表7：歷年私立大學
院校學生學雜
費收入佔學校
總收入（單
位：百萬元）

學年度	學雜費收入	總收入	學雜費占總收入比率(%)
85	17,947	32,663	54.95
86	23,000	40,496	56.80
87	28,214	45,625	61.84
88	39,390	64,364	61.20
89	53,297	80,191	66.46
90	60,531	95,139	63.62
91	68,559	100,190	68.43

(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

排擠效果的出現（參見表7）：

從上表中我們可以看到，在私立大學中，學雜費收入一直是學校總收入最重要的來源，而學雜費收入占學校總收入的比例在近年來也不斷攀高，從85學年度的54.95%上升到91學年度的68.43%，幾乎達到七成之比例。而這逐年增加的比例，所顯示的有可能是由於公立大學在實施校務基金制度後，加入了競食資源的行列之中，因此使得私立學校的自籌經費來源遭到排擠，進而使得學雜費收入佔學校總收入的比例不斷上升（亦即其他收入來源比例相對減少）。尤其是在九十學年度，當所有的公立大學都實施校務基金制度之後，私立大學九十一學年度的學雜費收入佔總收入比例，更一下子從63.62%提高到68.43%，增加了將近5個百分點。另外，在八十八學年度到八十九學年度，這項比例亦有顯著之提升，這則可能是因為八十八學年度開始實施「學雜費彈性方案」所致〔註十五〕。

另外，私立大學和公立大學比較起來，由於過去受到國家資源的挹注相對較少，因此私立大學原本與市場需求的接近性就較公立大學

為高；然而，當公立大學亦開始向市場需求靠近時，兩者將產生競爭之效應，從而將會更加劇私立大學向市場靠攏的程度。這一點我們可以從近年來新設或改制之私立大學院校，幾乎全為資訊科技、應用科學、管理之科系，相對缺少人文學科、基礎科學等科系，這樣一個現象，看出其影響。更有甚者，當公立大學開始實施「公教分離」政策後，這種薪資彈性的做法，由於私校對於教師的（市場）「績效」，其需求要更甚於公立學校，因此這項政策的影響對於私立大學恐怕將更大於公立大學。總的說來，過去在市場化的腳步上，私立學校原本就走在公立學校之前，而當公立學校系統亦開始其市場化之腳步後，將會迫使私立學校在市場化上的腳步走得更快、也更遠。

我們要對抗的是新自由主義、而非僅是批評「教育改革」

從以上的討論中，我們其實已經可以發現，台灣的高等教育改革，其實並不是孤立發生的，它根本上乃是作為全世界新自由主義浪潮下，所進行的各項「改革」中的一個

註十五：這有可能是由於私立大學之學雜費調整，尚須經過教育部在各方面之審核為依據，因此其效應延後一年出現。

環節。作為市場自由主義的新自由主義，其理論與實踐上對於市場化與私有化的刻意強調與偏好，使得過去由國家所介入的各個領域（包括經濟、教育與社會[福利]政策等），都必須雙手拱出，交由市場與私人資本來決定與經營〔註十六〕。

因此，孤立的討論台灣的教育改革，或是僅僅計較於自身領域中所喪失的利益或權益（例如僅僅強調負擔增加的反高學費運動），不但無益於我們對於這個現象的真正認識，也無助於這個強大的趨勢的逆轉或改變〔註十七〕。同時，令人扼腕的是，在台灣毫無社會意識的政治環境中，各項社會政策或公共政策的批判與質疑，經常淪為政治色彩學的操作，非藍即綠的站立場認識方式，將教育改革的問題變造為藍綠的鬥爭，殊無知於藍綠皆為市場派的信徒與操盤手，所差別者僅在於操作技巧而已〔註十八〕。

我們所必須做的，首先是在事實上揭露這一以「自由化」作為其包裝的市場化改革，並形成進步的公共論述。我們所進行的論述，不

能僅僅侷限於某一（些）特定領域，而必須將所有正在遭遇新自由主義危害的領域一併進行徹底的批判與揭露，同時將它們綰連在一起，讓所有的受威脅大眾能理解，我們的共同敵人究竟是誰？我們要進行論述的運動，從而形成一套運動的論述。

除了論述的提出與深化之外，事實上，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運動，在國外已燃起一片燎原之火。這個運動之所以波瀾壯闊，乃是由於新自由主義所影響者，已是全面而普遍的，各個領域的社會運動漸有合流之勢，並已跨越國界相互培力、彼此奧援。因此，在召喚對抗新自由主義的運動及其連結上，台灣仍有相當的努力空間，而突破藍綠之政治禁錮、暴露真正的社會矛盾，對抗新自由主義，可能雖非唯一，將是一個可以著力的槓桿支點。

放任市場的運作，歷史上已經很清楚的證明了它的嚴重災難性後果，曾經經歷過這段歷史的人們，如果不能記取教訓、讓恐怖的歷史重現，那麼，未來等待著人類的命運的，將是煉獄而非天堂。◎

註十六：在世界貿易組織（WTO）的貿易種類中，教育之所以能成為一種得以進行全世界範圍內的服務業貿易商品之一，其前提正是教育的市場化與商品化的建立與形成。

註十七：這篇文章雖然僅嘗試了討論關於高等教育市場化的一些趨勢，但是，事實上，在台灣的基础教育部門，也同樣受到市場化的嚴重衝擊與傷害。這部分，有必要另文討論。

註十八：在2004年2月14日的第一次總統大選辯論中，曾有一名提問者問了扁連二人關於「教養是什麼？」的問題，二人皆支吾以對。「教養」的問題或許並無標準談法，但可以確定的是，由於「教養」不具備市場價值，因此從未成為教育政策決策者之關懷。兩個總統候選人幾乎無言以對，自然不在話下。

參考資料

1. Puiggros, Adriana 1996. World Bank Education Policy: Market Liberalism Meets Ideological Conservatism. <http://www.hartford-hwp.com/archives/40/031.html>
2. Johnstone, D. Bruce and Preeti Shroff-Mehta 2003. 〈高等教育財政與入學機會：學費及學生資助政策的國際比較〉，沈紅、李紅桃譯，收入《高等教育財政：問題及出路》，頁207-223，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3. 教育部統計處 http://www.edu.tw/EDU_WEB/Web/STATISTICS/index.htm
4. 《民生報》2004年2月12日
5. 《台灣立報》2004年2月12日

教育市場化， 肥了哪些人？（上）

■張戡

教育市場化是世界各國普遍可見的教育政策發展現象，其理論就是要政府放鬆管制，讓教育回歸市場機制，自行運作，優勝劣敗、自然淘汰，不但可以提高效率、增加彈性，而且還可以提供消費者更多選擇、更優品質的商品和服務。台灣當然也不落人後，自解除戒嚴以來，一波接著一波的教改運動與措施，也是朝著鬆綁及市場化的方向前進，從多元入學方案到廢除聯考，從國民中、小學課程修訂到教科書開放民營，從廣設私立大學院校到公立大學法人化，無不依循這個思想脈絡去設計與推動。然而十年教改的結果，不但家長沒有獲得更多的選擇，教育品質也沒有提高，這一點筆者在本刊創刊號中已有提到，現在我們就來談談教育市場化之後，到底哪些人獲利？

一、多元入學變成了「多錢入學」

(1) 有錢能使鬼推磨

先從兩年前喧騰一時的國際生物奧林匹亞競賽弊案談起，報載台北地檢署起訴書指出，原台師大生物系教授曾哲明，89年12月擔任該競賽總召集人，透過建國中學生物老師湯炳垣，涉嫌接受參賽學生家長陳家偵招待喝花酒及召妓，為擔心醜聞曝光而竄改該生初試成績，讓該生有資格參加複試，破壞競賽正確性

與公平性，並重挫多元入學方案政策威信，依貪污治罪條例中的賄賂罪提起公訴，分別對三人求刑兩年。(中時，2002.08.23) 若曾、湯涉案屬實，此處便值得加以細究。

此案之所以會牽涉到多元入學方案，正因為多元入學方案中，容許奧賽得獎者保送大學，並有利於參賽者申請入學及推薦甄選過關，記者陳榮裕有幾段精確的描述：

……其他家長可能還搞不清楚「奧林匹亞」和「奧林匹克」有什麼不同，還忙著打聽「甄選」和「申請」的差異時，陳家偵已藉著建中校友的身分和雄厚社經優勢，熟識建中指導老師，並循此取得和奧林匹亞競賽評審選拔計劃主持人的關係。

……誰握有資源和工具，誰就擁有較多參賽權。建中指導教師湯炳垣有推薦學生權，師大教授曾哲明有評審學生權，握有如此大權的人，卻與學生家長糾纏著金錢債務和聲色招待的複雜關係，即使他們聲稱如此關係並不影響競賽成績，但誰會相信呢？

……陳家偵扯出案外案，他的兒子參加國際科展時，曾因誰掛名而引發一連串爭鬥劇情，作品是誰做的難以釐清，但清楚的是，從找作品題目和實驗過程，以及實驗場地和工具，博士級的家長都有「介

入」的痕跡。

……家長拿出證據，抖出一連串科展黑幕，學校涉嫌虛報科展參賽名單，學生作品抄襲台大教授論文，並連帶指出，一名前部長級政務官女兒就讀國中時，也因此被「夾帶」過關。(中時，2002.03.21)

我們看看陳案的內容，其心思之細密，手法之靈巧，背景之雄厚，關係之複雜，便明白這不是一般升斗小民、工農大眾所辦得到的，可是多元入學方案偏偏就有這種後門可以走，使得許多家長和學生陷入「收集資料、包裝資料」的瘋狂狀態，充分發揮了「造假文化」的本質，為了取得優勢列入這十分之二的「甄選」或「申請」名額，也從而讓人見識到五花八門、淋漓盡致的「多元能力」，這不但沒有改革教育，更是十足的「反教育」。台大社工研究所教授林萬億直指，多元入學方案不利窮人，他以台大社會系91年度約50名申請的學生為例，個個都有厚厚一疊獎狀、證明，包括直笛、鋼琴等才藝獎，如果家境不好，怎麼可能參加這麼多的才藝補習。(聯合，2002.04.20)

(2) 校門八字開，沒錢莫進來

其次我們再從多元入學的申請費用來看，92年3月台聯立委蘇盈貴指控，部分私立大學科系，藉申請入學斂財，他點名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招生只要30人科系，初選錄取900人，第二階段僅考智力測驗，每人要交500元，該校15個系，因此海削考生540萬元；蘇委員指出，許多科系光是報名費就收入近百萬元，每年多元入學制度創造商機超過10億元，利用甄試進大學學生，每人平均花費2萬元；而稻江在回應該指控時說，他們是依教育部招生規定，提高入學學生刪選倍率，且其收費是全國最便宜的。(聯合晚報，2003.03.08)

於是我們看到了，是教育部的招生規定開

了這一扇門，而這還是最便宜的，假設有一個學生兩次學測成績都考得並不理想，千方百計獲得了推薦去參加甄試，同時又去申請了最高限數的八個系，經過一次又一次的初試、複試、淘汰，最後回頭還得參加指定考，結果被分發到一個勉強選填的學系，因為他所最想讀的學系，全都被重複錄取的名額佔據了，算算他所花的費用，想想他所歷經的心理及生理的折磨，真是情何以堪；回到家經濟拮据的父母，還一味地把過失歸咎於該生的成績太爛，殊不知多半的問題是出在我們的入學制度，它肥了學校，瘦了孩子。

(3) 學測大怪獸，吃乾又抹淨

除此之外，負責這種超級大聯考的大考中心也是吸錢機，90年末代大學聯考時，投考人數也不過12萬人，現在的大學學測人數卻已超過16萬人，隨後做為分發依據的指定考人數也約有11萬人，第一次國中基測人數更是超過30萬人，隔年也有19萬人，以前末代大學聯考報名費是800元，現在參加大學學測則漲到950元，是高普考的兩倍，另外申請入學的報名費是100元，第二階段甄試要再繳600到1500元，指定考科報名費是100元，每報考一科多加收150元，報考六科則加收900元，如此一次考試下來，該機構收入必然相當可觀。

收了錢好好辦事也就算了，偏偏他們又有出書斂財之嫌，立法委員程振隆於92年4月公開質疑，大考中心出版的有些書籍，售價都是印刷成本的8、9倍，明明是公益單位，怎麼可以賣得比民間的教科書還貴？他估算了一下，若所有考生都買了其相關的出版品，銷售總額應接近2億元，即使只有十分之一的學生購買，也有2000萬元，但該中心連續兩年編列的服務收入，卻只有700多萬元(聯合，2003.04.01)，多的錢都到哪去？

此外還傳出洩題嫌疑，李慶安等多位立委

於91年5月向教育部檢舉，該中心研究員陳坤田任職長達11年，該年4月30日離職後，5月1日馬上到劉毅英文家教班，開設英文講座，講授指定考科英文作文，及閱讀測驗解題技巧，家教班甚至在廣告宣稱，陳是「大考中心靈魂人物」，曾在闈場負責組合題目，研究出閱讀測驗答題技巧；教育部長黃榮村認為陳坤田行為不宜，但不代表有洩題，他將請政風等相關單位追查，並希望大考中心訂定類似旋轉門條款的規定，督促離職人員適度利益迴避。據了解，陳坤田的離職真正原因是，他在職期間幫出版社編高中英文參考書，違反了工作內規，而遭人檢舉。(聯合，2002.05.30)

有一種說法認為，申請與推甄只佔全部名額的五分之一，仍有五分之四可依考試分發，它不會影響整體的公平性。筆者認為這是似是而非的，因為五分之一的名額，就已經夠那些排名前十分之一最有權勢、最有資源的富爸爸們長袖善舞、上下其手了。或問說，難道大學的老師就這麼不值得信任嗎？筆者倒要反問，既然要學西方的申請入學制度，為何一直不敢採計學生的在校成績？難道國中、高中的老師就這麼不值得信任嗎？既然要提升大學生的素質，就應該讓學生入學容易畢業難，何以大學由你玩四年的風氣依然如故？難道大學教授就這麼愛給營養學分嗎？其實應該說，歐美國家的老師，在給評分時，有一定的公信力，所以申請入學制度可以行之有年，而我們在老師們還沒建立這種公信力之前，談多元、談開放，則只會把後門開得更大而已。

二、新課程修訂，修肥了學者與商人的口袋

(1) 建構式數學先肥了始作俑者

針對教科書的修訂與民編，我們也從一件令人咋舌的事件先談。建構式數學的興廢，已

經造成了整整一代白老鼠小學生數學成績的低落，而這項禍害的最大獲利者，卻可能是一些當年推動此項教學的學者們！親民黨立委李慶安91年10月提出質疑，該年國小課程修訂小組召集人、成員，且是國立編譯館數學教科書編審主委、委員的黃敏晃、朱建正，長期應聘在中華少年科教公司舉辦的安親班教師在職進修營等課程，擔任建構式數學講座、教具推廣，頒發學員結業證書，有違利益迴避原則。(中時，2002.10.24)

堅決反對建構式數學的資優出版社社長林貴榮指出，教育部於一年前便掌握黃敏晃、朱建正在外斂財的事實，卻遲遲沒有動作。林貴榮說，黃敏晃、朱建正在外刊登招生廣告，以3000元一堂課的費用，散發建構式數學的相關證書，而且兩人推動的建構式數學，需要藉助大量的教材輔助教學，所以兩人從台大退休後，開設教材教具公司，推估每年光是賣教具就賺進2億6000多萬元。(中時晚報，2001.08.12) 黃敏晃的反駁是，他純粹幫忙朋友才擔任這賣科教為主的公司講師，當時民間教科書商因買書送教具，造成經營困難，他才開課，1小時鐘點才1600元，……他主編國編版數學教科書，只拿稿費，沒有版稅，他絕無主導課程標準，靠賣教具謀利。(聯合，2002.10.29)

換句話說，到該公司任課是事實，不過鐘點費只有林貴榮所說的一半，球員兼裁判既編書又審書也是事實，只是沒拿版稅；至於他那些來繳費上課、買教材、買教具的徒弟們，領了血統證明書後，自然就可以到各地補習班去桃李滿天下囉！據相關業者估計，數學教材費和補習市場，一年至少有100億(中時，2001.02.19)，以黃、朱兩人的身分背景，介入這市場這麼深，分享其中一點肥水，其實也不為過；也難怪當教育部長曾志朗，見美國教育界決定停止建構式數學教學時，便再三喊停

台灣的建構式數學教學，卻仍被多拖了三年才停辦，100億的商機畢竟不是區區一個教育部長所能擋得住的；只可惜180萬國小學童卻錯過了他們學習數學的黃金時段。

(2) 教科書市場，任你巧取豪奪

至於全部的教科書及參考書市場，金額則遠大得多，我們再來看一個數字，民進黨立委余政道92年1月指出，根據統計估算數據顯示，以91年度國中一年級九年一貫課程主科國、英、數教科市場分佈，康軒版的部分，國文科市場佔有高達52%，訂購冊數達16萬餘冊，英語科市場佔41%，訂購冊數12萬餘冊，而數學佔有市場分佈41%，冊數為12萬餘冊。以此推估，康軒公司在國中一年級的國、英、數三科參考書市場，已佔有近五成的「先天佔有率」，若以一科參考用書單價380元價格相乘，其潛在市場收入高達1億5400萬餘元。而此與教科書市場收入2400萬餘元相比，高達6倍的利差，恐有交叉補貼之嫌。(聯合晚報，2003.01.11) 這只是一家出版社國一主科的一年可能銷售量，故有人估計，91年九年一貫教科書及參考書市場超過300億。(聯合，2002.04.16) 而全部國中、小加上高中的教科書參考書市場，則一年約七、八百億。(聯合，2002.12.26)

市場這麼大，自然各大書商便卯足勁來搶食大餅，其促銷手法既讓人眼花撩亂，也讓人目瞪口呆。最常見的是，一、贈送教具、教材，甚至連觀察自然生態的青蛙也都送；二、捐贈設備，只要學校開口，就為學校裝置電腦設備或外語資訊教室；三、配合學校活動，提供物品或金援；四、開出「試教費」行情，爭取老師試用其教材；五、免費為老師舉辦新課程研習活動；六、有時送些根本與教學無關的東西，如礦泉水、烤麵包機、電視、冰箱、光碟機等；也有請吃飯、招待出遊的。(聯合，2002.04.16)

台中師院國教研究所許淑玫，90年於「國民教育研究集刊」第9期，所發表論文『一幅課程改革實施現象的圖像』中提到：

最引學校注目的附加價值是，「協助學校完成總體課程計畫暨規劃課程統整方案」，在這份「物超所值」的大贈品下，學校須提報教育局審核之總體課程有了著落，很多行政人員及教師頓時覺得心頭大石落地，而這份遠比教科書更重要的附加價值，形成了許多學校遴選教科書的「重量級考量」。各校立場或因不清楚統整概念、無心進行，或因人力不足、缺乏自行規畫時間等因素，最後接受教科書商所提供的「五星級服務—編製課程計畫」者大有人在，而根據書商提供之光碟範例，依樣畫葫蘆亦多矣。

(3) 學者也愛來插花

在教科書市場中，學界與商界掛勾的現象本來司空見慣，但是有兩個單位是特別讓人無法容忍的，一個就是大考中心，另一個就是課程修訂審議委員會，而偏偏這兩個單位都傳出不顧利益迴避的新聞。91年12月，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研究員盧建榮出書爆料說，清華大學歷史所教授張元，身為教育部聘請的高中中國歷史課程綱要制訂委員，參與制訂綱要，卻自己又寫教科書，所寫章節雖有不符綱要，卻仍獲教育部審查通過；同時，他參與91年大學指定科目考試命題，卻又是龍騰版歷史教科書的作者，違反利益迴避原則。(聯合，2002.12.30)

立委李慶安於91年3月指出，國立台北師範學院前任校長歐用生，不但獲聘擔任教育部九年一貫課程推動小組的委員，也是新課程綱要的審訂委員，未顧及自身角色，卻擔任國內最大書商康軒公司的董事，也是該書商籌辦康橋中小學的董事，另外，歐用生也擔任「中華民國教材研究發展學會」、「中華

民國課程與教學學會」的理事長，但這兩個單位卻竟然設在康軒公司的大樓裡！（中時晚報，2002.03.27）

(4) 聯合壟斷，你奈我何？

當少數書商經營了足夠的人脈，募集了充裕的資金，佔據了大半的市場，一朝利益與共，便可形成市場的壟斷，進而與公權力對抗，下面這個案例可為見證。自從91年7月辦理國中小教科書聯合議價之後，業者為彌補教科書減價所遭損失，9月開學後大幅調漲參考書價格達35-38元，引起各界向公平交易委員會檢舉，經過數月的密集調查，公平會於92年1月9日決議：康軒文教、南一書局、育橋文教公司非法限制經銷區域，扣留經銷商合約書等不當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合計處罰575萬元罰鍰。公平會還認定：康軒、南一、翰林等事業，在教科書市場佔有率合計達四分之三，實際銷售額已超過10億元，屬於獨占事業，乃訂出「行業警示」，業者必須積極修正國民中小學教科書聯合採購作業目的因應行為，不宜有獨占事業的禁止行為、聯合行為，包括不得再聯合抵制議價。（聯合，2003.01.10）

其實，依公平會的說法，無論聯合抵制議價或集體漲價，違者最高可罰2500萬元，三家書商若兩者皆違，合計應可罰到1億5000萬元。然而三家書商於91年暑假被檢舉時，正是因為台北縣十七所學校辦理國中小教科書聯合議價，遭書商聯合抵制並干擾其他同業到場，未出席書商更被教育部發現，於會後聚會，集體重貼參考書價格、提高售價。（ibid）教育部把鋤刀高高舉起，卻輕輕放下，不但聯合抵制議價部份不罰，集體漲價部分也以十五分之一的金額意思意思了結，相較於書商一次漲價所獲利潤，這麼小的罰鍰能起什麼作用，實在令人懷疑。

就在公平會決議之後，康軒文教事業在無預告之下，突然將下學期的國小英語教科書漲

價四成。（聯合晚報，2003.01.11）不僅無視正將被罰的事實，而且違反其與台北縣、市教育局所簽「共同供應契約」，言明調價不得超過10%的約定，更不應該在約定一年的中途漲價，結果激使台中近百所國小開會決定串聯抵制。發起抵制的台中縣烏日鄉五光國小校長黃銘傳指出，康軒出版的國小英語課本每套有課本、習作、音標、二片CD，一至三年級一套從280元漲到440元，四至六年級一套從300元漲到460元，以前國立編譯館的課本，一本才23元，每位小朋友一學期課本費才170元，現在則2700元，改革讓家長負擔沉重，不如回到從前。（ibid）

(5) 一魚六吃，卻不顧品質

這裡我們必須注意到，課本、習作、音標根本可以編成一本，CD也不需要兩片，而且多半學生不會去聽它；這種拆冊灌水的手法在其他科目也很常見，例如康軒版國小一年級上學期國語就分成，首冊課本、首冊注音詞語簿、首冊多元習作、上冊課本、上冊生字詞語簿、上冊習作，一共六本，這在過去，單單一本國語課本就可解決了。還有課外參考書、評量、測驗卷，更是種類多如牛毛，恨不得讓家長們買到手軟，再加上一網多本，學生在面臨學測時，真是書海浩瀚，就算買得起，也不知從何讀起，只好上補習班，靠老師整理分析了。

那麼教科書品質有沒有好一點呢？仔細檢查卻發現金玉其表、敗絮其中。教育部92年2月委託桃園縣國教輔導團，針對一、二、四、七等四個年級，共151冊九年一貫教科書檢閱錯誤，結果發現70幾個錯別字，800多處有疑義內容。（聯合，2003.03.20）同年五月起，教育部便推動「教科書抓錯，老師有獎」機制，只要是最先檢舉，確認無誤，老師記功，還可以累計。（聯合，2003.04.16）

(6) 教材DIY，價廉又物美

民營教科書既然又貴又差，又灌水又壟斷，學校及家長就任由宰割了嗎？來看看一則DIY的故事，台北縣頂溪國小一群老師，自行研發教材、編印教科書及習作，一學期費用才350元！教材內容貼近學生生活，習作與評量也精心編制，具有啟發作用，獲得不少學生家長好評。該校擔任第一線教師工作已有27年的王修亮老師說，她和其他9位老師，從88年10月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公佈起，犧牲所有課餘時間及寒暑假，一反過去照本宣科的教學方法，而將遊戲融入學習，自行增修、編訂教材，並情商台灣藝術學院教授謝如山、花蓮師院教授廉兮擔任顧問，協助他們建構教材的理論和知識架構，以及學童的人格建構過程，於90年開學前，完成小一課程編訂工作。(聯合，2003.04.16)

王修亮說，最重要、也最困難的是爭取家長支持。他們先寫信向家長說明，再一一打電話聯繫、溝通，最後並舉行座談會，當面交換意見，結果4個班132位家長，只有3位缺席，經說明後，只有1位家長反對，反對的理由是，擔心小孩將來到大陸無法和大陸學生競爭，但經過一個學期的授課後，再也沒有家長提出反對意見。(ibid)

全國教師會肯定這種教材DIY的作法，並希望政府訂定獎勵教師自編教材辦法，鼓勵校內自編或跨校合編，徹底切斷書商和學校間的關係；秘書長吳忠泰表示，雖有不少教師有意自編教材，但受限於上課時數過多，和缺乏相關資料，總是心有餘而力不足，希望教育部能增加教師人力。他說很多老師質疑，不知道政府推動的是「常人教改」還是「超人教改」，九年一貫課程的統整與改革，要求老師自編教材，卻只能利用課餘及休假，然而，並不是每個老師都能像王修亮等人那樣完全奉獻的。(ibid)

(7) 教育不是數字，不要加減乘除

筆者認為應該叫做「疲人教改」，其做法乃是典型的「又要馬跑，又不讓馬吃草」，而這種思維可一直延伸到最近教育部的一項規畫。由於今年國小一年級新生人數，40年來第一次跌破30萬，教育部規畫釋出部份國中小教師名額，改聘兼任教師，以解決「流浪教師」問題。例如，一所編制10名專任教師的國小，若釋出一個員額，即可增聘4.5名兼任教師，平均每名兼任教師每週授課14節，餘下9名專任教師，每人平均可減授五節課。(聯合，2003.02.23) 這種規畫剛好顯示出，把教育商品化的荒謬性。

它就好像說，一斤鱈魚(專任)等於4.5斤吳郭魚(兼任)一樣，只顧把專任教師的薪資、授課節數(鱈魚價格)，換算成兼任教師的薪資、授課節數(吳郭魚價格)，完全不把專任教師對學生的輔導、與家長的互動、批改作業及聯絡簿、建立學生生活規範、承辦校內外的活動、結算總成績等等繁重的工作列入考慮，外加例行的校務工作、教學研討、行政會議等，全都落在裁員剩下的專任教師身上，不使他們「心力交瘁」才怪呢！更不用奢談騰出人力去自編教材了。

兼任教師的教學品質，也無法等同於專任教師的教學品質，通常是只會更差不會更好的，因為兼任教師不必負責班級的經營，也隨時可以跳槽，更可以到處兼差。如果說教育部官員們，連這點淺顯的道理都不懂，筆者是不相信的，真正的動機應該是為了選票與財務的考量，每釋出2個員額，便可換來9張「流浪教師」的選票，同時還省掉各種福利、保險、及退休金的支出，太划得來了。這一點還可以從近來登報支持320公投的學者名單中看出端倪，許多因教改而崛起的文教基金會的成員都名列在內，其中曾為文批評此次公投者大有人在，但是還是得支持公投，因為大家屬於同一個生命共同體，都已被綁樁了。 >> 待續

反全球化運動中的兩條路線

MR 2004與WSF大會親歷記

文■金寶瑜 / 圖■苦勞網 提供

今年一月中，我應「國際人民鬥爭同盟」(International League of Peoples' Struggle, ILPS)的邀請去印度孟買參加了「孟買抗爭大會」(Mumbai Resistance 2004, MR 2004)。在離開之前，我就得知「世界社會論壇」(World Social Forum, WSF)也將同時在孟買開第四次大會，「世界社會論壇」與MR 2004都是反全球化的大會，但是它們之間有很多的爭議。我決定既然去印度一趟，就儘可能到兩個會都去看看，希望瞭解一下它們之間的爭議是些什麼，以及爭議背後的原因。

「世界社會論壇」的活動

我在一月十六號到達孟買，MR 2004的會要到十八日才開始，因此十七號一整天我就參加了「世界社會論壇」。註了冊之後，來到會場只見人山人海，熱鬧極了。居然在這麼多人中，遇見了幾位從台灣來的朋友，大家在異國相見格外親熱。WSF的會場佔地很大，在會場中有四個大的展覽館，每一個展覽館中設有很多的攤位。這些攤位是由參加的團體自己申請的，每個攤位都展示出可以代表這個團體的一些標語、文宣、圖片、出版書籍等等。因此在展覽館走一圈，就可以大致瞭解有哪些團

體參加WSF，和各別團體所代表的議題，以及它們的歷史與平日的活動。但是因為在四個大展覽館的攤位太多，不可能去看每一個攤位，也不可能一個攤位停留太久，所以對這些團體也只可能有一些膚淺的瞭解。展示的攤位可分為下列幾類：有關環境保護和自然資源利用的、有關人權的（其中又包括原住民、少數民族和受政治迫害的人權）、有關兩性平等和關注婦女的議題的、有不少出版社、也有工人的團體、和反戰的團體。攤位較大的有英國的Oxfam (Oxford Committee for Famine Relief) (註一)，和印度的一個宣傳甘地一生和他的非暴力抗爭的哲學的團體，也有不少賣手工藝品和各種藝術作品的攤位。

WSF最重要的活動就是各種的解說會。就像攤位一樣，每一個團體也都可以申請主辦一個解說會。同一個時間內，有很多解說會在很多帳篷裡同時進行，每天約有兩百個，每個解

註一：Oxfam是在二次世界大戰暫時成立的一個救濟機構，它現在幾乎在所有國家都設有辦事處，Oxfam也出版不少書籍。Oxfam作了不少很不錯的調查，主張「公平貿易」。

說會參加的人數從幾個到幾百個（註二）。在解說會進行時，外面就有各式各樣的遊行。遊行的人都打扮起來，其中印度的少數民族的衣飾最為鮮豔。遊行中也有舞蹈，還配了鑼鼓和各種音樂。我在WSF開會的第四天，去參加了兩場解說會。一個是由美國和歐洲來的代表所主持的反對美國侵略伊拉克的會，他們策劃了在三月二十日美國發動戰爭一週年時，在全世界各地舉行反戰遊行。在整個會場中，反美和反布希的標語到處可見。另外一個會是由菲律賓和南韓的工人組織合辦的，主持人在報告了他們國家的工運狀況後，並強調各國之間合作的重要。

MR 2004的活動

第二天一早，MR 2004就開幕了，會場就在WSF的對街，中間隔了一條很寬的公路。MR 2004會場的氣氛要嚴肅得多，也有幾個攤位，但是以賣書為主。大會在一個很大帳篷內舉行，約有一千個人參加。大會開始時，先有歌唱和舞蹈的文藝節目，歌唱節目由一個人獨唱再加上合唱團配唱。我雖然聽不懂歌詞，但還是被唱者的激昂的歌聲和表情感動了。再後有年輕人舞蹈，然後所有參加會的人跟著他們到庭院中繞場三週，再回到帳篷裡開會。會中先由主辦單位「國際人民鬥爭同盟」的主席致詞，他說明了這次會議的重要性和今日世界上受壓迫的人民聯合鬥爭的迫切性。之後，就由來自印度各地的群眾組織的領導人和其它各國來開會的代表致詞。這些代表報告了一些他們當地的狀況和他們的抗爭，並預祝這個會開的成功。各代表的演說到了下午一點多才結束，這一天下午和第二天早上分別各有六個（共十二個）解說會同時進行。解說會包括：帝國主義與民族解放、工人階級在反帝反戰的中的地位、帝國主義全球化對婦女的影響、在帝國主義全球化中被邊緣化的原住民、

和從美國佔領伊拉克來看帝國主義戰爭對國家和人民的影響等等。

第二天大會的閉幕典禮拖到下午五點多才開始，在閉幕典禮中，又有很多人致詞。演講太長了，台下的人開始有些不耐煩了，歌舞就開始了。有一個歌手用唱歌來說笑話，他諷刺了印度的政治領袖和宗教領袖，贏得觀眾笑聲和熱烈的鼓掌。我雖然聽不懂他在唱些什麼，但卻被群眾的快樂的情緒感染了，本來聽著演講快要瞌睡了，馬上振奮起來。接著就是一場短的歌舞劇，故事是一個被軍警欺負的佃農在無望之下，正要上吊自殺，但是被一批起義的年輕人救了過來，於是他就跟著這些年輕人一起去打游擊了。雖然是個老套的故事，但還是受到觀眾熱烈的喝采。

第三天是全天的文藝節目，還有一個美術展覽，從這天的活動中看出來MR 2004很重視文藝美術的宣傳在群眾運動中的重要性。第四天本來要大家一起走去當地的美國領事館抗議美國侵略伊拉克的戰爭，但是印度當局臨時取消了遊行的許可證。結果大家只好改去一個離孟買兩小時公車路的公園開一場大會，有上萬人參加。（註三）

WSF與ILPS成立的背景

到底這兩個反「全球化」的大會有什麼不同？我們該如何瞭解它們之間的爭議？

WSF第一次的會於2001年在巴西的阿雷格里港（Porto Alegre）舉行，它是由巴西的工人黨（Workers Party）、法國「徵收金融交

註二：除了解說會外還有較大型的討論會，這些會分為七個主題。請參看WSF網站。

註三：公園名字是August Kranti Maiden，當年甘地爭取獨立時也曾在這公園示威。

易稅援助公民聯合會」(ATTAC—Action for Taxation of financial Transactions for the Aid of Citizens) 和其它八十幾個團體合辦的(註四)。巴西工人黨的主席魯拉去年當選巴西總統。阿雷格里港是Rio Grande省的首都，當時巴西工人黨正是這一省執政的社會民主聯合政府中的一員。ATTAC則是主張課徵金融交易稅，再用捐稅所得收入來幫貧苦的人。「世界社會論壇」的名字是針對七大國在達沃斯(Davos)所開的「世界經濟論壇」而來的，意思是說社會的問題與經濟問題同樣重要。1999年反全球化的運動在西雅圖取得一些成果，西雅圖的遊行抗爭阻止了世界貿易組織會議的進行，給參與這次運動的人帶來希望(註五)。「世界社會論壇」的原旨是給這些關心由全球化所帶來的社會問題的團體和個人一個可以彼此對話和討論的空間。WSF在2001年的第一屆大會有幾千個人參加，2002年的第二屆大會有幾萬人參加，去年的第三屆大會則約有十萬個人參加。

「國際人民鬥爭同盟」(ILPS)是在2002年5月成立的，它是一個由許多反帝群眾運動組織所組成的同盟，這個同盟是建立在一個廣泛的反帝基礎上，成立時有一百多個群眾組織成為會員。「孟買抗爭大會」(MR 2004)是由ILPS主辦。去年九月由二十幾個團體發起籌備MR 2004，到今年開會時，則有三百多個來自印度各地和世界其它國家的群眾組織參加(註六)。MR 2004與WSF的爭議在一年前「亞洲社會論壇」(Asian Social Forum, ASF)在印度的海德拉巴舉行時就開始了。

它們之間的爭議主要有下面幾點，我因為贊成MR 2004對WSF的批評，所以我的立場並不是中立的。MR 2004對WSF的批評並不是針對參加WSF的群眾，他們認為參加WSF的人絕大多數都是看到全球化給人民帶來災害和苦難，希望能在彼此討論中交換經驗，找到

解決的辦法。MR 2004對WSF的批評是針對它的領導人，MR 2004認為WSF的領導人決定了它發展的方向，而這發展的方向使得WSF不但不能凝聚反帝的力量，而且還可能轉移了許多反帝團體的方向。下面就MR 2004對WSF的批評來說明它們之間的爭議，可以歸納成幾點：

註四：一共有八十幾個組織，其中重要的有：Workers Party, ATTAC, Latin American Council of Social Sciences, Samir Amin's World Forum of Alternatives, Social Forum of Genoa, important organization linked to the Catholic church, the French/Brazil part of the Trotskyite Fourth International (Revolutionary Communist League) and the Communist Refoundation from Italy.

註五：反全球化的運動的歷史在《批判與再造》的第四期中已經有介紹，這裡要更正的一點是反全球化的運動並不是從1999年在西雅圖開始的。1996年時，菲律賓就有一次大規模的反帝國主義全球化的運動。這年的11月「亞太經濟合作會」(Asian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在馬尼拉開會，菲律賓的新民主愛國聯盟(BAYAN)組織了大規模的國際反帝國主義全球化的大會。1997年APEC又在加拿大溫哥華開會，加拿大的一些團體主辦了另一次反帝國主義全球化的國際大會。1998年APEC在馬來西亞的吉隆坡開會，亞洲各國的群眾組織又聯合起來開反帝國主義全球化的大會。

註六：印度的團體有全國性的和地方性的兩百六十多個組織，其中包括：很多個工會組織、農民組織、好多個年輕人組織和學運組織、回教徒的組織、反帝國主義的組織、媒體、文化和雜誌等組織。還有一個五十幾個人的迎接委員會，其中有律師、文學家、詩人、教授、工會代表、前最高法院和前高級法院的法官、戲劇家、社會運動家、自由戰士、和新聞記者等。請見Mumbai Resistance的網站。



我們要的是經濟民主而不是政治民主。（第四屆WSF大會的遊行）

只要資本主義存在，資本全球化的災害就不會消除

（一）MR 2004認為WSF雖然指出了全球化所帶來的各種災害，但是沒有分析全球化背後的原因，並且WSF所反對的主要是新自由主義的政策，WSF希望能對新自由主義的政策加以改革。MR 2004則認為所謂全球化只是資本的全球化，是資本要擴張所以要打破國界，但是對勞動人民來說國界是照舊存在的。而全球化背後的推動力量是帝國主義，MR 2004認為只要資本主義存在一天，這些年來由資本擴張所帶來的災害就會繼續，是不能靠這樣或那樣的改革來根本解決的。但是MR 2004並不反對在體制內作改革的抗爭，事實上參加MR 2004的許多團體都在WSF主持了各種解說會。

（二）與第一點相關連的是MR 2004認為辯論雖然重要，但是不能沒完沒了的辯論，辯論應該只是手段，不是目的，MR 2004認為在解說會中的辯論或是在體制內的改革都是為了組織群眾和團結群眾，目的是為了要把反帝的運動向前推進一步。

（三）MR 2004批評WSF說WSF的大部份資源來自大的基金會和少數幾個政府，以及由它們所支持的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NGOs）（註七）。MR 2004認為NGOs雖然也常與基層群眾一起工作，但與群眾團體不同，因為它們的資源來自各個基金會，而基金會有它們自己的宗旨和目的，所以NGOs能做的事必須要與基金會的宗旨和目的相符合。群眾組織是由群眾所支持的，它們要以群眾的長期利益為最優先考慮，要對群眾負責。

註七：包括福特基金會和由福特基金會所支持的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NGO's），也包括歐盟國會里的一個叫United Left的組織、德國綠黨的一個名為Heinrich Boll的基金會、加拿大外交部之下的一個叫Droits et Democratie的基金會、和由荷蘭政府與歐盟所支持的一個叫ICCO宗教性質的組織，再加上一些巴西的NGOs等等。



社會主義的世界是可能的。
(第四屆WSF大會的遊行)

WSF認為由NGOs所形成的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是一股抵制當權者的力量。MR 2004則認為WSF所指的公民社會不分階級，MR 2004認為公民社會不是一個有著共同利益的實體，公民社會中有壓迫階級和被壓迫階級，這兩個階級的利益不是一致的，而是互相矛盾的。

MR 2004還指出西方國家花很多錢來支持落後國家的NGOs，以便來影響這些國家的政治。在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共有五萬個NGOs。在2001年時，印度有兩萬三千個NGOs，它們在這一年中受到來自國外各方面的支援，共約十億美元，其中來自美國的資金最多，英國第二，德國第三。(WSF: Dissent or Diversion?)

「世界社會論壇」與世界的當權者妥協

(四) MR 2004認為WSF與現在世界權力中心的關係是妥協的。因為WSF的領導人中不少都是目前執政者或是跟執政者之間有密切關係的人，像在印度主辦WSF的組織之一的印度的共產黨(是一個主張社會民主的政

黨，是聯合政府中的一員)在去年的「亞洲社會論壇」時，他們在會中完全不肯批評印度政府所執行的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的政策。巴西的魯拉在他當選了總統之後，參加了「世界社會論壇」的第三屆會後，馬上直飛到達沃斯去參加七大國主辦的「世界經濟論壇」。他自稱要做這兩個論壇之間的橋樑，使這兩個論壇可以彼此對話，以便能更好的處理國際之間的貿易和投資的各種議題。

即使像世界銀行這樣的機構對WSF也是肯定的，在2003年WSF開第三屆大會時，世界銀行的總裁致函祝賀，信中這樣說：“我的同仁和我對過去兩次「世界社會論壇」中辯論的議題都很注意，我們也會有興趣來討論你們今年會中的意見和提議……我們可以更緊密的一起合作。”(The Economics and Politics of the World Social Forum, 29)

(五) MR 2004認為WSF的性質可以從它的會章中看出來。WSF雖然沒有直接反對馬克思有關社會發展的理論，但是在WSF的會章中說明它不贊成對經濟、社會發展、和歷史持有集中的和用簡單的推論的看法，MR

2004認為這是他們對馬克思理論的攻擊。WSF 以反對暴力為理由來反對人民的武裝鬥爭，MR 2004批評WSF說，他們只反對人民用武裝來保衛自己，但並不反對國家對人民施加的暴力。

(六) MR 2004認為也可以從WSF開會所邀請的人和被WSF所拒絕的團體來瞭解WSF的性質。WSF開第二屆大會時，法國總統派去好幾個高級政府官員和總統的助理，另外同行的還有巴黎的市長和三個法國的總統候選人等。那次會還有比利時的總理，以及葡萄牙的前任總統參加。這位前總統在他任內執行了新自由主義的政策，遭到葡萄牙工人階級的強烈的抗議。

在第一屆大會時，哥倫比亞的革命軍(The Revolutionary Armed Forces of Columbia, FARC)曾來參加，但是第二次開會時，WSF就不允許FARC來參加。WSF也拒絕墨西哥的查巴達民族解放軍(Zapatista fighters)參加，這兩個組織是當前反帝武裝鬥爭的前鋒。但是WSF以反對暴力的理由拒絕它們參加。

(七) MR 2004認為WSF提出了“有另一個世界的可能”(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這樣的口號，但是WSF卻不解釋它所指的另一個世界。因此“另一個世界”的口號是抽象的、是空洞的。MR 2004對它要追求的世界是很明確的，那就是一個往社會主義邁進的社

會。

以上是我對這兩個不同的反全球化大會的瞭解。上一期的《批判與再造》中的〈“反全球化運動”的特徵及其在“911”事件後的發展〉一文，曾提到了「世界社會論壇」在第二屆大會時產生了分裂，我認為這是正確的。而現今還留在WSF裡面的應該是屬於溫和的改良派。

這次去孟買沒有時間也沒有機會到這個城的各區去看一看，在公車經過的路上，看到的到處都是無家可歸的貧民，他們的狀況是極為悲慘的，是遠超過生活在台灣的人可以想像的。WSF請來了得諾貝爾獎金得主和其他的知名的學者和好多個政府的高級官員(註八)。孟買的三家英文報紙每天都有報導WSF的新聞，和記者對這些大人物的訪問，這些人都住在高級旅館，我則懷疑他們有沒有看到街上這麼多的貧苦的人，也懷疑他們真的能提出解救這些人的方案。◎

註八：學者之一就是得諾貝爾獎的史迪格里茲(Joseph Stiglitz)。史迪格里茲是《全球化的許諾與失落》一書的作者。史迪格里茲一場演講的報酬是很高的，由此可見WSF資源的豐富。見報的還有南非的一位高等法院的法官，和南非前總統曼德拉的前妻Winnie Mandela。

參考資料

1. The Economics and Politics of the World Social Forum, Lessons for the Struggle against 'Globalization', Aspects of India's Economy, no.35, Research Unit for Political Economy, First Published, September 2003, Second Printing, October 2003
2. Mumbai Resistance-2004, Against Imperialist Globalization and War, January 14, 2004
3. WSF: Dissent or Diversion? New Vistas Publications, December 2003
4. <http://www.mumbaioresistance.org>
5. <http://www.worldsocialforum.org>

RCA職工系列專訪之四

嚴寒未摧傲霜枝

訪RCA自救會黃春窈女士

訪問■杜繼平 / 整理■林育群



RCA自救會黃春窈女士

窮困的農家生活

■：請你談談你的出身。

□：我生於民國43年，家裡有八個姊妹，我排行老七，家裡一直務農，我們是375減租的佃農，主要是跟黃家的祭祀公業承租土地來耕作，直到去年因為土地變更成住宅用地才被收回土地，也才變更身份。我爸爸是閩南人，搬到客家庄來住，媽媽是客家人。父親養我們非常辛苦，從前我們家有蠻多的船，跟琉球做貿易，載糖過去，載木材回來，約是在民國39年左右，整個船隊在琉球那邊被沒收了。我爸爸就認份回來耕田，因為窮，所以大部分都用堆肥，到街上去幫人家清糞坑挑大便、尿回家當肥料。大部分都是種稻，中間有種過甘蔗，那時候窮嘛，你在這邊看著，那邊就被人家偷了，乾旱的地就種花生。蠻辛苦的，就是沒錢，農業時期都沒錢。

我的姊姊都沒讀到什麼書，小學一畢業就到紡織廠當童工，大概19、20歲就結婚了，只有一個嫁給農人，其他都嫁到都市去了，因為耕田的實在很辛苦。像我讀小學的時候，都快要學期結

束了，還沒有錢繳學費，老師把我們趕回家拿學費，走到半路，我們根本就不回家，因為知道家裡根本沒錢嘛，所以就路上玩了一兩個小時再回去跟老師說沒錢。那時候我們在楊梅來講，是最沒有錢的，尤其我們家又沒有男生，女生當男生用，很辛苦。

■：你是怎麼進RCA的？

□：國中畢業還未滿16歲，我就到日本系的TDK電子公司，在實驗室裡面，做整理資料的工作。白天工作，晚上上高中夜校，半工半讀，一直到我專科一年級升二年級的時候，才進到RCA。

當時TDK資遣員工，我領了資遣費後，那時候通用（G·E）跟RCA這些美國大公司也紛紛到台灣設廠。我看到RCA在報紙登的徵人廣告，我就到中壢一廠的品管部門當檢驗員。我是63年3月進去實習，到6月1日正式上班，一直待到關廠。到RCA後覺得很不錯，美商公司不像日系公司那麼刻板，比較活潑，薪資也比較高。品管有兩種，一種是技術品管，另外一種是沒有技術的，薪水比較低，我通過國際認證的CQT考試合格，薪水比較高。

在TDK的時候，工資才700多塊，那時候來講已經不得了，但是RCA的薪水更高，有兩三千塊，作業員也有八九百塊，到我走的時候，薪資有2萬5千多塊，大學畢業也不見得拿得到那個錢。我剛進去的時候台灣經濟正起飛，有很多班可以加，天天加班，禮拜六、禮拜天也加班，加班薪資是正常工時工資的1.5倍左右，加班費有時候領的比

本薪還多，差不多到79年左右才開始走下坡。我們那時候是隔週雙休，別的公司沒有，但我們平常上班時間長一點，比照美式。日系的公司是一天八九個小時都得埋頭苦幹，連上廁所的時間都很少。在RCA來講，線上的小姐要一直插零件，但我們幹品管檢驗的就比較有彈性，只要把抽樣檢查搞好，報表寫完就可以交差了。

品管部門的現場員工全部罹病

■：RCA的生產線上有很多致癌的物質，能不能簡單描述當時你在RCA的工作狀況？

□：我的工作是在現場，慘就慘在這裡。在整個流程當中，她們插零件，我剛好就是在焊錫爐的前面跟後面。PC板要先沾一下松香補焊劑再到焊錫爐，焊錫爐溫度非常高，速度也蠻快的，焊完之後用有機溶劑清洗，再出去。出去的時候我要在那邊檢驗。就是說PC板經過松香槽之前我要檢驗一下，看有沒有漏零件，或是零件、電阻有沒插錯，一個插錯整排都錯。焊完了我要看PC板的焊錫面如何。所以我在焊之前跟焊之後都要檢查。

我們以前都是講溶劑溶劑，不曉得成分是什麼，後來才知道裡面有三氯乙烯，一直到RCA關廠之後才規定說不准使用，那時後我們都沒有那種危機意識，我們只知道說那是清洗的溶劑，PC板從焊錫爐一過來還熱熱的，我們就拿起來檢查，手套戴不要多久就黏黏的。我們一廠品管部門

14、15個人，所有的人員都有病，4個人得到癌症，其他還有像腦瘤呀、流產。關廠那麼久了，廠裡到現在連一隻蜘蛛都活不了，你看多毒呀，我們現在進去看不到老鼠、蟑螂，可見裡面污染多嚴重。我們當時用完的清潔劑，有的會直接倒到水槽裡，像我們廁所門口旁邊的飲水機，濾過的水，還會有綠綠、黃黃的顏色，飲水機用沒多久就要換，辦公室的人喝的則都是玻璃裝的蒸餾水。

■：你得的是什麼癌症？是怎麼發現的？

□：我得到的是鼻咽癌，為什麼會是在鼻咽罹癌？我的工作就是剛好天天直接接觸三氯乙烯那些溶劑，天天聞那種同樣味道沒什麼感覺，因為很習慣了，但一段時間沒有接觸後再聞到那味道，就會覺得很臭。罹癌的原因可能是環境污染，也可能是遺傳、飲食的問題。遺傳這個因素就要摒除了，因為我爸爸已經高齡99歲了，我們家八個姊妹都還健在，我媽媽活到八十多歲去世是因為跌倒，我們家完全都沒有遺傳的問題。

我離開R C A後，在建設公司工作，有一回公司去普吉島旅遊，回來後感冒，聲音都啞啞的，一個多月沒辦法好，有一天，脖子腫脹，我還以為是腮腺炎。後來我媽媽跌傷在長庚醫院治療，我趁照顧媽媽之便，順道看耳鼻喉科，醫生說可能是鼻咽癌，那時候我整個人傻了，問我要不要切片，我說好呀，我才知道切片那麼痛呀。檢驗切片得等一個禮拜，我不敢去看結果，是我姊姊跟我妹妹幫我去醫院看的，病理檢驗報告說不是癌，她們兩個很高興的回

來跟我講，之後心防就卸下來，也不敢再去檢驗，但癌是倍數成長，腫瘤越來越大，慢慢就覺得頭不好轉動。

受盡癌症治療的痛苦折磨

■：第一次檢查沒有問題，後來又是怎麼發現是癌症？那時候的心情又是如何？

□：後來我妹夫的一個親戚在和信醫院住院，我去看他，剛好他的主治醫生在那邊，我就問那個醫生說：奇怪，我這個東西怎麼不會好？他的主治醫生就幫我安排檢查，抽取淋巴液化驗，一下子就判定是癌，而且是末期，因為已經轉移到淋巴了。

講實在話，每一個人聽到癌一定跟死亡是劃等號的，尤其是末期，一下子人呆了，不知道怎麼說，真的很難過。第一次長庚的醫生跟我講我有可能是癌的時候，我都不知道是怎麼回到家的，只知回到家的時候，燈都不會開了，那種哀傷不是掉眼淚就可以釋懷的，已經不知道怎麼辦好，那時候的心情覺得什麼都是空的，腦子裡一片空白，什麼都沒法想，只是覺得我怎麼會得癌？我怎麼辦？孩子怎麼辦？那時候孩子都還小，大女兒讀高中，小兒子讀國中，兩個孩子怎麼辦？

之後我妹夫跟我講一句話：有病就要醫，要勇敢面對，你不要想把孩子的責任卸給我，我不會幫你養的。他就是要你感覺自己還有責任，不要把你的責任卸到我身上來就一走了之，你自己有病就要去面對現實。和信醫院也很快幫我安排住院做化學醫療，我就呆呆的去做。

所有的癌症最痛苦的是鼻咽癌，放射線照整個頭部，都照到黑了，口腔裡面糜爛，整個爛掉。因為我是放射線跟化療同步進行，非常痛苦，是所有癌症最痛苦的一種，連吞口水都像刀割一樣，完全沒有唾液，進食都得插管，那時候對插管很恐懼，因為看過我媽媽在病房裡插管、抽痰，很痛苦，印象很深，就一直拒絕。醫生就跟我講說沒有營養是不行的，很多人得癌是餓死的不是病死的，你自己沒有意志力了，認為完了，得到癌症一定死了，就會一直往死路上走，人的意志力最重要，要不然就是餓死的，因為你沒有體力對抗癌細胞，也會很慘，到最後是死了，所以他跟我講心理的建設，說你一定要吃。後來不是我的醫生，而是別的醫生來看，管子拿了就插，就幫我灌食了。在治療的時候，痛到嗎啡都沒有效，有一種止痛貼劑也沒有效，到最後是打針，我背了一個機器，沒多久就打一針。以10分為痛的極致來分級的話，牙痛才兩分，生孩子的痛是五分，我那個痛是八分啊，這樣你才知道有多痛。在化療與放射同時進行時，就一直想吐。

備感親友的深厚情誼

■：怎麼熬過發病這段期間的痛苦？

□：面對它，就呆呆的過，不去管下一個療程是什麼，我不想去問，因為你一直去問的話，心理會害怕，你越害怕，就跟當初先知道插鼻胃管會很痛像我媽媽那樣，就會害怕。我就這樣慢慢熬過來，

跟醫生配合，會去看一些正面的書刊、錄音帶，就像人家講的，過了一天就賺了一天，不給自己壓力。我前一陣子還有上班，現在沒了，感覺壓力一來的時候，身體就會不舒服，我覺得我不能給自己壓力，呆呆這樣子過日子，我覺得老天對我很厚愛，一天天這樣過得蠻順利的。

今天如果不跟人家講我生病，沒有人知道。我在生病的時候覺得我的姊妹很好，像我五姐每次去醫院，都慢慢地滴雞湯汁給我喝，熬了30幾隻雞給我，補充我的體力，我妹來講，天天都到醫院，我妹妹瘦的比我快，那種壓力喘不過氣。還有RCA的好朋友，就像自己的姊妹一樣，如楊春英，會作民俗療法的按摩，我經常打針，那條打針的血管會整個硬化掉會鈣化掉，完全沒辦法打，她就每天騎摩托車到楊梅來，天天幫我按摩。當我生病的時候才知道我不寂寞，我的同事我的姊妹都很用心在對我。那些朋友並沒有因為我生病了而離開，反而對我關懷，而且還有一點，她們面對我的時候，不會哭喪著臉，不把我當病人，連我的孩子也不把我當病人看。

整個療程差不多有七八個月，一段時間在醫院，一段時間在家，最慘的是有一次我的白血球指數曾下降到200，只要打一個噴嚏人就完了。一般正常做化療要2000多才可以，我已經下降到200，在發高燒了，意識已經模糊了，馬上到醫院急診，打了很多紅血球、血小板。生病的時候假如沒有我妹妹金錢上的支援是沒辦法度過的，因為在和信

醫院，你要用好一點的藥，用止吐的藥，要自費，因為以前的藥沒有那麼先進也比較貴，住在那邊不算勞保病房，住一天5000，算是比較便宜的，斷斷續續一個療程一個療程住十天、八天，如果你沒有打止吐針，就吐到完走人。我連喝水都必須要加麻藥，加在生理食鹽水中，把整個嘴巴麻掉才能吞水。經過八九個月之後才比較好，慢慢的康復起來，有一些東西都往正面去想。

工會頭頭只想撈油水

■：在治療之後，你的身體狀況如何？

□：人的精神跟智力都差很多，人生病了什麼都開始改變，我覺得智力改變很多。而且化療的痛苦，副作用一直到今天都還有，到現在還有痛苦，副作用會一直出現，我現在手上一定要拿水，沒有拿水我會很緊張，因為我沒有唾液，我舌頭整個乾乾的，沒有辦法講話。

每一年都還要做一次大檢查，做骨骼掃描、斷層掃描。還會疑神疑鬼的，像我現在有中耳炎，聽不太到，兩隻耳朵會耳鳴，醫生說裡面的組織已經照壞掉了，我講話的音量很大，因為我自己聽不到，我就會講的比較大聲，而且聲音比較爛，我現在唱歌唱不起來，音拉不起來，沒辦法唱。我吃飯還是要湯湯水水，一碗飯大概要兩三杯的水，要不然吃不下去。鼻塞的話，有沾黏影響到頭腦，頭會痛，鼻咽癌一般會往骨骼與腦部轉移，所以才要做骨骼跟腦波的檢查。前幾天我覺得又不舒服了，又去做內視鏡。外表比較看不出，因為我們不

是斷手斷腳，不講的話沒人知道。

■：你是工會代表，比較清楚工會的情況，在之前的訪談，我們也粗略知道RCA工會的狀況並不好，工會投票有沒有指定的狀況？為什麼理事都是經理？請你談談工會的情況。

□：我是80年進入工會，那時候我比較開朗，想進去工會爭取福利，我進去的時候工廠已經要縮編了。代表、理事是用選舉方式產生的，自己的部門自己去運作產生，但經理都會運用他們的人事關係，你拿他沒輒，所以像我們理事長林亨源是物料部的大經理，有時候我們開會都會故意避開他，但是決定權還是在他手上，蠻累的，使不上力。

■：工會應是站在員工這邊，跟資方一定會有些衝突，你怎麼看工會的作用？

□：工會第一個就是爭取福利，依照法律去保護員工，爭取休息的時間，所以我們的休息的時間比別人多，工作時間比別人少，萬一他要裁員的話，我們會去爭取資遣的員工的福利。之前工會的運作就是每個月開個會，五一勞動節發個禮品，每個月薪水裡面都有工會的基金，就報告運用的狀況。

政府推諉責任，勞工無生命尊嚴

■：當時裁員時，你們是怎麼跟資方談判的？

□：當時廠務經理王慶賢代表資方，決定權很大，工會理事長又是有十塊錢吃九塊錢，只想撈油水，當他油水吃飽了，他管你那麼多，他沒有站在員工的立場上去看，他只知道要怎麼撈油水。如果是台灣老闆，我們比較好談，問題是我們的老闆是法國人（按：RCA產權在

末期轉移給了法國湯姆笙公司)，我們就很難談。

法國那時候還有派一個人來談，但法文我們完全不懂，翻譯又是資方的，上了談判桌根本就張不了口去跟人家談，他開了一瓶 XO 來喝，我們台灣人喝酒喜歡乾杯，他見了馬上很生氣，就噓你說，這是我們的國寶，你們這樣喝有點像烏龜吃大麥，糟蹋糧食，他說你應該把酒含在嘴裡面，繞兩圈，然後在喉嚨裡再繞個兩三圈才可以下肚。他就是這樣，一開始就噓你了，那時候我們都感覺不得了，英國人、法國人和美國人，好像都比較高我們一等，假如那時候的外語很好的話，或許我們還有辦法表達，問題是這些工人階級，什麼話都講不出來，我們工會裡面雖然是有一些經理，問題你要跟法國人講就是差，你一接觸就聽不懂的感覺，因為他講的是英系的英文，英系和美系不一樣。

我們本身的話第一個語言不通，第二點他的氣勢比你強，第三點我們只知道要去爭取乘數，所以那個談判變成一個形式，但我們已經盡了力。到最後是爭取到依照你的年資去計算資遣費的乘數，比別家的優厚，比如說人家是乘上 1.2，全部適用 1.2，像我們不一樣，就是你做的年資越久，乘上越多，依現在的想法，大家可能不會接受這樣的資遣條件了。可是那時候只要比一般的工廠好一點，大家都可以接受。如果那時候有環保意識的話，我們還可以要到很多很多，當時完全就是沒有環保意識。今天 RCA 的事件發生了，至少大家都知

道三氯乙烯、四氯乙烯這種東西是有毒的物質，對員工來講，最好能夠教育他們保護自己，不要等事情發生了，才來談保護。

■：RCA 污染的問題暴露出來後有沒有求助於政府？

□：事情發生之後，當時的桃園縣長呂秀蓮，我們有跟她反應，她完全沒出面，開會都不來。在趙少康揭發之後，政府推諉責任，完全不管我們這些人。假如這件事情發生在別的國家，政府應該都會站在自己人民的立場上。今天不是這樣，這些廠商賺飽了錢走了，你的人民生病了跟你的土地被污染了，都已經是事實了，政府卻沒有站出來。真正生病的都是第一線的員工，職員都在樓上工作，跟樓下的中央空調是分開的，職員都是比較有能力的。

不要講政府，就連 RCA 裡面的員工，如果沒有得病，也事不關己的樣子，除非你得到病才會跳出來，你跳出來又怎樣，政府也不幫忙呀，很無助感，一堆老弱殘兵去喊根本沒用，抗爭是要有力氣的，我們這些要不有病，要不就是年紀大，輕輕一推說不一定就出事，有什麼辦法。而且向線上的員工本來就是比較沒有辦法，比較弱勢，政府怎麼可以不幫忙？我們完全沒有求助的管道，這件事情發生唯一能喚醒的大概就是大家的環保意識，可是土地也被污染了，連尊嚴也討不回來。這個政府真是太爛了，還講什麼人權？我們的命就不是人權？今天台灣的經濟都是我們打拚出來的，如果沒有我們這些人會有經濟奇蹟嗎？◎

統獨之爭不歇 台灣民主無鞏固之日

■張懷忠

按照西方主流政治學的觀點，所謂「民主」，用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的說法就是：「由被統治的人民通過競爭性的選舉選出領導人。」台灣從1987年解除戒嚴，開放黨禁，撤銷新聞管制，歷經1992的立委全面改選與1996年的總統普選，可謂具備了民主的形式要件，這些年來朝野上下自以為完成了民主化的「政治奇蹟」而沾沾自喜。但究其實際，則是徒具形式，華而不實，民主的根基並不穩固。陳水扁在這次總統大選中，曲解公投法第十七條的精神，公然違反憲法，藐視法律，罔顧台灣內外排山倒海而來的反對聲浪，一意孤行地執意要舉辦公投，就是最明顯的例證。

違法公投，破壞民主體制

美國研究民主的轉型與鞏固問題的著名學者林茲（Juan J. Linz）與史德本（Alfred Stepan）指出，民主體制必須達到三個最低條件才可能談得上民主的鞏固，其中之一就是：「除非統治者用民主的方式治理，否則就不能稱為民主的體制。如果經自由選舉選出的統治者（不論其得票是絕對多數或相對多數）違背憲法，侵犯個人與少數群體的權利，危害立法機構的合法職權，從而未依法憲施行統治，那就稱不上是民主體制。」準此而論，陳水扁這次為了利用公投騙取台獨基本教義派與不明民主真諦的選民的選票，在兩岸並未面臨戰爭緊急狀態下，違反公投法規定的正常程序，未經公

民連署，迴避立法院的監督，擅自強行發動公投，致前司法院長與6位曾職司釋憲的前任大法官領銜率同數百位法律學者、律師公開登報譴責為違憲違法，正是在世人面前暴露了台灣尚不夠資格稱為民主政體。民進黨此番高舉「民主深化」的大義名份為違法背理的公投矯飾強辯，實則是破壞體質虛弱、根基不固的台灣民主，成了使台灣民主大幅倒退的歷史罪人。

台灣的民主之所以難以鞏固，根本要害在於台灣內部的國家認同有著重大的分歧。自由主義的民主理論根據市場經濟的法則，提出「社會契約」論，認為生而自由平等的各個個體，為了保障生命、財產與自由才在自由意志下訂立契約，建立國家，授權給政府進行統治。在這樣的設想中，國家是由不相聯屬、猶如原子般的孤立個人構成的，他身上沒有文化傳統的烙印，沒有由成長環境中襲取的歷史感與價值觀，也就沒有特定的集體認同與感情，有的只是對一己利益的理性計算，因而他的公民身份僅具法律權利的內涵，國家之於他也只是保護個人利益的工具。這種觀點忽視了民族意識與感情對國家構成與民主政治的重要性，與現實並不相符。德國著名的法學家施密特（Carl Schmitt）與美國的「共同體論」（communitarianism）學者都對此提出了深刻的批評。德國法蘭克福學派的代表人物哈伯馬斯（J. Habermas）就指出，歐洲民族國家的建立及其民主化都是在基於共同歷史、語言與文化的民族認同的庇蔭下才完成的。不幸的是，台

灣的民主化進程卻不斷遭受民族與國家認同分裂的嚴重干擾。

公投自決建國無民主理論根據

多年來，以閩南裔台灣人為核心的台灣分離主義者，始終拿「民主」充當圖謀與中國分離的工具，把民主與台獨劃上等號。在他們的設想中，台籍（尤其是閩南裔）人口佔台灣的絕大多數，只要高唱「民主」、「自決」喚起台籍人士的認同，就可獨立建國。早期他們訴諸「台灣民族自決」，通過扭曲史料，醜詆中國、中華民族，編造台灣歷史神話，意圖建立台灣人仇中、反華的台灣民族意識。到二十世紀的九十年代，逐漸放棄荒唐至極、充滿閩南沙文主義的「台灣民族」論，效法十八、十九世紀西方民族國家以民主普選來凝聚國民愛國心、鞏固政權合法性的故智，開始淡化省籍訴求，提出「不論省籍、不分先來後到，只要認同台灣都是台灣人」的「新台灣人」論，改以建構「公民民族主義」(civic nationalism) 為分離的手段。但淪入骨髓的閩南沙文主義不時還要顯露，一到選舉更是成為動員利器。

台灣分離主義者建構台灣「公民民族主義」的手法是：通過歷史教育、文學與媒體潛移默化，改變台灣人民的歷史觀與文化意識，利用選舉宣傳、動員，培養台灣人民建立與中國有別的國民意識，積極鼓動人民公投制憲以落實人民主

權論，只要多數人民願意參與制憲過程，共同完成制憲工程，台獨對抗統一的「公民民族主義」便可告確立生根。陳水扁這次悍然破壞民主法治精神，強行舉辦看似毫無意義的公投，一方面是藉此鞏固基本票源，以挽頹勢，另一方面則是以公投凝聚反對統一分離意識，充當強化「公民民族主義」意識的工具。

台灣分離勢力想利用所謂「人民主權」、「公民投票」、「民主自決」這些看似符合民主原則的手段達成脫離中國的目的，其實是對民主理論一知半解而滋生的幻想。美國最著名的民主理論家達爾(Robert Dahl)早已指出想靠公投這類民主程序達成政治獨立，無法在民主理論中找到站得住腳的依據，民主程序必須在既定的國家疆域內施行才能生效，而今天統獨之爭的關鍵正是主權與領土範圍的爭議。

前面已引述過的美國學者林茲(Linz)與史德本(Stepan)曾明確表示，任何地區只要在境外還有強大的民族統一勢力，建立民族國家與鞏固民主就會產生衝突，無法兼顧。其中理由至為明白，當人民、黨派在民族與國家認同上分歧對立，彼此互懷「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不信任感，雙方的關係便會成為敵我矛盾而非內部矛盾，豈能理性、平和地辯論重大政策，統合公意？台灣長期來的政治亂象就是明證。由此可以預言，只要統獨之爭一日不得解決，台灣的民主也就無鞏固之日。◎

參考書目

- | | |
|--|---|
| 1. Dahl, R. (1989) Democracy and Its Critics.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Oter.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
| 2. Diamond, L. and Marc F. Plattner eds. (2001) The Global Divergence of Democracies.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5. Huntington, S. (1991) The Third Wave. Norman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
| 3. Habermas, J. (1998) Between Facts and Norm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 6. Linz, J.L. and Alfred Stepan (2001 [1995]) "Toward Consolidated Democracies." in L. Diamond and Marc F. Plattner eds. (2001) |
| 4. Habermas, J. (1999) The Inclusion of the | 7. Schmitt, C. (1985) The Crisis of Parliamentary Democracy.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

目前中國大陸的學術思想界可粗略地分成保守的新自由主義右派、強調國家在保護民族資本與財富重分配上的作用的社會民主派與馬克思主義派。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的左大培先生這些年來不遺餘力地批判當局與右派經濟學者迷信自由貿易論，汲汲於加入WTO，為跨國資本的入侵大開方便之門，極其不利於中國民族工業的發展，從而使中國有淪為經濟殖民地之虞，這頗類於十九世紀德國國家經濟學鼻祖李斯特（F. List）的觀點。左大培先生這篇講話記錄稿很能反映大陸愛國的社會民主派的思維，本刊特予轉載，以助讀者認識大陸思潮。■□編者

在烏有之鄉書吧
的講座【2003年9月
20日】

■左大培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學術界有人爭著賣國

中國是美國的經濟殖民地嗎？

我先介紹一篇文章。《亞洲華爾街時報》7月31日登了一篇文章，討論是否應該迫使人民幣升值，其核心觀點是，中國實際上是美國的殖民地，因此不需要讓人民幣升值。

其實我是保皇派，觀點看法都是為了國家發展，我很擔心中國成為美國或者發達國家的經濟殖民地。但是，沒想到《時報》登得這麼真實直接。人民幣如此緊的盯著美元，但是，人民幣對日元、對法郎早已經貶值了。我們對其他貨幣的匯率是升還是貶，完全是公開的。如果你真懂經濟史的話就可以發現，19世紀時殖民地與宗主國的貨幣是完全掛鉤的，因為你就是成員。19世紀的法郎區實際在經濟上就是法國殖民地。我主張人民幣可以適當升值，必要的時候也可以適當貶值。是升是貶，這是中國的貨幣主權，應該取決於中國經濟發展的需要，而不是外國經濟發展的需要。如果人民幣堅持和美元擺在一起，那麼，中國在客觀上就是美元區的一員，就會成為美國的經濟殖民地。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把政府因素擺進去，問題就更嚴重。我們可以設想，因為中國現在是由中國人自己領導的，所以還沒有人指責。如果是外國人在中國當總督，那麼世界上就會有很多國家和地區的人說：別人在剝削中國。

《時報》的文章說，其實人們應該感謝北京的政

策。中國的工資那麼低，又缺乏勞動保護，美國企業到中國投資可以賺大錢，美國消費者可以買到又便宜又好的商品，如果讓人民幣升值，美國老闆到哪裡去找這麼一個勞動力成本又低，社會又穩定的國家呢？

這的確是大實話。中國工資低，在市場上叫做成本低。為了進一步突出中國勞動力廉價的優勢，我們的一些地方和部門幹部不添置勞動安全設備，不把勞動安全，勞動保護當回事。中國每天發生的無數工傷事故我們看不到。挖煤是要死人的，中國是全世界出工傷事故最多的國家。煤礦裡發生這麼多事故，看看這些國營企業哪個增加工人的福利了！他們什麼時候顧這些工人的安全了？我們的資本家要降低成本。資本家認錢不認人。人命值多少錢？設備值多少錢？一比較，寧可多死人，不可投資購買礦井安全設備。你們在網上可以看到，石廣生〔編註：對外經貿部部長〕到社科院來搞講座，我就在下面給他遞了一個條子，問他這些些問題。但他卻沒有回答我。我們加入WTO，美國人迫使中國加入“勞工條款”。他們說得很漂亮，說你不能犧牲你的工人。如果中國工人待遇達不到WTO的標準，WTO就懲罰你。西方雖然是資本主義，但是由於工人運動的壯大，制定了很多保護工人安全的條款，對工傷事故是要檢查的，是要控制的。比如有毒氣體不能超過多少，超過了就要罰款，停業整頓你的生產。但是，西方的工會要求擴展到國際貿易裡面，註定引起第三世界國家政府的反感，因為這是在指揮第三世界國家。

好的勞動保護必須以中國經濟的獨立自主為前提

可悲啊！中國本來是工人當家作主的國家，本來中國工人應該有最好的勞動保護。但是，這必須以中國經濟的獨立自主為前提。如

果失去這個前提，中國想成為給發達國家打工的“世界加工廠”，就必須要用最低成本，即最低工資，最差勞動保護，去引吸外資，去爭取被剝削的機會，去和美國的工人、歐洲和工人競爭。而發達國家工會為了保住本國的工作崗位，就會千方百計要求發展中國家提高工人待遇，其真正目的卻是把發展中國家的工人擠出國際就業市場。於是，石廣生先生就可以理直氣壯地說，我們就是鬥爭不答應勞工條款，關稅可以談，勞工條款不能答應。

也就是說，由於中國在經濟上不能獨立自主，中國的工人不能自己組織起來生產，結果就得依靠外國資本，就落入了兩難困境。提高工資，加強勞動保護，就可能嚇跑外國資本，失去工作機會。而要吸引外國資本，就得接受血汗工資，隨著可能受傷甚至死亡。勞工待遇低這是事實啊。中國的煤礦大量出口，但在出口中卻始終占不了主力，賺不了多少錢。我們最缺乏資源。又犧牲人，又犧牲資源，可為什麼還有那麼多私營的小礦主在深山裡面挖煤？我是工人出身，幹過粗活重活，但那時還是國營企業，沒有生命危險。現在，私營煤礦的安全條件和解放前差不多啊，工人幹的根本就不是人幹的活。所謂的低成本，其實就是靠犧牲人。有摔斷胳膊的，頂多賠幾千，最多到一萬。很多礦主還千方百計地不想賠，想賴掉呢！失去工作，是安全地死亡；接受工作，就是危險地生存！也就是說，是這條給世界跨國資本打工的道路，將中國工人逼入了要錢還是要命的兩難選擇。

遺憾的是，石廣生不去思考中國為什麼不能選擇自主發展的道路，卻向國人炫耀自己是怎樣拒絕《勞工條款》，爭取危險地生存的權力。這種抗議，在美國老闆看來，其實是兩個工人在老闆面前爭風吃醋，相互壓價，自相殘殺！有什麼值得誇耀的！

迷信市場是錯誤的思想

聽眾提問：

左老師打斷你一下，你剛才講的降低成本，是為了生存。我覺得我們企業都是這麼做的。如果不這樣做，你的結果只有死路一條，經營破產。我們如果得不到外資的資助，根本不可能參與競爭，更不會有什麼技術優勢，就無法生存。所以我認為降低成本是必要的。

左大培：

你講的對，我下面要講的就是這個問題。中國人就是太迷信市場，要求政府不管、不干涉。現在有些右派學者天天極力鼓吹市場，要政府少管，根本這就是錯誤的思想。

我剛才說的故事還沒有講完。雖然中國沒有接受WTO的《勞工條款》，但中國還有《勞動法》啊。中國的《勞動法》在一些具體條款上甚至還比國際勞工協議好，比如，節假日的加班工資是平時工資的2倍，甚至3倍。但有一條不好，就是沒有罷工權。沒有罷工權，所有的條款沒有了後盾，都無法落實。靠一個個工人去打官司，幾乎沒有希望落實《勞動法》。深圳有一位律師專門受理工傷事故官司，這位打官司的律師反而被抓走了，說他擾亂治安。是啊，他家裡總住著一大批缺胳膊斷腿的民工，拿著法律要求10萬、8萬的賠償，這不是破壞投資環境嗎？干擾用廉價勞動力吸引外資的總路線嗎？

這就是經濟學講的“競爭產生的市場”。市場本身有毛病，理論上說政府應該干涉。可是，新自由主義者反對政府干涉，不要政府管。結果，老闆上了天堂，工人下了地獄。

當然，中國也不是真的不管。把給工人打官司的律師抓起來，這不就是在管嗎？只不過這種管，是保護資本，壓迫勞工。這和政府的性質、憲法的承諾完全背道而馳。

還有比如出口退稅。中國政府給出口企業

退的稅比他們上繳的稅收還多，甚至交1000元稅收，退2000元稅款。為什麼會出現這麼荒謬的事情呢？仔細一分析就知道了。比如，出口一塊價值100元的手錶，其中零部件採購費50元，加工組裝費30元，利潤20元。出口廠商上繳給國家的增值稅為 $(100 - 50) \times 17\% = 8.5$ 元錢。國家退稅則按100元出口額的17%退給手錶廠，即17元，即將全部生產環節的增值稅都退給了最後出口的廠家。這不是繳1000，退2000嗎？

假如我們沒有退稅這一塊，就不可能有這麼多的出口！政府補利潤，出口有利，所以出口高。我對人大說過這事，為什麼要有這個政策？每年1000多億的出口退稅額是不是可以用來支援高新技術的研製，比如大型民航客機，噴氣發動機，五軸聯動數控機床，船用柴油機？如果連續5年，每年拿出1000億來支持高技術部門的發展，我敢說，中國將來的出口額就能夠達到5萬億人民幣。因此這些產業都是高工資，高稅收，高利潤，高創匯的產業，是能夠讓中國經濟真正在世界上強大起來的產業。現在用大量的出口退稅去支持服裝、鞋帽、皮革、玩具的出口，發揮什麼廉價勞動力的比較優勢，完全是吃了上頓不顧下頓的短期行為，是讓中國經濟鎖定在世界經濟的打工者地位的錯誤方針。我敢打包票，外經貿部之所以不顧國家長遠利益，用出口退稅來換取出口額的不斷增長，這就是為了政績，為了他們自己能夠不斷往上爬。這就是中國政治的現實。不論你是出口還是進口，只要能做大你就有成績，就能升官。

跨國公司的弊大於利

關於跨國公司，大家應該特別注意的是，跨國公司的技術、品牌和中國的廉價勞動力結合起來，可以生產出世界上最質優價廉的產

品，並且可以有很大的壟斷定價的空間，既可以定低價把中國自己的產業擠垮，又可以定高價獲取200%、500%的壟斷利潤。跨國公司對中國的影響概括起來有兩方面，從短期上說、從吸引到跨國公司的地方政府的局部利益說，跨國公司有好處，可以提高就業和稅收，還可以繳地皮費。但是從長期上來看，從國家經濟的全局看，又帶來了很大很大的害處，兩者權衡比較就是弊大於利。這對中國經濟的影響是極壞的。

第一點好處直接來說就是增加了中國的資本，投資增加了中國的積累。第二，能夠解決一部分工人的就業問題。但從實質上講，恰恰相反。跨國公司從根本上是不可能把技術轉讓給中國的。他們不放心你們中國人，所以人家不願意給貸款，而是直接投資，到你們國家來自己幹。從短期看，搞多了些資本，增加了些就業，不管跨國公司怎麼保密，我們也能多少偷到些技術學到些東西，這些作用不可否認。但從實質上看是弊大於利的。你從歷史上看，最抵制外國跨國公司的國家現在都能成為第一世界。比如荷蘭，荷蘭的面積相當於中國的一個省，它的菲力浦電器一個就是幾千塊，這就是品牌效益。90至91年我在德國的時候，菲力浦就快完蛋了，但荷蘭全國人民都站出來說不能讓它完蛋，如果讓它引進外資就完了。這麼點兒的國家都明白這個道理。中國假如每一省搞一個菲力浦這樣的企業，中國就有30多個。法蘭西民族就很有骨氣，美國打伊拉克的時候法國就是站出來反對，你美國離開我什麼事也做不成！

我們現在來講一下跨國公司的壞處。第一，和我們的企業爭了市場。第二，搶了我們的投資機會。

跨國公司打垮中國企業，搶走市場

它把中國企業搞垮，搶走市場。其實，這

裡還有國家對外貿易政策上的原因。跨國公司為什麼積極對華投資呢？比如中國的汽車行業，中國開始的時候是實行保護政策，美國的汽車進來要加200%的關稅，所以它的成本再低，加完稅以後也掙不到錢。於是美國把企業建到中國，這就算本國企業了吧？他在這裡的目標是什麼？不就是繞開關稅，佔領我們中國的市場嗎？在沒有跨國公司進入的情況下，關稅可以保護本國企業。在有跨國公司進入的情況下，關稅保護的是跨國公司。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跨國公司其實比進口商品對國家經濟的危害更大。

引進跨國公司的害處就是你本國的企業將有一大批完蛋。再舉個例子，講講中國的汽水行業。在1985我讀博士的時候，我也說中國的汽水不好喝，我當時帶頭喝可口可樂。可是我喝了一年多以後，我發現印度在拼命地抵制外國的貿易，那我們中國為什麼不抵制？可口可樂有什麼好喝的，也沒營養，不喝它我們不也活著嗎？開始我也沒注意到這些，覺得沒有什麼，只要不關係我們國際民生大事——比如說糧食、鐵路，如果這些被外國佔有了到時候，他們同我們鬧翻了我們就沒有活路了——所以，飲料被外國佔領也沒什麼。但是現在看看，這只是從國家安全的角度看問題。如果講經濟效益，那就得把外國飲料企業阻擋在國內外。看看，它們佔領了多大的飲料市場！以前有很多汽水企業，但現在你看還有幾家？自從可口可樂、百氏可樂進來以後，多少中國飲料企業完蛋！有多少職工下崗！韓德強曾站出來說明這其中的道理——這叫“水淹七軍”！兩種可樂進來，殺死了我們七個最好的汽水企業，小的更是上千家！北京、天津的飲料企業被淹沒了，國有飲料企業全沒了。把你市場搶沒了，中國企業投資機會沒有了，造成中國國營企業的職工大批下崗，意義就不小了。他是

帶來了投資，也帶來了就業，但相應的國有企業員工大量下崗，但總的來說失去的就業機會比得到的更多。天津開發區的稅收增加了，但天津老城區的稅收下降了。因為外國企業有效率。它把市場占了一個，我們就倒兩個。

第三產業發展是個規律，勞動工人找不到工資較高的、有保障的正式工作幹，只好給富人端盤子、陪笑臉、做家務，第三產業就這樣發展了。為什麼說有的國家富、有的國家窮啊？一個窮人的世界與一個富人的世界差多少啊？可口可樂、百事可樂這樣霸佔我們的市場，其他企業還怎麼發展？還好我們中國還有一些有骨氣的企業家不願被打垮，做垂死掙扎，像健力寶、娃哈哈、非常可樂等。起初人家都說他們是非常瘋狂，瘋了，這個時候還敢打拼這個市場？我很佩服這些人，也就是他們為我們中國的民族企業佔領了一片天！

跨國公司搶走中國企業的投資機會

第二點我講跨國公司搶走了我們的投資機會。有一部分投資機會並不需要高技術，我們自己完全可以幹得很好，我們自己辦企業，企業有錢掙。可到了跨國公司來了以後，它先把你的優質勞動力奪走，又把你的市場影響力奪走（崇洋媚外等於給全部發達國家產品做了廣告），最後還和你爭奪銀行貸款，奪走你的資本。結果，人家出口了，你就不能出口了。現在中國出口值很大，但其中一半以上是跨國公司的內部貿易，出口增長最迅速，最可靠的就是這部分跨國公司的內部貿易。這種出口給中國只留下了非常微薄的工資，帶來的效益極低，但卻要記在中國的貿易順差中，成為美國要脅中國進口波音飛機的籌碼。

總之，跨國公司有兩個害處，總結起來就是，一挖了我們市場，二搶了我們就業和投資

機會，最後會使我們中國走向拉美化，到時候中國人也只能擺小攤賣東西。

學術界有人爭著賣國。我講的第一個事實是：十九世紀初，美國與拉美處於同一水平線上，都是人口少地方大。十九世紀美國保護本國企業的發展，結果本國企業成為國內乃至世界第一。而拉美則大量引進跨國公司，讓外國到它的國家建立分公司。本來美國是不產香蕉的，可美國聯合果品公司在巴西購買了香蕉生產基地。有關拉丁美洲怎樣淪落為美國的原材料基地、工業品傾銷地和廉價勞動力基地的故事，怎樣想搞貿易保護又被國內買辦勢力和國際壟斷勢力聯合摧毀的故事，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這本書就是我們向大家推薦的。

我講的第二個事實是，凡是保護自己企業發展的國家，現在絕大多數都是第一世界。比如日本，十九世紀明治維新以後經濟迅速發展，人家甲午戰爭打贏了，打敗中國了。據報導阿根廷人均收入在19世紀70年代排到過世界的第12位，工商業、礦業當時比日本強的多得多，但不搞貿易保護，垮下去了，而日本搞嚴格的貿易保護，則發達起來了。韓國不也是同樣的道理嗎？20世紀60、70年代韓國大力發展本國的民族產業，從政府到民間非國產轎車不買，非國內設備不用，結果現在韓國的轎車可以到北京來辦合資廠。美、日、韓都成為世界強國，而那些原先靠跨國公司的國家現在還都是第三世界國家。當然，韓國的地位還很不穩定，美國看到韓國的崛起，又氣又急，迫使韓國在90年代開放貿易，開放金融，結果在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中，韓國中箭落馬，大企業紛紛倒閉，被美國廉價收購。例如，福特汽車公司居然以零價格收購大宇汽車。現在，韓國唯一還挺得住的大企業是三星電子。

對中國歷史與自由貿易歷史的誤解

聽眾提問：

政府知道這個道理為什麼不這樣做？

左大培：

政府不一定知道這個道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一些知識份子總結經驗教訓，認為前三十年閉關鎖國讓中國落後了，中國要發展只有無條件開放，實行完全的自由貿易。今天這部分知識份子進了政府，成了學術界的領頭人，就鼓吹這一套。其實，他們是從一個極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如果客觀總結前三十年中國的所謂“閉關鎖國”時期，首先應該看到，中國的科學技術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機械、電子、核工業、航空航太工業、船舶工業，其發展速度是所有第三世界國家做夢都不敢想像的，包括韓國，這一時期內韓國技術的發展也沒有中國全面、迅速。韓國能造衛星、導彈、原子彈嗎？當然，在這一時期，全國人民生活水準提高不快，但這是大家在勒緊褲腰帶搞建設啊！那些認為中國前三十年不發展的知識份子是對自己的工資不漲、地位不高耿耿於懷啊！他們這一錯誤總結誤導了全國知識份子和普通百姓的感受，讓老百姓看不到中國前三十年的成就，看不到“閉關鎖國”的合理面，這才會有一面倒的自由貿易政策。

真要追究起來，“閉關鎖國”之說並不成立。香港是中國當時保留的國際貿易通道。70年代初中美乒乓外交後，第二年就進口了13條化肥生產線。由此可見，其實，並不是中國“閉關鎖國”，而是發達國家不希望中國獨立，從外部對中國進行封鎖，妄圖用封鎖將新中國扼殺在搖籃裡。

從歷史上看，清朝的衰落是因為“閉關鎖國”嗎？恐怕恰恰相反，是因為鴉片戰爭打開中國國門，強迫中國進行自由貿易的結果吧。再往前追溯，鴉片戰爭之所以打起來，是因為

英國對中國貿易長期逆差，白銀大量流失，不得不用鴉片來與中國的布匹、絲綢、茶葉交換。也就是說，鴉片戰爭以前，中國在國際上具有強大的競爭力，清朝從總體上是自由貿易的，而且是在自由貿易中獲得了國際經濟中心地位的。只有在英國工業革命近100年後，即1870年前後，中國與西方的貿易才從順差轉為逆差，並進一步淪入為西方經濟的殖民地的。

正是由於這中國歷史和自由貿易歷史的誤解，才造成了今天中國的輿論奇怪地倒向跨國公司一邊，甚至連一些主觀上愛國的人都在客觀上幫著賣國。

中國有一批賣國的經濟學家

其次，也是在這種輿論主導下，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就等同於國家利益的最大化。結果，貪污腐敗被美化成推動中國繁榮昌盛的發動機，國有企業的愛國主義的企業文化旦夕瓦解，國有企業從此人心渙散，上面騙、下面偷，效益越來越差。國企改革20多年了，不但沒有出現充滿活力的新的國企運行機制，反而將本來具備凝聚力和活力的國企改垮了，改死了。面對這種現實，一些經濟學家不是反思一下，想一想改革思路有沒有錯誤，而是說，死了好，早該死，國有企業不可能搞活，這樣，就使中國失去了作為弱者與世界強者競爭最有力的武器：團結。更進一步，這些經濟學家就拜倒在跨國企業的腳下，乾脆成了跨國公司的代言人。說得不好聽，是新新漢奸。

比如，社科院有一個人叫江小娟，說政府最好把國有企業全部賣給跨國公司，跨國公司在中國開的企業就屬於民族工業。這樣的話就叫人看了有點像是賣國的樣子。你買給人家你還能超過誰呢？你都把跨國公司當成民族工業了，那還要中國政府幹什麼？跨國公司的股權掌握在誰手裡？利潤交給誰？當

然，這些人還會自己辯護，就象當年的汪精衛為自己辯護一樣。有人說，讓跨國公司投資是要學習跨國公司的技術。但是，你們記住“教會徒弟就餓死師父”，所以這是不可能的。20多年來到中國的跨國公司多了，中國學到什麼技術了嗎？跨國公司憑什麼賺取壟斷利潤，憑技術。如果跨國公司能夠讓你掌握技術，這不就是他把自己的命交給了你嗎？所以，從常識角度看，這根本是一廂情願。就象當年汪精衛賣國的時候，非得說是曲線救國一樣。其實，經濟學界有相當一批人都是這樣，只不過是有的人公開，有的人隱蔽而已。這也和當年一樣，汪精衛只不過是帶頭賣國而已，很多人出於自身利益最大化，早就想賣，早就在賣。遺憾的是，就是此類的賣國經濟學家，類似的出賣中國的經濟研究中心，卻受到社會輿論的一片叫好，受到某些領導人的賞識。我真不知道“今夕是何夕”了！

其實，這些人過去我們都有來往。我一直在想，為什麼他們會成為形成經濟學界的學術賣國潮流呢？這恐怕是得到了美國支持。當然，我不能說這些人不好，我與他們都有交往，並沒有私仇，只是立場不同。我在外國也有很多朋友。如果你跟外國朋友在一起時間長了，你當然也會說出他們好的方面。1999年美國炸塞爾維亞電視臺，我就到美國駐華機構那裡說，你憑什麼炸人家，你沒有權力干涉人家的議論自由。他們無非是造謠，造謠也是新聞自由啊！你這麼大的國家還怕別人造謠不成！經過一番激烈的辯論後，他們派了一個二秘把我領到它們樓下的圖書室，告訴我說你隨便拿幾本書。他們也知道我是社科院，喜歡書。我隨便拿了兩本。臨走時他對我說，你們社科院都有許多由我們資助的項目。當時我沒明白什麼意思，我是跟你們來辯論的，又不是

學術交流。後來我明白了，這是給我暗示，就是問我要不要美國的基金專案，他們把我想像成搞學術訛詐的了。

喚醒廣大民眾，讓中國浴火重生

我出來以後想，以後要是碰到這樣的事，你得先跟他們講條件，先賺他們一筆，再接著罵他們。這叫“抓下糖衣，扔掉炮彈”。我看，這些人和我不同，可能是“連糖衣帶炮彈”一起都收下了。美國人就是這樣，越罵他，他就越看得起你。你對他低頭哈腰，他就越瞧不起你。美國人的錢也好賺，美國人講實用主義，“世界上無永遠的朋友，只有永遠的利益”，他們都會搞這一套。日本人也一樣。頭些日子三味書屋的人給我打電話，要我參加一個日中關係的討論會，我沒去。為什麼這時日本同意賠償毒氣損害了？不就是因為“新幹線”他們沒搶到！其實現在民間反日情緒很嚴重，我對他們日本跨國公司更是沒有一句好聽的話。尤其這種外交場合，我去把大罵一頓也不好，我就謝絕了。我其實真正想罵的日本的跨國公司，它們讓中國成為它們的經濟附庸，使中國東北的重工業基地工人大批大崗失業。

當然，中國學術界不光有賣國的，也有愛國的，我這樣的也還有一些。中國人不光有喪失民族自信的，也有具備民族自信的。我相信只要中國人一起努力，中國的民營企業一起努力，中國的民族工業還有發展的前途。我現在不能影響中國的領導層，所以我只有到你們這兒搞講座，來喚起廣大人民群眾、喚起你們這些中國當代的大學生，我希望你們成為中國21世紀的領導者，有抱負，有遠見，有堅強意志，能夠與人民同甘共苦，這樣，中國即使遇到新的危機和挫折，還能夠浴火重生。◎

轉載自<http://www.gongnong.org/bbs/>

前車之覆 後車之鑒

演講 ■ 大衛·科茲

一位美國學者對蘇聯解體原因的分析

整理 ■ 任大海

大衛·科茲 (David M. Kotz) 是美國麻塞諸塞州大學安姆赫斯特分校經濟學教授，1997與 Fred Weir 合著《來自上層的革命》(Revolution From Above) 深入探討蘇聯崩潰的原因，該書中譯本已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於2002年出版。2000年5月24日他應中國人民大學邀請，就蘇聯解體的原因作了一次專題講座，內容摘要頗有參考價值，爰予轉載。 ■ □ 編者

1991年下半年，我訪問蘇聯，直接觀察到蘇聯解體過程中的若干情況。近幾年，我根據當時的見聞和大量的歷史資料，對蘇聯解體這一重大歷史事件做了一次系統的分析。我寫的《自上而下的革命》一書概括了這個研究成果。這本書以翔實的資料說明了蘇聯解體後，俄羅斯等國在試圖建立資本主義制度的過程中給國家和民族帶來的災難。

關於蘇聯解體的原因，西方的主流觀點包括兩個方面：一、計劃經濟是走不通的。早在80年代，蘇聯的計劃經濟就開始崩潰了，所以，蘇聯別無選擇，只有實行市場化和私有化。二、這是蘇聯人民的選擇。在社會主義國家，一旦給人民真正的民主和自由，人民就會提出廢除社會主義而建立資本主義制度。

蘇聯是進行社會主義試驗時間最長的國家，曾取得過舉世矚目的成就。用上述觀點來說明解體的原因，在我看來是缺乏說服力的，因為這不符合實際。

計畫經濟並非造成蘇聯瓦解真正原因

讓我們回顧一下歷史。

蘇聯的計劃經濟體制建立於1928年，從1928年至1975年大約50年時間，蘇聯經濟發展的速度是非常快的。不管我們用蘇聯官方的統計數位，還是西方資料，都可以證明這一時期蘇聯經濟發展的速度超過除日本以外的所有資本主義國家。而蘇聯經濟發展的前提是“實現最大的社會公正”，在這一點上，資本主義國家更做不到。由於實行了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了計劃經濟體制，早在1940年前後，蘇聯就從一個落後的農業國建成為一個工業化國家。西方有個統計，30年代蘇聯工業機床進口量的比例曾達到85%-90%，二戰開始後，全部由蘇聯自己生產，這反映了蘇聯工業和技術的進步。從1950年到1975年，蘇聯國民生產總值年增長率為4.8%，而美國同期的增長率為3.3%。西方的統計還表明，在原東歐社會主義國家，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經濟發展速度也大

大快於西方國家。當然，這不等於說，蘇聯建立的計劃經濟體制不存在缺點和問題。

從1975年至1989年，蘇聯經濟發展速度開始放慢，這是相對於前幾十年而言，並沒有崩潰。第一次出現絕對下降是1990年夏開始的，其原因並不是由於蘇聯經濟體制的內在矛盾。1990年3月，葉利欽當選為當時蘇聯範圍內最大的俄羅斯共和國議會的議員，同年6月，他通過一次驚人的選舉，當選為俄羅斯的主要行政長官。這時，葉利欽和他的助手們開始採取一系列政治手段，破壞國家的計劃經濟，導致國家經濟出現明顯下降，降幅約為2%左右。1991年，葉利欽領導的俄羅斯又在更大範圍內破壞中央計畫，他把俄羅斯稅收的絕大部分截留下來，不上交中央財政。當年，蘇聯經濟下降13%。可見，90年代初蘇聯經濟中出現的問題，根本不在於體制內部，而是人為破壞的結果。

對西方主流觀點的第二點怎麼看？據我瞭解，1990年前後，為研究蘇聯改革的走向，美國等西方國家的許多民意測驗機構在蘇聯進行了多次民意測驗，結果表明：支持實行資本主義的人在5%-20%之間，高達80%的人民都希望堅持社會主義。1991年5月，美國一個民意測驗機構在蘇聯進行了一次一千人規模的民意測驗，其中一項內容是“你是否贊成在蘇聯實行美國式的自由市場經濟”？只有17%的人表示同意，83%的人表示不贊成。由此可見，蘇聯公眾的大多數並不想取消社會主義而建立資本主義。

蘇共精英聯盟走向誤區

下面是我從歷史事實得出的研究結論。

蘇聯解體的真正原因來自蘇共內部，我這裡指的是大約十萬人左右的佔據著黨政機關重要領導崗位的“精英集團”。正是這個“精英

集團”想實行資本主義，以便他們享有更大的權力，擁有更多的財富。所以我把書名定為《自上而下的革命》。我並不認為這個“精英集團”的每個人都贊成資本主義，如雷日科夫就與大多數黨政領導幹部不同。我在1992年與他進行過一次交談，發現他是一個堅定的社會主義者，為蘇聯的社會主義改革最終走向資本主義道路而感到無比痛苦。但在蘇聯“精英集團”內部，這樣的人太少了。他們中的多數人要走資本主義道路，並且與城市中那些持相同觀點的知識份子組成了一個強大的聯盟。

下面，我提供一項來自美國的調查。1991年6月，美國一個社會問題調查機構在莫斯科做了一次關於意識形態問題的調查，調查物件是掌握著高層權力的黨政要員。調查採取特定小組討論的方式，一般要同調查物件進行4-5小時的談話，通過談話以確定他們的思想觀點。分析結果是：大約9.6%的人具有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他們明確支援改革前的社會主義模式12.3%的人具有民主社會主義觀點，擁護改革，並希望社會主義國家實現民主化；76.7%的人認為應當實行資本主義。作為一個在世界上存在最長、影響最大的社會主義蘇聯，黨的幹部隊伍內竟有那麼多的人主張實行資本主義道路，實在令人震驚。

讓我簡單地分析一下這種現象。從1975年到1985年，蘇聯經歷了十年的緩慢發展時期，此時蘇共黨內醞釀著一種力量，就是要求改革。戈巴契夫作為改革派的代表而當選為中央總書記。戈氏在改革初期試圖通過改革，克服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以來存在的若干問題，使蘇聯走上經濟、政治民主化之路。具體說，就是政治上實行分權，經濟上引入市場機制，意識形態領域減少控制。這樣做的結果導致蘇共的權力削弱了，威信降低了，由此引發了黨內三種力量間的鬥爭：一是堅持要對黨的領導和社

會主義制度進行改革，二是要回到比較傳統的社會主義道路上去，三是有人公開主張用資本主義代替社會主義。葉利欽是第三種力量的代表，他當過政治局委員、莫斯科市委第一書記，其言論和政治影響是巨大的。

90年代初，葉利欽當選為俄羅斯行政長官後，事實上形成了蘇聯境內兩個政權並列的局面，一個是蘇共控制的中央政權，另一個是葉利欽掌握的俄羅斯政權。由於俄羅斯的人口和領土面積在蘇聯占絕對優勢，葉利欽逐步占了上風。根據蘇聯憲法，作為加盟共和國的俄羅斯是沒有自己的軍隊的，葉利欽不是靠軍隊的支持，他的基礎是蘇共黨內那些主張搞資本主義的“精英”們。據我研究，70年代蘇共領導集團還是由理想主義的革命者組成的，到80年代就完全不同了，佔據蘇聯黨政機關要職的“精英”們開始放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代之以典型的物質主義、實用主義。儘管這些“精英”們還在不斷重複官方的論點，但相信者是極少數。他們開始考慮實行什麼改革方案對自己最有利。許多人認為民主社會主義會減少自身的權力，改革前的社會主義雖然賦予他們某些特權，但又限制了他們把權力傳給子女和聚斂更多的財富。顯然，實行資本主義最符合“精英集團”的利益，這樣，他們不僅是生產資料的管理者，而且可以成為生產資料的所有者，既可以實現個人財富更快的增長，又能合法地讓子女繼承權力和財富。所以我認為，葉利欽之所以能夠採取較為和平的方式迫使蘇聯解體，就是由於共產黨內那些主張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精英”們的支持。那些“精英”支持葉利欽，使俄羅斯順利地向資本主義過渡。

1991年夏天，我在莫斯科同一個叫尼庫拉亞夫的蘇共高級幹部交談，他在世界上的許多熱點地區工作過，估計是個克格勃成員。我問他：“你是不是一個共產主義者？”當時蘇聯

還存在。他說：“我是一個共產黨員，但不是一個共產主義者。”我聽了感到不可理解。現在我清楚了，他的回答明確無誤地揭示了蘇聯解體的思想基礎問題。這裡順便說一下，那些想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前蘇共“精英”們並沒有想錯，如今俄羅斯最富有的人正是當年黨內的“精英”。比如切爾諾梅爾金，80年代他當過蘇聯天然氣總公司的總經理，1992年後天然氣公司私有化了，切爾諾梅爾金搖身一變成了天然氣股份公司最有實力的控股人，他控制著全世界40%以上的天然氣資源，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幾個人之一。前蘇聯共青團中央書記科爾科夫斯基，利用自己的職位創辦了一家大銀行，把原屬於人民的財富變成了他個人的財產。

關於蘇聯解體事件，還有許多誘發因素。如1989年至1991年的煤礦工人大罷工，葉利欽和他的盟友們巧妙而充分地利用了這個事件。再就是黨和政府的傳媒控制權落入了企圖實行資本主義的知識份子手中，以及民族矛盾和圍繞議會選舉展開的各種鬥爭。但從根本上說，是蘇共的“精英集團”搞垮了蘇聯。

由蘇聯教訓省思中國道路

下面我想說明的是，為什麼一個由黨的“精英集團”和城市知識份子組成的聯盟，竟能不顧廣大蘇聯人民的反對而把國家推向資本主義道路呢？我認為，在蘇聯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條件下，廣大人民確實在生活上得到了很多好處，但在政治上比較被動的，缺乏政治權利。當“精英聯盟”要搞資本主義時，廣大人民群眾不能採取有效的抵制措施來捍衛社會主義制度。當然，在葉利欽掌權初期，也還是顧忌到人民對制度的選擇的，他在各種公開講話中儘量掩蓋其真實思想，不暴露他準備建立資本主義的企圖。葉利欽說，他要通過改革，引入市場經濟，逐步消滅政治精英的特權。這

與那些公開宣稱要在蘇聯進行一場資本主義革命的人比，無疑是高明的。

社會主義的蘇聯解體了，這並不說明社會主義已經失敗，也不證明資本主義比社會主義更優越。相反，要把一個農業社會轉變為一個工業化社會，最優越的制度仍然是社會主義制度，這已為1917年蘇聯十月革命後的歷史所證實。人民選擇社會主義，不僅在於更有利於社會發展，而且在於這個制度有利於實現最大範圍和最高程度的社會公正。蘇聯解體的教訓在於，由少數精英管理下的社會主義國家，一旦老一代革命家過世，很難保證繼承者們不想通過實行資本主義而為自己獲得更多的好處。我相信，社會主義在經歷了一個長過程的發展後，會逐步解決上述問題，真正實現大多數工農群眾不僅有受教育的權利，有勞動的權利，還有直接參與和管理國家事務的權利。這樣的社會主義肯定比資本主義優越，而且必將作為一種持久的社會制度而存在。

關於美國在蘇聯解體中的作用，有人認為，由於雷根總統時期美國大幅度增加軍費，迫使蘇聯也搞軍備競賽，結果蘇聯把自身的經濟拖垮了。如果這是雷根政府為了炫耀削弱共產主義的政績，那就無可非議，如果對歷史負責，那麼我就要告訴大家，據美國的資料顯示，80年代蘇聯軍費開支的絕對數雖然增長較大，但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與50年代是完全相同的。應該說，對蘇聯的解體，美國和西方確實起了很大的作用，但這種作用主要不是政治和經濟方面的，而是以自由主義為代表的意

識形態，非常有效地滲透到了蘇聯知識份子和黨的幹部的思想中。1991年，美國經濟學家研究了蘇聯經濟學家的思想傾向，並將其與英國經濟學家比較，發現他們更擁護市場化和私有化。其實，蘇聯經濟學家接受的不過是最簡單、最天真的19世紀的自由主義觀點。

同蘇聯的改革相比，中國的改革取得了很大成就，大多數人口在20年間生活品質有了明顯改善。中國經濟改革的措施是把國家的有效控制和市場結合起來，到目前為止，不能不承認這是一種成功的模式。但是也要看到，在中國社會群體中，不平等的現象在大幅度增長，失業人數在增加，個人在社會保障方面所獲得的福利在逐步減少。如果說在前進中有什麼危險的話，我感到，危險主要來自於新自由主義思潮的擴展，這一思潮正在為越來越多的人所接受。按照新自由主義的觀點，中國的繼續發展必須打破政府對資本和商品流通的有效控制，把企業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我認為這是錯誤的，要知道，美國的自由主義模式不會給中國帶來什麼好處。據我研究，凡是過去實行計劃經濟和公有制的國家，一旦採納新自由主義模式，實行完全的市場化和私有化，最多只能成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附庸。現在俄羅斯已經走上了這條路。我想中國的領導要比俄羅斯人高明，不會成為新自由主義辭彙的俘虜，不會重蹈俄羅斯的覆轍。◎

轉載自<http://www.maoflag.net>

感受你熾熱的心

陳映真 5000元 / 鍾先生 3000元 / 梁先生 16000元 / 劉梅君 5000元

本刊創刊後承蒙各界捐款贊助，謹申深摯的謝忱。

去年的12月25日為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做出不少貢獻的美籍農業專家陽早(Sid Engst)過世了，遺骨長眠於他所熱愛的中國大地上。陽早與寫過《翻身》、《深翻》等名著的中國農業問題學者韓丁(William Hinton)是美國康乃爾大學的同學。1945年韓丁讀了美國名記者斯諾(Edgar Snow)聞名世界的《西行漫記》(Red Star over China)，便奔赴延安，親見親聞了中共蓬勃的革命銳氣，大受震撼，回美國後就鼓勵陽早到中國體驗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從此陽早便和中國結下不解之緣。1949年他和韓丁的妹妹寒春(Joan Hinton)在延安的窯洞結婚。夫妻二人在中國成家、育子、工作，為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竭盡心力，渡過了大半生，充分體現了馬克思主義者的國際主義精神。本刊特轉載大陸報刊、網站的兩篇文章，以見他們崇高可貴的獻身精神。■□編者

為全人類的解放而奮鬥！

2003年12月25日，86歲的美籍專家、原機械工業部顧問陽早因病去世。黨和國家領導人胡錦濤、江澤民、曾慶紅、賀國強、華建敏以不同形式對陽早去世表示沉痛哀悼。在陽早的訃告上，有一句評語“為全人類的解放而奮鬥”，此為陽早夫人寒春執意添加。寒春解釋此話：“我們在中國呆了一輩子，不是為養牛而來中國的，是為信仰而來。”社會主義、全人類解放，陽早、寒春追求一生。

把他埋在能看見牛的地方

2003年12月25日，美國人陽早終結了追求社會主義的腳步。早在1992年，陽早去美國做心臟手術前即立下遺囑：一、不搞任何形式的悼念活動；二、捐獻遺體；三、用最簡單最省事的方式處理骨灰；四、為全人類的解放奮鬥一生（自我評價）。

陽早去世後，寒春將他體內的心臟起搏器摘下，說：“可以留給買不起起搏器的人。”她還堅持“不用給他穿衣服”，理由是“人都死了，穿衣服太浪費”。如此，一塊白布裹著陽早遺體去了另一世界。護理陽早兩年的特護俯在陽早身上哭泣，寒春勸說：“人總是要死的……”之後，寒春就陽早骨灰安置事宜與中國人發生“爭執”。中國人要把享

美國人陽早、寒春：
一輩子做中國牛郎

■李彥春

受副部級待遇的陽早的骨灰安置與他職位相符之地，寒春卻提議樹葬，“埋在牛場能看見牛的地方”。在寒春堅持下，骨灰暫存某地，春天時樹葬，但對於寄存費40元，寒春心痛又生氣：“太浪費了，沒必要花這個錢。”陽早去世第二天，部領導看望寒春。寒春隻字不提陽早，兩個話題反覆追問：“牛場丟了9頭牛，這個損失比農民偷吃了天價葡萄的損失還要大，牛的金屬鏈斷了……”再就是牛場搬遷事宜。2001年春節前，朱鎔基宴請外國專家。席間，寒春將一份中英文對照的字紙遞交總理：“……大學城要佔奶牛場，我的牛怎麼辦？中國目前的短視行為在使農田以驚人的速度流失，農田對環境有好處……”2004年1月16日，寒春為懸而未決的牛場搬遷繼續上書。她在電腦上修改給溫家寶的信：“兩年前……”字字句句流露不願搬遷之意，其專注之情消除了記者“人還在喪事中”之顧慮。從她臉上，絲毫不見喪夫之痛。記者措辭謹慎地問起陽早，寒春停下手中活，笑說：“人活的時間長短不重要，重要的是看他活著的時候都幹了什麼事。”寒春說陽早一生幹的事——養牛，追求的是始終不渝的理想——解放全人類。這個理想可從寒春家居陳設的細節中解讀。

她家牆上懸掛陳永貴照片和毛澤東接見陳永貴的照片，屋頂上有一把印有“農業學大寨”的茶壺。1973年，陽早在大寨與陳永貴交談至深。寒春手指陳永貴：“他是毛的農民，也是我們心中有分量的人，中國的事情很有戲劇性，陳也有戲劇性。”陽早、寒春多次清明去大寨，為他們心中有分量的人掃墓。茶几上放著新版《毛澤東傳》，茶几的玻璃板下是遵義會議人物畫和《國家地理》拍攝的《阿富汗少女》。書架上有《中流》、《南街村報》、《延安畫冊》、《菲律賓的社會和革命》及美國養牛雜誌等書刊。陽早生前願望之一“到南街村

看一看”，可惜此願未遂。

地上鋪著地板革，有幾處破裂卷邊。屋中間，一張磚頭搭建的寫字臺引人注目。寒春解釋：“所有到過這間屋子的中國人都盯著它看。買的能用，搭的也能用，為什麼不節省？再說我們個子高，用起來很方便。”與之相對比的是，所有到過這間屋子的西方人則無視寫字臺，而是盯看牆上管道介面處醜陋的裸露，疑惑：“能做好的事為什麼不做好？”

對牆上人物，寒春欣賞陳永貴的“自力更生”，崇敬毛澤東“解放全人類”。陽早生前以樁樁件件自力更生之目實踐著解放全人類之綱。他無數次解釋綱之源：“在延安洗的腦子，《毛選》武裝的腦子。”他熟悉《實踐論》、《矛盾論》、《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陽早自譽白求恩式的國際主義戰士，“一個外國人，毫無利己的動機，把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當做他自己的事業。”

要讓貧奶的中國人都喝上新鮮牛奶

1946年8月，康奈爾大學農牧系27歲的畢業生歐文·恩格斯特受《西行漫記》影響，輾轉半年到延安。他要親眼見識創造了“小米加步槍”和“長征”神話的毛澤東。1947年，毛澤東會見斯特朗、馬海德、恩格斯特等，恩格斯特感覺“毛很有魅力”。他喻很有魅力的毛澤東：“《聖經》裡的救世主。”寒春借牛喻毛：“牛得了病，一般人看的是表面，毛是通過現象看本質。”

恩格斯特到中國後不久，進步的新聞記者羊棗死於國民黨獄中，共產黨把羊棗同音字“陽早”給了恩格斯特，望他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忠誠朋友和同志。自1946年起，陽早被喚同志50多年。近年，他和寒春被人改稱“陽先生”、“寒太太”，他們不習慣，說“瞎叫”。1947年，又一個神話使陽早決定留在紅

色中國。毛澤東領導的2萬兵力打敗了胡宗南20萬大軍。陽早總結：“毛以弱勝強，功在民心，得民心的毛定會得天下。”陽早要親眼看到毛神話的繼續書寫——“創造一個與資本主義社會截然不同的社會主義社會。”他心嚮往之的社會。

1948年，陽早未婚妻寒春亦到延安。她曾從事核子物理研究並參與投放廣島、長崎原子彈的研製，當黑色蘑菇雲升空時，同事慨然：“這是日本人的骨頭和肉！”此話使寒春放棄了做純科學家的夢想。1949年，他們在延安窯洞裡成婚。當時，陽早的身份是聯合國難民救濟總署奶牛專家，他在瓦窯堡農具場做的風車、提水機等率先實現了農業機械化。夫婦倆非常適應並讚賞延安的民主氣氛：“白天幹活，晚上用三大作風……理論聯繫實際、密切聯繫群眾、批評與自我批評，抓革命促生產。”當年的政治土壤成為他們日後懷念和嚮往之事。2004年，83歲的寒春對比今昔，感慨道：“那時啊，真是好，大家想的都是國家大事。每個人的心是透明的……”1948年，陽早、寒春帶著黨交給的任務，帶著83頭荷蘭奶牛落戶陝北定遠縣三邊牧場，幫助當地改良牛羊。該地是陝甘寧交界處，蒙漢混居。一次，一個漢族人把蒙族人的狗打傷了，共產黨幹部開了一星期的會批評漢人。陽早、寒春深信：“這樣的黨將會把社會主義藍圖變為現實。”

1952年春，陽早、寒春培育的牛間接參與了抗美援朝。抗美援朝，他們心中別有一番滋味。寒春在一篇文章中寫道：“我們是解放全人類的世界公民。”40多年後，信仰與行動仍是一致的。1999年5月，陽早、寒春致信聯合國抗議北約炸我使館暴行：“這算什麼本事？打倒美帝國主義。”911後不久，他們回國。照片記錄了他們遊行示威的身影。中國人稱：“陽早的鼻子越來越低了。”1955年，陽早、

寒春帶1000多頭牛落戶西安草灘農場。陽早對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回應：“讓貧奶的中國人都喝上新鮮牛奶、不壞一斤奶！”這年，新中國第一代兒童喝上了他們生產的牛奶。此間，有關部門問寒春是否願繼續研製原子彈，寒春搖頭：“現在中國人缺的不是原子彈，是牛奶。”三年自然災害，陽早一家有細糧，但他以“不搞特殊化”拒絕了，願和周圍人一樣以紅薯乾、蘿蔔充饑。他堅信：“能使窮人翻身的毛也能讓人民過上好日子。眼下的苦難是社會主義建設中不可避免的。”周恩來5次接見他們，次次道“辛苦”，陽早回應周恩來：“給社會主義幹活，心甘情願。做心甘情願的事不談辛苦。”陽早還幽默道：“不喝奶哪有勁幹革命。”1971年，周恩來給陽早、寒春解釋了7個小時“文革”。自稱“中國觀察家”的陽早對“文革”的發生、發展和終結有著他獨到的思考。

10年草灘農場，留給陽早、寒春一段愉快的記憶，“條件很艱苦，心情很愉快，大家一個心眼幹社會主義，奔共產主義。”此間，他們研發的奶牛青飼料鋤草機，半個世紀後仍是該農場主導產品。1966年，陽早、寒春被迫離開農村，分別在中國電影發行公司、中國對外友協圖片社做翻譯。陽早在專家樓的陽臺上俯瞰土地，心情鬱悶：“我們現在過的是上層建築的日子，養牛的人怎能住樓房？！”他們多次打報告重返農場。1972年，他們的要求終於遂願。紅星公社使他們親近了土地親近了牛。陽早設計安裝的管道式擠奶設備、寒春設計的直冷式奶罐在中國率先實現了奶牛飼養機械化。1982年至2001年，20年光陰，陽早在位於沙河小王莊的農機院農機試驗站從事牛群飼養和改良，直到他病重住院。20年經營，小王莊以優質、純淨、高產、低耗的奶牛聞名全國。2003年，每頭牛的牛奶產量達到9088公

斤，位居全國之首。曾享有盛譽的“卡夫”優酪乳即源自小王莊奶牛。現其奶牛供應“三元”乳製品廠。牛場負責人、曾做過陽早、寒春秘書的陳繼承實話實說：“沒有這對老革命，牛場不會有今天。”

陽早初到小王莊，即明確“改良牛群必須用最優質精液或胚胎移植”。陽早遂用自己的錢買回美國、荷蘭優質種牛精液和胚胎。在美國，一個胚胎1400美元，一頭公牛精液100美元。他們用自己的錢買了多少？陽早聳聳肩：“天知道。”一次，他想用4年積蓄2萬美元買擠奶自動計量裝置，錢不夠，遂用一塊工藝毯跟兒子換美元。“用中國給我的錢給中國買東西，應該的。”陽早還根據國外資料改造養牛機械。為防“下雨積水，牛容易得病”，他設計了被業內稱道的“牛性化”坡道。20年飼養，即使小王莊淘汰的牛亦被各地爭相購買。20年改良，陽早研發的《牛奶管道的自動洗滌與消毒》、《奶牛場成套設備研製、牛場設計和中間試驗》成為業內解放生產力的示範設備。尖端的養牛技術，先進的機械化管理，功在陽早。寒春則將工夫下在管理的細節中。她記錄了1963年至今各種擠奶器工藝，其對使用壽命和奶的細菌含量的影響。她設計的牛情表格讓畜牧研究所專家汗顏：“我是搞專業的，都沒搞出這樣高水準的東西。”寒春當年同學楊振寧承認她“動手能力強”。在人的管理上，陽早、寒春思想一致：“愛牛的人，做一切事都會以牛為先。這樣的人不會在崗位上出紕漏。出紕漏的都是不愛牛的人。牛的問題就是人的問題。”寒春肯定：“細菌含量高的牛奶源自人的不敬業。”陽早生前，既是中國觀察家亦是牛的觀察家。一天中的大部分時間，他置身牛群瞭解問題、發現問題、解決問題。320頭牛，頭頭在心。

20年，寒春每天晨5時巡視牛群。凡落灰

之地，即寫上CLEAN（清潔）或把眼中諸事寫成字條放在有關人員家門口。陽早、寒春給牛場立下規矩：一分鐘解決的小事不能演變成大事；今天能做到的事不能拖到明天。一天，寒春發現新生牛耳朵上無打號印記，她對值班人發火：“昨晚能做到的事為什麼要等到今天？你有能說服我的理由嗎？”

“用智慧和心養牛。”陽早、寒春留給牛場的無形財富。這份財富使小王莊在“白色革命”中立於不敗之地。而周邊兩個牛場皆因低產和管理不善而屠牛而倒閉。有形的財富是陽早解放全人類理想的具體實踐——從解放身邊的人做起。在他的奔走呼籲下，小王莊拿出90萬元為30名職工中的25人上了三險——醫療保險、養老保險、失業保險，其餘5人尚在辦理中。陽早從身邊人中感受“沒有三險保障的人，是沒有解放的人”。

陽早從原草灘農場同事汪禮平來信中得知，他患心臟病，但因農場效益不好，醫藥費報銷困難。陽早遂從美國買藥給汪禮平。同樣，延安時期共事的老友也致信陽早：“我的醫藥費沒處報銷，能不能給我找個報銷醫藥費的單位養老？”陽早眼淚滴落信上，哭“他們還沒解放”。陽早另一次落淚是去西安看老同事。在一處低矮的平房內沒見到老友，鄰居指點“在城門樓那兒看人下棋呢”。果然，陽早見到了身體尚健但無事可做的人。陽早不滿60歲退休一刀切：“人還能做事呢，為什麼剝奪他做事的權利。”如果沒事做還沒三險，陽早視為“合法權益的缺失”。為保障小王莊職工的合法權益，陽早多方遊說時強調：“幹活最多的人拿的最少，還沒保險，這不公平不公正。”他提議給工人漲工資，質疑：“幹部能漲，工人為什麼不漲？”陽早意識：有權益保障的吸引才能留住人。牛場曾有數名外來專業人才，但都因種種原因飛走，陽早稱他們是

“飛鴿牌”的，當地人才是“永久牌”的。當地人如失去保障，也會改成“飛鴿牌”。事實證明，權益保障產生了凝聚力。

2001年12月下旬，陽早住院前一周，陳繼承親耳聞聽了夫婦二人的對話。陽早：“這次住進去，肯定出不來了。我要是死了，就把我埋在能看見牛的地方。”寒春：“你有什麼不放心的？”陽早：“你要能把這群牛管好，我就放心了。”現陽早已逝，寒春生命亦來日無多。如果寒春……無形的財富能否延續？陳繼承說：“別人不敢說。他們對我是有影響的，這影響還不是暫時的。”

陽早逝世後，汪禮平等三人進京奔喪。食宿小王莊數日的他們，自覺繳納費用。陳繼承從他們身上看到半個世紀前的影響。汪禮平後在寫給農機院的信中提及陽早：“陽技師在農場多年，他忘我的工作作風，樸素的生活習慣，無私奉獻的品質，永遠值得我們懷念和學習。”

年輕人沒下過鄉怎能懂事？

陽早、寒春的二兒一女都降生在渭河之濱。1952年，“亞洲及太平洋和平會議”召開，宋慶齡為陽早長子取名和平；兩年後次子出生，取名建平，意建設中國；女兒名及平。三人在草灘農場度過了青少年時光。渭河水饋贈三人一口地道秦腔。在中國，他們的命運與共和國同一血脈。1967年，陽和平初中畢業後分配在北京光華木材廠做電工，工資41.50元。寒春至今認為和平沒下鄉是一大損失，“可惜了，可惜了，”她說，“年輕人沒下過鄉怎能懂事？！”在“做共產主義接班人”教育下長到22歲的陽建平，至今記得一串英雄的名字：楊子榮、許雲峰、黃繼光、董存瑞、雷鋒……他初中畢業時請求去黑龍江、新疆，“向英雄學習，做名青年近衛軍，反修防修保衛邊疆。”1972年，陽建平插隊安徽十字鋪茶

場。一年後，寒春把17歲女兒及平也送到茶場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寒春叮囑他們“不要搞特殊化”。

1976年前後，三人相繼赴美。陽建平改名比爾。一生信仰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陽早對兒女的去國選擇說：“我們工作沒做到家啊！”現年50歲的比爾以中國《政治經濟學》教材自喻，該教材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部分。“四人幫”垮臺結束了他的社會主義部分。現在資本主義的時間達到了與社會主義同樣的長度。東西方比較後，比爾稱自己是“父母的右派朋友”。陽和平、陽及平與父母思想同一體系，被寒春戲稱：“雞蛋，皮白心黃。”他們雖去國多年，政治敏感依舊。陽和平參觀某紡織廠後提出一己之見：“這裡存在男尊女卑現象。”他挑明：“領導都是男的，幹活的都是女的。”寒春直言：“在中國，婦女不僅沒有徹底解放，還出現倒退，如包二奶現象……”。

三子女都理解並尊重父母的執著信仰。比爾保留意見：“若在這個世界上找出像他們一樣的理想主義者，比較難了。”陳繼承認同：“在我接觸的人當中，還沒有他們這樣的人。”尤其在公私、名利面前，以他們為鏡自省，陳繼承照出“我這個黨員是不合格的”。毋庸諱言，這面鏡子還照出多少黨員“為全人類解放而奮鬥”的口是心非。解放自己是真，解放別人是假。

改革開放後，陽早、寒春習慣過著中國人已不習慣的物質生活。陳繼承用“簡單至極”形容。陽早出門一般帶飯。一次去天津，他帶兩個饅頭、兩個雞蛋、兩個蘋果。午飯時，他分一半給司機，司機說去館子吃麵。一次，王震宴請他們，陽早掃了一眼宴席後罷宴，王震忙換上豆腐白菜。他固守“革命不是請客吃飯”。陽早70歲前，騎車進城或去部裡辦事，供他專用的桑塔納成了公車……延河水的洗滌

貫穿他們一生言行的點點滴滴，以至於被太多達不到其境界的中國人誤讀和嘲笑“一對傻老外”、“一對老革命”，指摘他們落後時代的言行：“思想僵化。”

原農機部副部長項南曾問及平，“為什麼二老在中國呆了一輩子？”在北京大學讀生物化學的工農兵學員及平反問：“中國的許多老革命，為什麼要從白區冒險到延安？”

社會主義對陽早的吸引是：“只要你們不趕，我們就在‘沙家濱’紮下去了。”

騎驢看帳本走著瞧

“政府怕倒臺，資本家怕破產，工人怕失業，這些都是資本主義的癌，我們怕癌才來到社會主義中國。”晚年陽早憂慮癌蝕中國，這使他在追求的路上產生痛苦。

一些奶牛場進口國外設備。陽早上火：“自己研製的完全能用，為什麼非要進口？現代化不是買來的！”他遂向全國推廣100多套國產設備，但是，買方的位數遠遠達不到他的期望。於是上書《關於農業機械化的幾點建議》。國門打開後，陽早擔憂國有資產流失。果然，擔憂之事亦如土地一樣以驚人速度正在流失，還有賣資源。陽早亦憂：“以後怎麼辦？”他在多種場合講：“搞現代化，不是搞西方化。實現現代化，首先要搞基礎建設，不要搞形象工程。要搞工業、農業，不要蓋那麼多樓堂館所廣場。要自力更生達到‘洋’，而不是購買‘洋’。”陽早失望，共產黨的三大法寶沒有他期待中的繼承。赤腳醫生的喪失使農村合作醫療癱瘓。義務教育普及率並非百分百。貧富差別、城鄉差別、貪污腐敗、環境惡劣……當陽早講上述被一些人視為不合時宜的話時，閉著眼睛講。他不喜“察言觀色”這個成語。陽早用“騎驢看帳本走著瞧”、“種瓜得瓜種豆得豆”預測種種短視帶來不良之果。

近年，有人欲在小王莊開發房地產，還要把1600畝種植牛飼料的玉米地變成高爾夫球場。陽早急了，說：“這是投機倒把，房地產種不出糧食，擠不出牛奶！土地變成房子了，後代吃什麼？”於是電話打到中央。人說小王莊如果沒有倆老外，房地產肯定吃了牛場。1999年牛場改造，寒春設計，陽早監工。陽早坐在馬紮兒上監視工程品質，嘮叨著：“別搞成豆腐渣工程啊！弄虛作假，牛饒不了你們。”玉米收穫季節，陽早隱身巡邏。青紗帳中有聲，他便厲聲呵斥：“你怎麼能從牛嘴裡搶東西吃！”陽早稱己所為：“為捍衛牛的利益與壞人壞事作鬥爭。”

陽早住協和醫院兩年間，寒春隔天一次探視。陽早研究她每次帶來的牛情報告，後因體衰不能過目，遂讓寒春讀給他聽，在病床上分析……他昏迷前，惦念事之一——牛的新居。“牛的家由別人蓋，我不放心。”為此，多次修改寒春設計的新牛場。

農機院表彰陽早、寒春是白求恩式的國際主義戰士和具有牛的精神——吃草擠奶。陽早笑答：“我們吃了中國人2萬斤糧食，做了一點有益於人民的解放事業，應該的。”83歲的寒春日日勞作的動因，除牛的牽掛，還有時代烙印：“勞動光榮，不勞動可恥。”她在每天分析牛情報告的勞動中繼續丈夫未竟事業。

西諺：偉大的事業不是每個人都能做的，但每個人可以用愛做很多小事情。陽早、寒春以養牛為載體，在共和國的土地上實踐著解放全人類之信仰，以“世界公民”之愛滋養、強壯著中國人之身體。

小王莊優酪乳取名“陽春白雪”，此名蘊含陽早、寒春名字、境界和奶的品質。◎

轉載自《北京青年報》2004 02 04

向陽早寒春同志學習

■《環球視野》編輯部

陽早、寒春同志是來自美國的兩位國際友人。他們於上個世紀四十年代不遠萬里來到中國，支援中國人民的解放戰爭。新中國成立後，他們又積極投身到我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來。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鬥爭歲月裡，他們殫精竭慮，茹苦含辛，為中國人民的革命和建設事業，做出了傑出的貢獻，多次受到黨和國家領導人親切接見與高度稱讚。

2003年12月25日陽早同志不幸在北京逝世，享年85歲。

陽早逝世後，黨和國家領導人立即給他的愛人寒春同志及其親屬發去了唁電，新聞媒體也紛紛發表文章，深切悼念陽早同志，宣傳他和寒春同志的感人事蹟。

六十五年前毛主席在延安發表了著名的《紀念白求恩》的文章。六十年多年來，白求恩精神傳遍祖國大地，極大的教育與鼓舞了中國人民。

什麼是白求恩精神？毛主席在《紀念白求恩》的文章中說了兩條：一個是國際主義的精神，一個是共產主義的精神。毛主席說的這“兩個精神”在陽早和寒春同志身上有著充分的體現。他們就是當代的白求恩。是我們學習的好榜樣。

學習他們的這“兩個精神”，對於我們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來說，是至關重要的。沒有這“兩個精神”，我們就不能在社會主義大道上繼續前進。

共產黨人必須要講國際主義。毛主席當年說“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要擁護殖民地半

殖民地人民的解放鬥爭，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無產階級要擁護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的解放鬥爭，世界革命才能勝利。”這就是說，各國人民的革命鬥爭要互相擁護、互相支援。這就是國際主義精神。

我們不能不指出的是，一個時期以來，我們有的同志對這個問題淡漠了，而那些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士們，則與國際主義精神背道而馳。他們崇拜美國的資本主義，甚至賣身投靠；他們反對社會主義，主張資本主義，甚至甘當帝國主義的走狗。余傑、劉曉波之流就是這樣的人。請看：“今夜，我們是美國人。願上帝保佑美國！”要“改變人種”，要“解散中國”，要“做三百年殖民地！”“假如上帝要我選擇一個降生之處，我會選擇哪裡呢？……我會毫不猶豫地選擇美國。”這就是他們要做美國帝國主義的走狗嘴臉！他們也講“擁護”與“支援”，而他們“擁護”與“支援”的物件是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他們也講“國際主義”，他們的“國際主義”是資本主義的“國際主義”。

毛主席在講到國際主義時說：“白求恩同志是實踐了這一條列寧主義路線的。我們中國共產黨員也要實踐這一條路線。我們要和一切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聯合起來，要和日本的、英國的、美國的、德國的、義大利的以及一切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聯合起來，才能打倒帝國主義，解放我們的民族和人民，解放世界的民族和人民。這就是我們的國際主義，這就是我們用以反對狹隘民族主義和狹隘愛國主義的國際主義。”在今天，在帝國主義、霸

權主義肆虐的今天，毛主席的這個教導更具有重要意義。

再說共產主義精神。毛主席說的“毫無利己”的精神就是共產主義精神。前幾年出了一本書，叫《審視中學語文教育》，該書就公開與毛主席提倡的這個精神唱反調，作者錢裡群認為，主張“毫無利己”就是“殺人”。還有一本書叫《毋忘“我”》，作者是劉軍甯先生，他說：“提出‘忘我’是對自己生命價值的作賤，是對他人的嘲弄……無‘我’的人是不思考、不感覺、不判斷的人。”這些人的著作是旗幟鮮明地反對共產主義精神的。他們是主張“利己主義”、“個人主義”的，並且認為是天經地義的。按著他們的邏輯，不僅共產主義精神、共產主義理想，就是共產黨本身也是不應該存在的。

什麼是意識形態領域裡的階級鬥爭？這就是，這些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你不叫他反映出來是不行的。問題的關鍵是當他們反映出來的時候，我們如何對待，是聽之任之呢？還是必須進行批判與鬥爭呢？

我們想，答案應當是後者，而不是前者。

詩人臧克家說的好：有的人活著，他已經死了；有的人死了，他還活著。

那些帝國主義的走狗們，雖然活著，其實已經死了；陽早同志走了，但他還活著。

陽早、寒春同志在中國人民心中永遠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於人民的人。”◎

轉載自<http://www.globalview.cn>

稿約

歡迎踴躍投稿

《批判與再造》旨在提供一個用左翼觀點曠觀寰宇、立足本地的公共論壇。我們歡迎引介世界思潮、評析國際與中國兩岸政治經濟形勢及社會文化現象、回顧反思世界社會主義運動歷史的文章，與反映社會現實的文學創作。同時也期望不同觀點之間開誠布公的論辯，以有助於釐清觀念、深化認識，促成左翼力量的團結進步。因此，我們衷誠盼望各方朋友來稿，充實《批判與再造》的內容，推動台灣左翼以至世界左翼聲勢的再興，抑止人類處境的進一步惡化。

我們的徵稿原則如下：

一· 文字請力求簡潔扼要，一般以5,000字

以內為宜。

二· 理論文章以10,000字為度，特殊狀況不在此限。

三· 論辯文章務必觀點明確、邏輯嚴謹，秉持實事求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原則，切忌曲解論辯對手原意，或迴避論題，言不及義。

四· 我們充分尊重所有來稿的觀點，但有時視編務需要，須在不損及作者本意下，酌情刪改。如不願刪改者，請註明。

五· 本刊因經費所限，無法提供稿酬，敬請見諒。

六· 來稿請於每月十五日前寄達。

霜降 (五)

顏世鴻的回憶錄

著■顏世鴻 / 編註■藍博洲

吳思漢奔向祖國，已冒了生死，忍了饑寒。日本特高與憲兵發覺時，他剛過了鴨綠江，但偽「滿洲國」是何等的險地。我們可以相信，那時候，他只是憑一顆愛國心。這顆心，為什麼不緊緊地抓著他呢！他加入共產黨是二二八之後，他分明是在兩選一的遊戲中一個太昂貴的犧牲者。他還不知「忍」的價值，對家族、對台灣人、對祖國有何等價值。他的死亡好似一九二七年四月的趙世炎、羅亦農一般，只是被輕易地處理掉的一個數字。其實，不必為他羅織什麼，他當年是奔向重慶，而非陝西的延安，這一件事已經足夠了。他如果當一個自私的、高高在上的才子，大概也不會有這個下場了。二二八那場混亂，著實使許多愛國青年迷惘、心碎，他卻不知，「愛國」本身有時候是太昂貴的情愫。

台南代出才子，但台南的才子，大都不會有「很好」的下落。如陳震烈，死於自殺；如許強、吳思漢、葉盛吉死於馬場町；如林丕煌，死於腦下垂部的動脈瘤；而戴振翹因鼻咽癌死於香港。

大概當年被明鄭那麼一搞，台南的地氣就一直衰敗，不再旺盛。

我只聽說，被捕以前，吳思漢當了一段時間的新聞記者（台灣新生報），中學是早我五屆吧，其他的一切一概不知。那篇「奔向祖國

三千里」，是光復後在報紙上看到的。他本名吳調和而後自改為「吳思漢」。在日據時代，他出奔日本，冒死渡鴨綠江，經過了許多曲折。我在中學在學中，就盛傳於學校，可見，台南一中早有人受他影響。因為當時交通差不多到了要冒生死的程度，而且書信及電報是要受監視的。他到重慶，抗戰尚未結束。如果他寫一首，似「去國廿年餘血淚，登舟三宿見旌旗，欣將殘骨埋諸夏，哭吐精神賦此詩……」的七律，可能身價就大大不同。雖然那時候他已經學好了「北京語」，畢竟，那時候流亡到陪都的學生的故事太多了，所以也就成為極其平凡的故事了，至於它所具有的特殊價值，還沒有那麼出色的識貨角色。淪陷於日本五十年的台胞，冒死犯難奔向祖國。今日有「台獨」之輩的存在？

別扯太遠了，先再回頭談第三天，十月二日。這一次走的是羅東的案件，盧盛泉（註四十四）及馮錦輝（註四十五）兩位。這三天的震撼，使大家開始各自在心中，匆促地開始做準備了。

然後再談郭琇琮吧，他又是另一個典型。我曾看到，郭琇琮留給某位朋友的一本腦神經解剖生理的翻譯書，扉頁背面就寫著：「如此緻密銳利的大腦，也敵不過一粒子彈。」人不高，帶著眼鏡，眼神如刀。是士林望族出身，

註四十四 ◆ 29歲，羅東商民，被控為「蘭陽地區工委會書記」。

註四十五 ◆ 23歲，國校教員，被控為該地組織「工委」兼「支部書記」。

他是經日據時代台北一中（現在的建國中學）、台北高等學校、而入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在學中因為組織抗日地下組織被捕（當時醫學部及醫專牽涉的人甚多），出來以後又回到醫學部完成學業。畢業以後，就在台大附屬醫院第一外科。

我曾經常與伊在醫學院的走廊相遇。當然我知道郭琇琮的一些傳說，由一些曾居士林的老同學指點那一位是郭琇琮。而郭琇琮是不會也未曾熟悉在偶然交會的一個陌生人，因為我是如此平凡，而且不起眼。台大預科本來就在士林，芝山巖的東麓。我入台大預科，已是第五屆，仍是用舊國民學校的老校址。學生宿舍才完成外殼，離完工還得半年。一大堆外地來的學生都在士林街上，賃屋而居。他的大名，就由這些人傳喧到我耳中的。我對郭琇琮的印象是：一位自我肯定型的突出人物。他被捕的時候是台北案的主犯，台北市委書記。

在這裡順便帶幾句。日據時代，學校對學生的思想面是比社會開放的，尤其是圖書館的書籍。據說，當時看《三民主義》與《資本論》都不會被認為思想有問題。如日本特高課的警視，大都是大學畢業，經過高等文官考試。為了職業性的需要，差不多的左翼著作都看過。不光是馬恩列史，甚至德國社會民主黨的考茨基等人的著作都看過，甚至還要研究心理學。所以，只要不參加什麼團體，不寫什麼言論，不發表什麼意見，你有什麼思想，是不會被認為犯罪的。而且只要捱得起刑求，沒有直接間接的證據，大概不會有事。不過偶而有故意打死的，如小林多喜二。當年醫學部、醫專事件、東港事件，有不少人被刑打致死。不過看書不致成罪。當日本人被遣送回國之前，他們出售的書籍當中，這類書之多，會使人驚訝。我也曾經買過日譯的謝冰瑩女士的《女兵日記》、林語堂的《北京好日》。

所以，這些青年的傾向另一邊，簡單地說

來是對光復後的貪污盛行，再加上那二二八沈重的打擊，不得不另做一個選擇。因為在光復之前，他們對祖國所期望的，實在是超出想像的程度。

那麼，許強先生是又如何走到這一條路上來的呢？對此，我一無所知。我向來不問他人事，尤其不敢問胡鑫麟先生。我對胡先生的脾氣很清楚，問了，他也不會談的，說不定會遭到一陣罵。況且，可能連胡先生也不會知道。如許先生不自己說，胡先生也不會去問人家私事，胡先生與我一樣，除了自然知道的，或由前後可以推理的，向是不去管人家私事的，何況這種事，知道愈少愈好。

許強先生是台南一中（前台南二中）、台北高等學校，而後進入台北帝大醫學部第一屆，應該是一九四〇年春天畢業的。他的老師澤田先生曾稱讚他，可能是一個諾貝爾的候選人。一九五〇年，他應是三十六、七歲，胡先生低他三屆。許強先生被捕時，是第三內科主任，還是副教授，沒有升教授，而胡先生是講師主任，剛好內定七月會升為副教授。

許強先生曾看過我的病，斷為十二指腸潰瘍，勸我在暑假開刀。年後，我出了第十一次的血，照了X光，才證實了他的診斷。不過已經加上了幽門的狹窄。

在軍法處看守所，有一天，許先生到我們的房外看病。他當然是當病人，不是當醫師。看到我，將手往脖子上一抹，微微一笑，大概他已經知道這一關是難逃了。家人累次要他寫自白書，他後來倒是寫了，不過是照他的表達形式，而不是使看的人滿足的形式。其實，當時在台灣，消化系統的疾病，他是最高權威，他如有意求生，或許做得到。他大概不堪在那麼多人走了以後，留下自己。他的支部直隸於蔡孝乾。許強先生在台大，可能是第一位公開在外兼差的，後來才知道，這都是蔡孝乾缺經濟來源，要他這麼做的，賺的錢都是老蔡拿走

了。這在前面也提過，不過為了澄清一些人心內的誤會，再提一下。

至於蔡孝乾，一名蔡前，日本人要逮他，跑到大陸，以後入蘇區，在瑞金的一段前面也提過，被捕時是中共的常委。他曾經在大稻埕逃過一次，許多人認為這是老K有意安排的捉放曹。第二次，四月中在竹山（竹崎）被捕後，就做任卓宣第二了。

九月三十日起，當作「秋決」也可以。中國人就有這麼一個習俗。其實吳石案、汪聲和案的判決都在秋分之前，而台南案之判決在一九五一年春分之後。所以，當時的軍法處、軍法局是沒有所謂「秋決」這一套的。在十月一日先後，只不過是向中共示威的一個姿態吧。

洪國式案的江博士（江德興）起訴不是二條一項，而是四條：資匪。走筆到此剛好是九月一日，明天就是我們一案被移送軍法處的卅八週年。君不見，三百多年來，多少河洛、客家的精英，如飛蛾撲火，如雞卵擊石，如春夜落地的「雨夜花」，為了更好、或更合理的「新地」，走了不當為而為之的路。區區如我的遭遇，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應感激老天爺的偏憐了。

新公園之一幕，並不是我亂猜的，後來就證實有這麼一回事。而楊廷椅確也存心放我一馬，推說有點不像，還要靠近一點。當時已是黃昏已過，夜色初登的時刻，他這麼說也不過份，而我走入新公園的態度也甚從容不迫。因為這樣，我在那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所稱的「第一層地獄」，多渡了三個多星期。那時候不是不想逃，當時我與葉盛吉有約，要告訴他，讓他來台北，商量往後的事情。卻是慢了一步，這在前面說過了。而且知道葉盛吉被捕後，我身邊不但有一點負債，剩不到兩元的錢。如果向人家借錢，萬一有事情，無端讓朋友落個「資匪」，我也萬萬不能做。領了獎學金和米只夠繳六月份的伙食費，二十五元的工

讀，還了債務也不夠一張車票的錢。我只好等匯款到，給大妹，清了最後福利社的債務，算是不缺人家的債，心中又想留到月底，賭一下運氣好壞。是否能不聲不響地結束這個學年，然後才開始流浪。我也只有一個暫定目標，就是高雄縣靠山舊稱「羅漢門」的那塊地方。並不是有熟人，讀過台灣史的人都知道，那一帶自清朝即是「化外的化外」的亂民逃匿的一個地方。其實我從未到過旗山、美濃那一帶。客家人佔優的那地方，甚少有我棲身的荒野。

所以，地下組織的缺點，就是單行道的。除非鄉下的支部，下面對上面所知有限。如我只認「老朱」一楊廷椅其人，對他的姓名、出身、生活背景、教育程度一無所知。所以蔡孝乾下的陳澤民、洪幼樵、張志忠一落網，就悉數被破壞了。舊台共被破壞時也是如此，中委中被日本特高課滲透，就一再被破壞。而且當初派蔡孝乾來台就有甚多不利的地方：

一、他有太多認識的故人，而且他進蘇區，連日本人都知道。他有舊的關係，不過這些人，如簡吉等舊台共，正是政府所盯死的人。這些老關係，直接間接都受了他的影響。如舊民眾黨的陳其昌就因為「資匪」，判了無期，財產沒收。

二、而事實上由舊的關係建立的關係不多。倒是延平大學短短的期間有很大的影響。二、二八的偶發事件，反而使他們網羅了差不多的中堅幹部。這些人都不錯的，只是少了大陸經驗。就是這些人使地下黨到一九五〇年一月，有約一千名的黨員，二、二八當時大概只有一百名左右而已。

三、忽視臨時出事的應急方法，如山地工作順利，就有一個逃亡的線路。而且要有幾處，所以工作的重心太偏於西部平原。

四、主要乃是雙方都不必有真的姓名，而且也要冒一些險。但一旦被破壞，只可能停在一個人組合的人。所以自己發展的人，不由自己

去領導。當時就感覺橫的關係太多，也是危險的。事實上，由橫的關係而出事的例子不少。

一個領導人如果超過三十五歲，是危險的。但這並不是絕對的。三十五歲以上的人與二十歲左右的人的韌性不同，而且向來沒有對臨變的指示或訓練。保密局剛好在緊要的時間破壞了首要人物。客觀地來說，就是蔡孝乾來，二、二八以後就應該換人了。二、二八以後，對舊台共的監視日嚴，檔案，日本人一定整套地留下了。如張志忠先生租李老板的家（註四十六），這就是一種冒險。人家在對面監視他們夫妻可能有一年，連我都知道那角上紅磚的樓房，常有老K的人出入。這一點，葉盛吉始終是保留的，我還沒有關係時抬我出來，我一入黨，也儘量避免再拋頭露面。甚至要我寫稿千萬要注意。

有一說，陳澤民本來也不怎麼妥協，結果妻子出面，使他軟化。只有張志忠，後來蔡孝乾與小姨結婚生子，彌月分他一份紅蛋，張志忠發怒拋掉，所以也拋掉老命。他太太季濤（註四十七）本來判十五年，後來大概也走了，留下一子（註四十八）。

前面說，人有的是會變的，這是真實的。好壞，這隨各人的主觀。

楊廷椅極可能是由延平大學的關係來的，一九四七年五月，由廖瑞發介紹；陳水木也相同，這是判決書上寫的。到了軍法處才知道他與施部生很熟，而且兩個人的感情也不錯。他是在這種地下工作會成功的人，有一點油氣。

我與楊廷椅的關係一開始就不順利。本來第一次見面是在博物館的前面，我等了十五分鐘，不見人到，就走開了，而且到花蓮去。以後葉盛吉離開了台北，我與楊廷椅見了兩次面，可能葉盛吉離開了以後，他因為要接這條線，才與我見面的。江源茂也是如此。沒有問過陳子元，不過也極可能如此，他似乎很忙，台大理、醫、法學院落單的都由他接，還有一個街道支部、師院支部也由他領導，還要和陳水木連絡，由陳水木去領導新竹、台中、嘉義、台南、高雄五個支部。在五月十日以前，楊廷椅也是很忙的，而且依我判斷，他在四月中旬時就知道蔡孝乾出事。（楊廷椅是五月十日被捕。）

從許多人口中，沒有聽過對蔡孝乾好評。不過話又說回來，當時的形勢，當然還不能那麼肯定韓戰的發生，中共的渡海作戰是必定的。這麼多人被捕，難道有僥倖的成份？第一次重整、第二次重整的結局都是和蔡孝乾差不多。不過當時韓戰已經開始了，所以在客觀的評定上稍有不同。不過有先例可循，他們也學老蔡了。而下面的死亡，比一九五〇年更慘。光是李媽兜一案，涉及的支部上百，人數近千。亂世重典，對一九五二、一九五三年來說，真是名副其實。

在報紙看到「周慎源」（註四十九）的死亡，帶著辛酸的味道。事實上他們，比起老蔡下面的，所知有限。

人生禍福難知，如果我逃了或自新了，就不必浪費那一段日子。不過那種日子的滋味也

● 註四十六 ◆ 指抗日志士李振芳在台北衡陽路所開的生春藥行。

註四十七 ◆ 江蘇南通人，1950年11月18日犧牲。

註四十八 ◆ 楊揚，後來因不堪這樣那樣的壓力而自殺。

註四十九 ◆ 嘉義人，師院學生領袖，四·六事件後轉入地下，後來在桃園地區被當場擊斃。

是很難過的。許多人的性格都變了，劉某就是一個例子。如不自新，不是如周慎源那樣死於圍剿，就是如石玉峰、吳東烈（註五十）、施至成（註五十一）那樣，死路一條。話又再說回頭，郵電兩位女士，錢靜芝（註五十二）、計梅真（註五十三），走的是十月十一日，據說對她們的從容就義，連憲兵都膽怯了。十月十四日是基隆中學校長鍾浩東和李蒼降、唐志堂（註五十四）三位。李蒼降微仰著頭，算是向樓上的太太道別。無限的叮嚀，無限的別情，流露在那靜默的時間與空間，流露在他的眼神。

當年我的視力二·〇。別人看不到的，我都可以看得清、認得明。不過，就是看得出來，又如何呢？沒有絲毫矯作，不是傷神。那是那麼自然流露的叮嚀與告別。鍾浩東先生也是如此。基隆案另有四名：張奕明、鍾國圓、羅卓才、談開誠於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日已被槍決。

鐵路是三個支部，去了五位。十月二十一日，張添丁、李生財、許欽宗、林德旺、朱永祥。他們雖臉堆笑容，我們看到的，比哭還傷心。鐵路剩下來的都一律判了十五年。這對其他案的許多人都是一種近於漲停板的預告，我還偷偷拿出那近一千字的「遺書」，重新看了一遍，而後又一字不改的收起來。

十一、錯誤的戰爭

法國的政治學家、評論家，連蒙·亞倫，

在一九五九年出版一本書：《關於戰爭》，裡面寫了一句話：

「如果美國人在舊境界線（就是三十八度線），自動地停止，那麼，他們主張自己是勝利者，沒有人會置疑，應該會受全世界的承認。」（中公新書《朝鮮戰爭》，七十八頁）

九月十五日以後，美國人曾經討論這個問題。不過，麥帥相信北韓已經失去了戰鬥力量，雖然十萬北韓軍的大部分很不可思議地脫出聯軍的包圍網，他們在十月八日仍「勸告北韓投降聯軍，來協助韓國的統一、獨立、民主政府的建立。如果不接受這勸告，聯軍就會實施為了實現這目的所需要的軍事行動的命令。」

對美國的這種態度，中共立即有了反應。十月九日，北京的廣播說：

「聯軍突破三十八度線的決議是違法的。（如果假定戰爭是李承晚鬧出來的，這句話也可以成立的）美軍攻入北韓，這軍事行動是對中國的安全的重大威脅……中國人民雖然愛好和平，不過對維護這和平，對抗侵略戰爭本身，我們是不會有所躊躇的。」一般的看法，中共渡江到北韓就是在這個時候。

美國以為那不過是中共的一種姿態，而且北韓的抵抗不強，到了十月二十日就占領北韓的首都平壤。美國似乎忘了政治的勝利應優先於戰場勝利而迫近鴨綠江。

麥帥和杜魯門於十月十五日在威克島會見，對中共參戰的可能性發表了他的看法：

註五十 ◆ 石、吳兩人與另一師院學生陳榮添，同於一九五三年三月三日被槍決。

註五十一 ◆ 台南人，台大工學院學生，一說未被逮到，生死不明。

註五十二 ◆ 江蘇人，卅歲。

註五十三 ◆ 江蘇人，卅五歲。

註五十四 ◆ 汐止人，廿六歲，軍民合作站書記。

「可能性，差不多不存在。如果他們在最初一兩個月就參戰，那影響可能具有決定性。現在，我們已經不怕他們介入戰爭了，中共在東北有三十萬軍隊，而配置在鴨綠江一帶的不過是十萬左右，頂多也不會超過十二萬五千。可以渡過鴨綠江的，頂多是五、六萬而已……而且他們沒有空軍。……」

所以，麥帥是想趁仁川登陸的成功，索性來一個統一韓國。如果不是在李承晚手下，不在五十萬聯軍壓境下，這倒是無可厚非。但當時的情況，甚是複雜。

九月三十日當美軍越過三十八度線，周恩來就提出了基本的問題：

「中國可能被迫出兵到北韓，」不過他有一個但書：「如果光是南韓軍越過三十八度線，我們是不會出兵的。」

但連英國工黨的外相在聯合國也說：

「沒有所謂南韓或北韓，存在的只是韓國而已。」這句話引起工黨內部的許多是非，但李承晚和美國是很高興這句話的。不過反對所謂聯軍跨越三十八度線，當時在西方也有不少提過。可惜當時沒有瞭解到「政治的勝利」的意義的人已經掌握整個的局勢。這在以後的越戰也可以看到，在朝的人物，甚少有政治遠見。

而當時，CIA 在十月廿一日向麥帥提出，為免中共的介入，不要破壞大豐滿、小豐滿的發電所，也不要使空軍進入東北及西伯利亞。

這是 CIA 對情報的研判，不如麥帥那麼樂觀。而麥帥卻一心一意要兌換他開的支票，讓兵士們回國過聖誕。事實上，十月廿四日，南韓第六師在清川江上流的雲山，似遭到中共的軍隊的包圍，而去救援的美國第一騎兵師也遭到同樣的命運。由捕虜的訊問知道，在威克島會見的次一天，三個師的「義勇軍」已經渡過鴨綠江。

十一月三日，第八軍團的華克中將命令第

二十四師後撤五十哩。南韓軍在鴨綠江上流後退的時候，與中共軍隊遭遇，受了甚大的損害。當時中共軍隊潛伏在長津湖附近，而美國第十軍團卻向那方向推進。華克中將、第十軍的艾蒙德，甚至聯軍司令部還沒有覺察將要到來的現實。他們只對約十萬的北韓軍隊，透過他們的戰線回到北韓，感到驚訝。當時，CIA、華盛頓的G2、東京GHR的G2，都還沒有充份的中共軍隊動靜的情報。不過，十一月五日麥帥向安理會提出：「聯軍正與中共交戰」的「特別報告」，翌日，麥帥說：「中共的行為是將會留在歷史紀錄的國際的非法行為」，他已忘了十月廿五日對他的「孩子們」可以回家過聖誕的樂觀的言辭。如果，九月三十日，他宣言不越三十八度線，這一句話是可以兌換的，甚至可以成為「政治的勝利者」，繼杜魯門作一任美國的總統。而事實是相反的，十一月六日，國境五哩內空軍的活動解禁，對新義州到鴨綠江的鐵橋的轟炸又開始。十一月廿四日，「為了結束戰爭的攻擊」，又被再度下令，他也說：「戰爭已接近最後的階段。」

假定麥帥想結束戰爭是不需冒這個險的，沒有十一月廿四日的再攻擊的命令，客觀地來說：中共也不必介入這一昂貴的戰爭。一九六〇年以後，中共與赫魯雪夫不和以後，周恩來曾經說明，中國人如何刻苦地支付朝鮮戰爭中欠蘇俄的軍事裝備費用。

如那歷史記載的，雙方各約二十萬人，十一月廿六日真正地接觸了，而美軍卻經驗了「美國歷史上最嚴重的敗亡」。甚至杜魯門說了：「不惜使用原子彈」，使英法的盟友甚是緊張。杜魯門的這種反應間接地證明了這個如鄉下佬的總統，在本質上與當年的英國紳士相同，也與那些在鴉片戰爭為非做歹的英國軍隊相同。他壓根兒，並不對在廣島與長崎丟下那鳥卵有任何的後悔。對東方人如南部美國對黑

奴一般，不視為是人類的一份子。一句話說透了他心理上的座標。

這一些戰爭的真正得利者是日本。很多日本人介入這戰爭，而後由這戰爭，日本人在經濟上、政治上恢復了。而間接得利的是另一隻亞洲的小龍，這理由不必說明。甚至麥帥有以國軍登陸大陸的構想，後來遭到布萊德雷元帥的反對而流產了，結果是麥帥的免職。不過，如果沒有盟國的堅決反對，杜魯門是不會那麼輕易地採取這個人事行動的。

影響不單是中國人以後二年八個多月的介入，以及成百萬的人的死傷。在遙遠的台灣的一個小小的角落，也受這潮汐的漲落的影響。任何人都不能直接感受到，那遙遠的地方，對這一角落會有什麼影響。

十一月廿四日，麥帥發佈再攻擊的命令時，仍然沒有忘記他對「美國孩子們」的誓約，就如他當年離開菲律賓時，留下「我會回來的」。他對第八軍的官兵說：

「End the War，目前已經接近最後的階段。如果在此一作戰，我們成功了，我們的大兵就可以趕在聖誕節以前，回到美國。」對在國境前面，東線在清津停下來的盟國的意見，他卻堅持己見。

十一月廿八日，他不得不向聯合國發出了以下的聲明：

「我們在過去四天的攻擊作戰，因為遭遇敵人在中途的反擊。估計約有二十萬，良好組織的中共的軍、軍團、師團等的組織化的軍隊，對北韓的聯合國軍隊已經配置好的事情，已經明白了。我完全面臨一個新的戰爭。」

本來這一戰爭是不必要，而且可以迴避的。不過，麥帥是屬於魯登道夫型的將軍。連杜魯門也在回憶錄中提到：

「今天，沒有人責備麥帥十一月攻擊的失敗。當然，我也未曾責備。不過，我對他辯解自己失敗的方法是不敢雷同的，尤其在已經沒

有為自己辯解的餘地的時候。他認為他唯一的困難是來自華盛頓對他軍事行動的限制，完全是來自華盛頓的命令。他公開表示了這種見解，這是完全與事實相反的。他不過是拿這些現實上不可能的禁止事項，來當為自己失敗的搪塞的藉口而已。」

如果麥帥是聰明的，而且有普通級的政治眼光，這一切都是可以避免的。而到白宮的道路，平凡的美國人會替他安排好的。做了近六年的日本土皇帝，使他忘了一個美國子民應有的立場。這雖然是很寶貴的教訓，不過在類似民主的第三國家，甚至開發中的國家，權力仍然對一些將軍、或軍官有很大的誘惑力。

美國自獨立到現在已經過了二百多年。有人相信美國是充分民主的社會。其實你看傑克遜的遭遇，就會體會到，美國並不是民主的糖果，而只是一層民主的糖衣而已。他們冒生命危險，自封建的英國，到了新大陸。究竟人還是自我中心的嬰兒時代。所以猶太人的種族偏見，抓著了大眾傳播、金融及一部分的學術機構。選民意識仍是會像世人所怕的AIDS，悄悄地在白人心內搏動。就是比混混稍高一級的美國大兵，在馬路上走路時，那腳步仍似一百多年前，英國的艦隊攻廣東、舟山、長江時不可一世的傲態。

雖然美國自一九七〇年代已經悄悄地沒落，如波爾戰爭後的大英帝國。不過借用吉朋斯的說法：「然而羅馬帝國自走上衰亡，他還是經了三百多年。」美國的衰亡仍是要走半世紀吧。客觀地來說，美國是在錯誤的地點打了錯誤的戰爭，不過就韓戰來說，比越戰是光榮了一些。國內沒有忒多的反戰的年輕人，國外沒有那麼多上了毒癮的大兵。而且，南韓仍為美國的前哨，而且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雖然自李承晚離國以後，依然是一批又一批的將軍，掌握著權力，雖然它所承受的反抗的風暴已經日甚一日。 >> 待續

從文學看 二二八真相

■曾健民

就像往年一樣，每逢選舉季節，二二八事件就會被拿來炒作一遍，同時台灣社會的感情也會被撕裂一遍。如今，二二八事件已經脫離了歷史的真實、被片面渲染成中國人壓迫台灣人或者外省人欺負本省人這樣的歷史形象，不但傷害了台灣社會內部的和氣也阻礙了民族的團結。實際上，二二八事件是一個複雜的歷史事件，有許多歷史的面像，在今天，如何公正地釐清歷史的真正面貌，客觀地呈現複雜的、多面的原貌，我想是撫平歷史的二度傷痕的重要途徑之一。

我與藍博洲和日本學者橫地剛先生三人，經過長期的研究調查出土了許多二二八事件當時的文學作品，都是第一手資料，因此共同合編了《文學二二八》，將由台灣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這本書以文學的形象呈現了二二八事件的多種面貌，也活生生地表達了二二八事件中作家的激動和複雜的感情。我們先選了其中有代表性的兩篇散文，一篇是夢周的〈難忘的日子！〉，另一篇是雷石榆的〈沉默的發聲〉，透過這兩篇散文，應該會使讀者體會到另一種二二八的真相。 〈二〇〇四年二月十八日〉◎

關於夢周

——曾健民

夢周原名楊思鐸，1925年生，福建省晉江人。台灣光復初期，他於1946年底到台灣，在當時的文化界、文學界十分活躍，曾經在《台灣文化》、《新生報》、《中華日報》、《自強日報》等報刊上，發表了數十篇文章。這篇〈難忘的日子〉，是他經歷了二二八事件後不久，以他沈重的心情寫下給一個在事件中不幸遇難的外省青年人的輓歌，描寫了二二八的另一個面相，讀後使人從偏狹的悲情中獲得釋放。夢周於1948年離開台灣回到福建，致此長期消失在歷史的迷霧中，經過我們與廈大台研所的朱雙一教授的共同努力，終於找到了他，現在他還在故鄉晉江。

《中華日報》「海風」副刊第153期1947年4月11日

難忘的日子！

夢周 / 我將寫出現在心底的憤恨和悲哀，就憑著一枝禿筆。

至少到現在我還不曾寫過哀悼一類的文章，這也許因為我的懶散吧。一個人的生死本不算怎麼一宗大事，原亦死的是偉人或名人，可是這些人畢竟是罕有的，生前默默無聞，死後冷冷靜靜的鄰居著絕大多數。在茫茫的人海中，生與死還不是像一個泡沫的起滅麼，談得什麼哀悼，值得什麼追懷，一堆黃土，成了長眠地，與這個世界再也不會發生什麼關係了。他的親友們在揩乾了眼淚之後，僅存的幻影也會在歲月的洪爐中溶化的。宗教家說什麼天堂地獄，孔夫子也說過若教之鬼餒面，這更是縹渺而又縹渺的幻想，可以說根本就沒有這回事，人們的祭祀供奉，無非聊盡人事，一方面也因食指動故意找個藉口出來的。

我本想不寫這類文章，因為它無補於事，然而到了今天，都如哽在喉非吐出來不可。無形中好似有一種力量抓住我的禿筆，不由我自主的塗了下去——

是一個爽朗的日子，陽光照滿了狹窄的宿舍，溫暖而輕柔。昨天的淒風苦雨所留下的鬱悶，都一掃而空，然而留在人們心上的恐怖分量都益發加重了，我們祇能在門縫中偷窺一角的天空，而且時時得提心吊膽準備著厄運的來襲。這時，突然地在我身旁發現一絲微弱的歎息，但數面又激昂起來，好似要衝破那扇小門飛出去，那是在絕望中隱伏著希望的聲音：「太陽出來了，但光明不是我們的，我們要睡了。」

我認得這聲音是出自誰口中了，他是個劇迷，天天背誦著爛熟的臺詞，差不多同吃飯一樣平常，但都沒有能像今天這樣的激動每個人的心弦。誠然，我們的自由是喪失了，恐怖的黑手在背後騷動著，說不定在什麼時候災難就會從頭上壓下來，輕輕地攫取你的生命。風搖撼著門窗，我們會突然戰慄起來，遠處有人在叫喊著，每個人的臉色霎時變白，假如有一兩聲鎗聲，大家就恨無地洞可鑽。我們是過著灰色的，沒有生氣的日子。

我們雖然戰戰惶惶，連香煙的煙霧都不給飛出門外，可是那些「英雄好漢」，偏不放過我們這些手無寸鐵的弱者，轟隆一聲，門打破了，異國的言語攪亂了每個人的神經，幸虧後門救了我們的命，然而，日本刀終於刺進一個的胸膛，早晨還背誦著臺詞的黃仲光，用他的鮮血染紅了那把長的刀。

當我們聽到這個噩耗時，大家只好把眼淚吞進肚子裡去，這比哭還難受，緊張的恐怖，使我們暫時忘記了憤怒和哀傷，我們不敢作聲，即使是一動也不敢，雖然我們已躲進半安全地帶了，一個長方形的閣樓，灰塵凝結著蜘蛛網，陽光照不到的地方，是那麼

污穢，黑暗，這是十八世紀的監牢嗎，然而我們共住了三天呢。

據說仲光的屍首停在大道旁，起初還在血泊中抽搐，不到一小時就斷了氣，圍觀的人可不少，奇怪的是大家皆抱著看熱鬧的心理，賞鑒一湧走散了，就連宿舍的一個娘姨也只敢在旁邊偷覷了一眼走開，適度的恐怖使人失去了同情心，甚至於不當作一會事了。

他死時還祇有二十歲，少年英俊，抱著一腔熱誠渡過大海來工作，想不到因此送了命，本來在這個時代，何時何地不可以死，然而不死於兵荒馬亂的抗戰，而死於不明不白之中，那就太冤枉了。這是命運注定麼，是的，有幾位專門喜歡在事後說些不負責任的風涼話的人，都說他是該死，不該死為什麼別人逃得脫而他不能倖免？死人是不會說話的，他不會再起來大聲的辯論了，可憐！他死了之後還要給人議論一通，默默地任憑識相學家和命運學家大發其辯證式的言論，藉死屍來表示自己的高明和乖覺，人世間類此的儘多。嗚呼！

他生前默默地工作，而後又無聲地死去，不是有地位的人，追悼會是開不成的，一個芝麻大的低級委任公務員，有什麼言行足資追念，他的死，一掬同情之淚的並不多，經過事變之後，不知怎的，大家的心腸都像鐵石般硬了，我卻爲了中國失去一個有爲的青年而傷心，這傷心不是徒然的，他還虛心，肯接受人家的批判，而且好學，倒是可造就的人才，前月他曾在一個報紙的副刊上刊了他的處女作——爲民請命，這是因爲受到我的鼓勵，他還擔心登不出來，要我寫信紹介，我以爲來日方長，不斷努力下去，總有光明的日子，勸他不必醉心於「發表慾」，慢慢埋頭幹下去，年紀還輕呢，誰知道他竟來不及寫第二篇，就與世長辭了，一個青年文藝學徒的命運如此，又豈僅是我一個人的傷心？

難忘的日子過去了，或許在歲月的磨抹中，它會漸漸湮沒的，可是我永遠不會忘記三月二日早晨那微弱而含蓄著哀傷的歎息——

「太陽出來了，但光明不是我們的，我們要睡了」。

我將避免再看「日出」，因為它會勾起我的憤恨和悲哀，使我想起可怕的日子來。

(四月三日於臺北) ◎

關於雷石榆與〈沉默的發聲〉

藍博洲

雷石榆 (1911-1996)，原名雷社穩，廣東台山人，1933年留學日本。1934年至1935年間，參加日本左翼詩歌運動；與日本左翼作家森山啓、德永直等共同反對侵略戰爭。同一時期，先後主編東京左聯刊物《東流》與《詩歌》；還經常用中文和日文為《台灣文藝》撰稿，強調繼承五四新文學的現實主義傳統；是直接參與日據時期台灣新文學運動的惟一大陸作家。1936年上半年回到上海，繼續從事左翼文學活動；在「國防文學」與「民族革命戰爭中的大眾文學」兩個口號論爭中，贊同「國防文學」口號，積極提倡「國防詩歌」；加入中國文藝家協會，並參與發起中國詩歌作者協會，擁護文藝界的抗日統一戰線。

1946年4月上旬，雷石榆從廈門到高雄，擔任《國聲報》主筆兼副主編；10月辭職北上，擔任台灣交響樂團編輯，並因此認識舞蹈家蔡瑞月。蔡瑞月把雷石榆「當作中國文化的化身」，從他那裡學到許多中國東西，於是答應了他的求婚。

然而，就在此時，二二八事件爆發。事變後，詩人和舞蹈家的婚事也因為先前的「省籍衝突」，遭到困難。

就在這「沉默得幾乎要窒息」的「清鄉」時期，詩人雷石榆除了在台大法學院授課之外，既「唱不出歌，也寫不出詩。」但是，向來主張「詩歌是警鐘，是喇叭，是戰鬥機，是機關槍」的詩人，終究無法讓自己「一直沉默下去」的！於是，他寫了〈沉默的發聲〉一文，在木刻家吳忠翰主編的《國聲報》「南光」副刊發表。

5月20日，詩人也在舞蹈家「經過幾個月的家庭爭論」之後，在台北完成終身大事，始後，詩人仍然「堅持文藝的戰鬥」；他與省內外的進步作家交往；參加許壽裳先生籌劃主持，台灣文化協進會主辦的「中國現代文學講座」，宣揚繼承「五四」精神；向台灣青年介紹魯迅及其著作；同時也參與《新生報》「橋」副刊所展開的，一場持續半年多的，關於「如何建設台灣新文學」的論爭，並在爭論中第一個把馬克思主義的新寫實主義論引進台灣，鼓勵台灣作家奮勇前進。

1949年6月1日，雷石榆終因不被當局所容，遭到秘密逮捕，並於9月初驅逐出境；之後，蔡瑞月也被捕，繫獄三年。一個幸福美滿的藝術家庭，因此破碎不堪！

延伸閱讀

1. 《台灣的舞蹈先知——蔡瑞月口述歷史》，台北，文建會，1998年4月
2. 藍博洲：〈放逐詩人雷石榆〉，收入《消失在歷史迷霧中的作家身影》，聯合文學，2001年8月，頁157-236。

沉·默·的·發·聲

雷石榆 / 這樣地沈默，沉默得幾乎要窒息。我唱不出歌，也寫不出詩。我每天照例對那些大學生做完了「講書經」回來，撫著空虛的心，呆在空虛的家裡，或疑慮一些行爲不明的朋友成了什麼結果，或什麼影響；或計算著殘餘的米炭油鹽還可以續持幾天，因為一切物價和社會秩序恢復成反比例，幾何級數的指數，益使神經尖銳化了；或等待清查戶口快完結，身份証領到手，可以自由走動走動。有時悶得無聊，提出收藏了很久的顏色和畫筆，對靜物亂塗起來，正如不開朗的心，一片模模糊糊一樣，鈍感於光暗與著色。暮暮的「寶島」啊！正是最美麗的季節，但我卻感不到色彩與香氣，暴風雨劇大變亂之後的今日，人們的心理還是顫慄於血腥嗎？

一位戲劇的前輩由滬來信問我有沒有寫出紀念的史詩。我凝視這句子很久，幻覺不出一點兒能夠寫史詩的天才，雖然真是值得紀念的一樁大事件，不必用史詩，就是用報告文學也好，但事實上連最普通的新聞紀事也喚不起我的熱情，我好像是麻木了。而且回想一下：幾乎三個月來，我沒有寫過一點兒東西，無論誰慫恿或催促，我的心依然是空白，不是證明我麻了嗎？我來了臺灣已一年了，我到底做過一點兒什麼於人有益於自己也聊以自慰的事呢？自從我的筆開始換稿費起，已經搖了十四五年了吧？搖來搖去，不是一樣飄流，一樣貧困，一樣孤獨與苦惱？僅可倖免的是沒有闖出亂子，如是而已。

雖然如是而已，但筆對於人生總覺得有不可思議的需要，好比瞎子的荷馬，謠唱他

的史詩，是他的生活的唯一的泉源一樣。是的，我們這時代，這事件，也該算成史詩吧？但卻不是我的筆所能寫得出來的。

我習慣於思考代替眼淚，沉默代替說教。人類不是撲燈蛾，第一步經驗是第二步跨出的教訓。盲目的犧牲也許可看作個體的勇敢，但在社會性上卻是錯誤的損失。世界上最慘痛的事是把同類的血肉當作刀板上的材料，同樣最愚蠢的事是不知道什麼是愛和恨的泉源及其發洩的目標。更愚蠢的是以為南柯的夢是現實，而且以為現實總是永遠的。

我是在大不幸中的幸免者，當時不感覺害怕，因為我沒有踏過鐵棒刀槍下的血泊；事後也不感到竊喜，因為自己生命的存在也一樣平凡。

暴風雨的「寶島」，該是漸漸平靜了，但如果連人們的心也平靜得像死水，那是危險的。一個園圃的整潔，秀美而有生氣，不是單單因為沒有害蟲的存在，而更重要的是有充分的肥料和陽光以及輕鬆的風吹。被罩在溫床裡的芽苗是安全的吧？但卻不能永遠在那裡成長。

人類像溫床裡的芽苗是命運的悲劇。

我們沉默著，一直沉默著，是和那種命運相同的。正是萬物欣欣向榮的時節的這寶島，經過人為的暴風雨之後，難道我們一直沉默下去，和萬物作相反的對比嗎？

作為人類心靈的陽光的文化，該在我們社會生活與社會建設的全基礎上發射熱氣，在新生的氛圍氣裡，也許我在無數人活躍歡欣的臉上，看見我的沉默在那裡消失……

三六，四，十九，夜◎

幾句話 /

Eman, Lacaba 菲律賓革命詩人。

Eman，短短的一生，才活了27歲。用天妒英才這樣的修辭來形容他，絕對只能滿足布爾喬亞心態的作崇，1974年，25歲，他前往監獄探望服政治刑的兄長，與他道別。從此遠赴明答那峨島參與新人民軍……。當他拿起槍桿，展開武裝鬥爭的前後，他的詩風由詭異，神秘轉而成平白、易懂中融合高度的隱喻……。此後，死亡經常成為詩中的意象……。打游擊的日子裡，一紙難求，便在錫泊紙背寫下一行又一行的詩句關於人的解放和自已的死亡的詩……。最後，他嘴裡含著背叛者的槍管……。在「轟」中結束紅色的青春，僅留一本，死難後，他的兄長上下求索為他編輯而成的詩集：「救難詩選」。

革命詩抄

譯 ■ 鍾喬

人民的戰士是個體育健將；
是登山隊員，並不因山在那裡，
而是群眾在那裡。

他是個特技演員：平衡自己
於橫跨河流的倒落樹幹上，
於危及生命的駭人瀑布中，
他像個走鋼索的舞者。

人民的戰士是個演員：在革命的
舞台上，一個誠摯的演員，對於群眾
是頂尖的評論家，能辨讀臉孔與身體，
並且察知你述說真理，或只是玩笑。
人民的戰士，喔！對了，是個喜劇演員：
讓群眾看清矛盾，看清他們處境的嘲弄。
衝突，有關血汗之軀的被宰制者，以及，
食髓知味，坐享轎車、辦公室和大理石
馬桶的宰制者。人民的戰士，
鼓舞群眾欣然赴戰地，帶著決心；
他扮丑角，讓群眾舒坦底與他相隨，
他置身其間，他為民眾……。為首度
武裝的人民戰士。從無辱責。

人民的戰士

Eman Lacaba

致菲律賓藝術家的公開信

詩人必須同時學習如何帶動攻伐

胡志明

1.

路在陌生人面前隱了形；
急躁的腳趾在巨岩上留下英吋寬的印子，
至於，自由的手掌緊握著枝椏。
要不然，便一頭栽倒於石塊下。
瞬間，死亡的瀑布，快速底
染紅了水牛的頭蓋骨。

然則，病人引路而群眾做導師：
關於四十座大山和百川；
關於犁田、耕種、除草，以及收成；
關於數以「打」計的方言，讓
互相標榜的外來舌頭，相形見絀。
我們必須消除自身的布爾喬亞根源。

May 1, 1975

2.

我年輕時的伙伴，你想知道
撒野而害羞的年少詩人，在寫過
最後緊接著最後的詩之後，改變多少；
你聽說了，他像泥土一般黝黑，
赤著腳、綁頭巾、繫上腰刀，
他的筆，鼓漲成長槍：
深深的掙扎改變著內心。
像剝去椰子的殼一般，
他去除了數億層的自私。
或者，像傳說中的鳥，學習
關住自己的慾求。唯有
火熱和歌聲，在胸膛之間。

現在，貧血的原因是睡眠不足，
而非波西米亞的日子，文化，
總的說來，是為了人民。

他融鑄隱喻，但更多，
是為親筆提升幾何記憶般的山：
並非因為山在那裡，而是由於
群眾在那裡。曲徑如拼圖，
他須將之拼妥。
儘管，人們稱他是棕膚色的Rimbaud〔註〕
他不是強盜而是人民的戰士。

November, 1975

註： Rimbaud，法國象徵派詩人

3.

我們沒有部落但部落全屬於我們
我們沒有家園但家園全屬於我們
我們沒有名字但名字全屬於我們
面對法西斯，我們是蒙面的敵人，
趁夜色，如義賊般抵達，是死亡天使：
是移動的芒光，風暴的神秘之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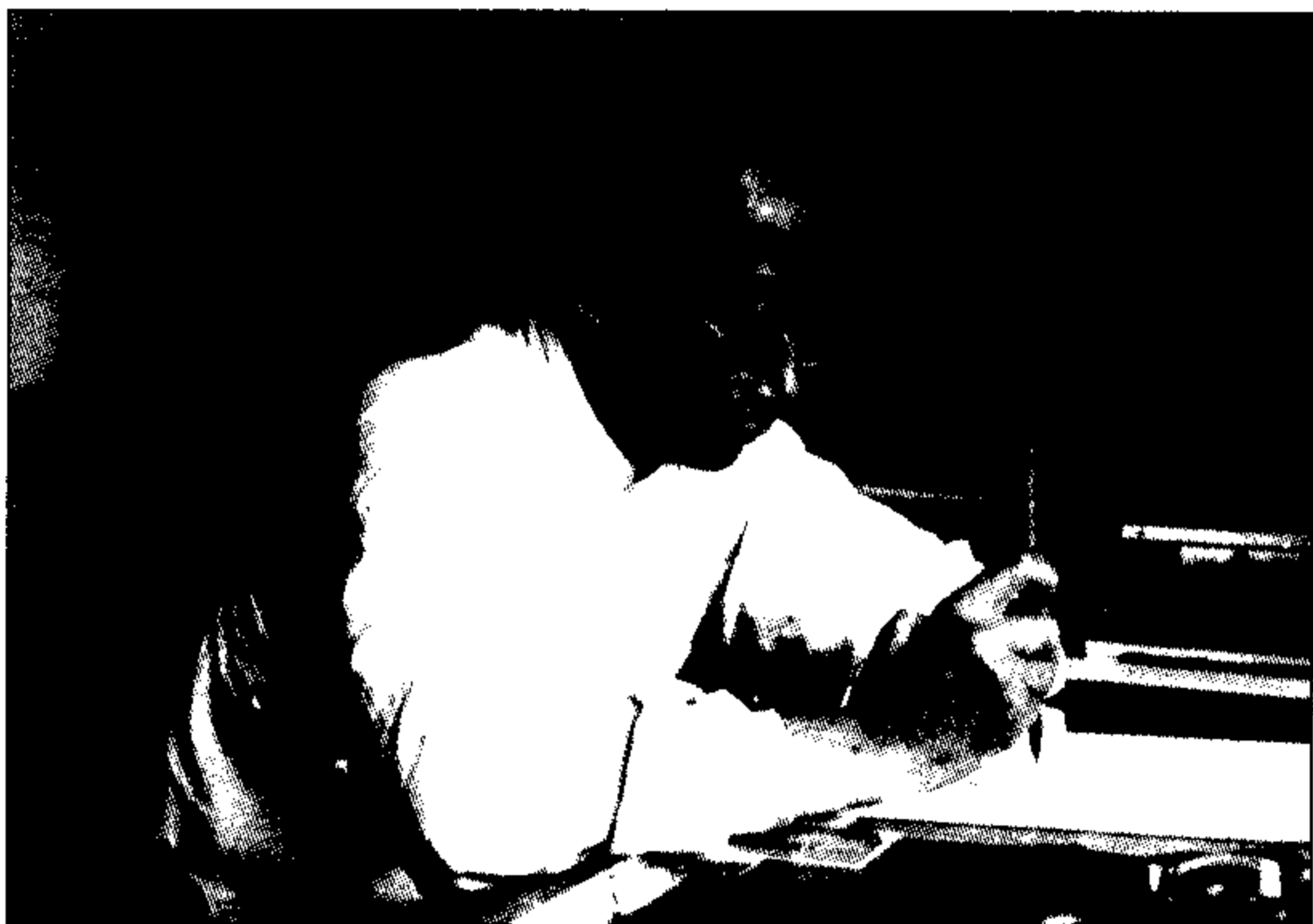
這讓一切不同凡響：
荒野中的赤腳軍伍，我們
得及時趕上，醒來的群眾是
彌撒亞。
在農民與工人之間，我們
失落的世代找到了真理。
是唯一的家。

January, 1976

我們的路途仍迢遙——

2004寒天重讀Eman作

葉榮鐘先生(1900-1978)，字少奇，
台灣省彰化縣鹿港人，
日據時期樂社成員，
台灣文化協會重要幹部，
「台灣地方自治聯盟」書記長，
「台灣新民報」資深記者。



葉榮鐘 紀念圖書館



題織君柳陰双燕交舞刺繡圖 四月
衝風冒雨更何愁。祇願于飛到白頭。不羨紅樓
樓息穩。柳陰之舞月優遊。
雲海茫茫路幾十。南來辛苦合消憐。誰將玉剪
併裁卵。巧重前程萬里天。

閩中雜咏 六月
蓬萊本是揚州地。生活只堪時更苦。新雨狂瀾
誰可挽。忍收哀淚暫為收。
三上無以告可知。雄心未死淚空流。不羨蓬萊
那多事。日叫紅雲何處留。

白帳一川。十年。農中小時馬背錢。香即一車
過年。小翠米山。出
少年策動群臣任。悲悔花前曲久一場。何必千金
錢買醉。苦莫香流印世神。



光復之初任「歡迎國民政府
籌備委員會」總幹事，
策劃「台中圖書館」文化活動，
參加「光復致敬團」。
二二八事件中，參與「台中地區
時局處理委員會」等工作。
二二八事件後，任職彰化銀行，
基本上退出政治活動。

http://www.lib.nthu.edu.tw/resources/jcyeh_memorial/index.htm

晚年專心撰述，著有
《台灣民族運動史》、
《台灣人物群像》等書，
現有《葉榮鐘全集》行於世。

《新二二八史像》 編著◎曾健民 / 定價NT350

80篇歷史證書

首次大量出土新史料；事件當時大陸、香港報刊雜誌上的二二八評論、報導，以及詩、小說、創作

有初次公開的第一手史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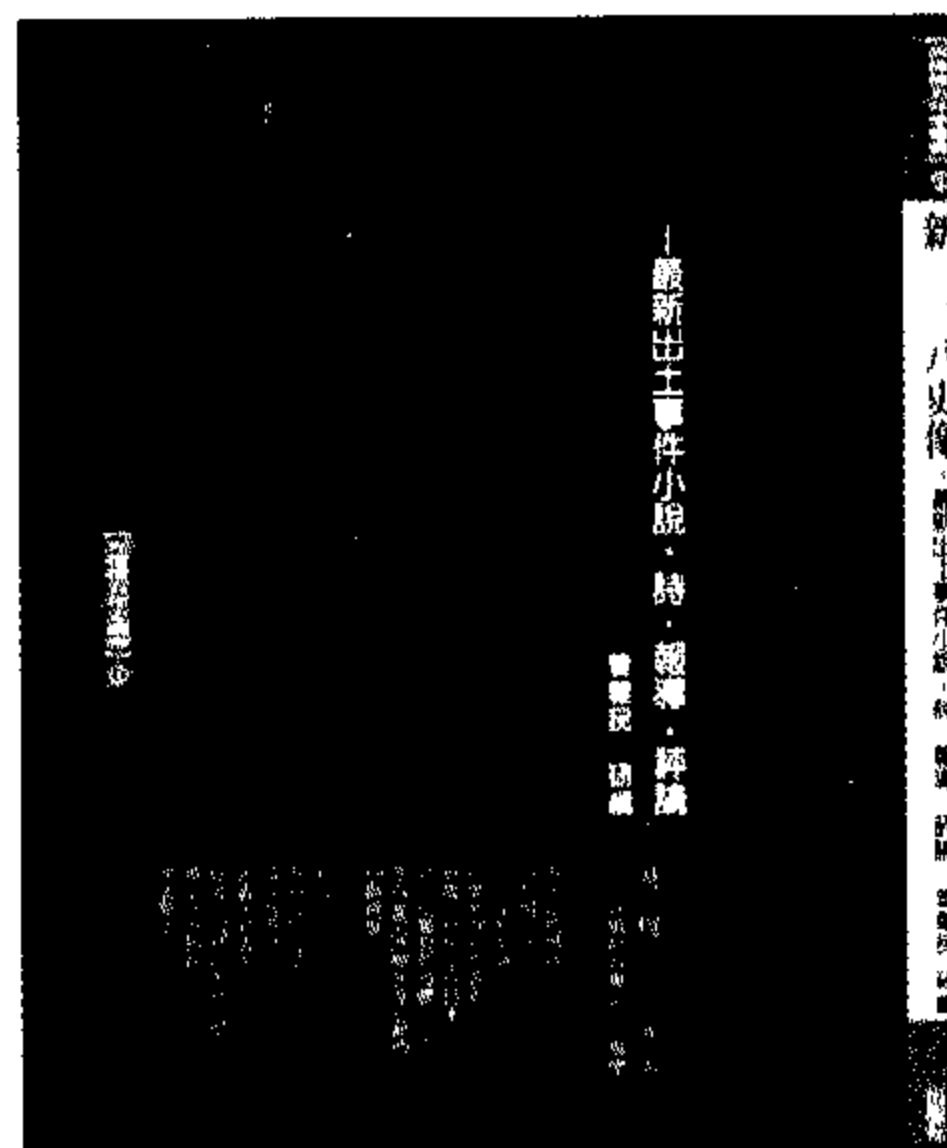
二二八女鬥士謝雪紅《告同胞書》

名記者范泉《記台灣的憤怒》

文匯報記者董明德《孤島一月記》

蘇新的《台灣的前途》

名作家郭沫若的《還要警惕著不流血的二二八！》



《天黑黑嘜落雨》◎詹朝立 / 定價NT350

——十二萬農漁民大遊行傳真

「1123·與農共生」大遊行總指揮詹朝立親筆力作

文化評論家南方朔推薦：

「這本著作，所記述的不只是一次大遊行的因果經緯而已，更是當今台灣農漁民和農漁會艱苦情況的紀實報告，充滿了理解與悲憫的抗議情懷。」



《文學二二八》◎曾建民等合編 / 定價NT400

《文學二二八》，將由台灣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這本書以文學的形象呈現了二二八事件的多種面貌，也活生生地表達了二二八事件中作家的激動和複雜的感情。



直接訂購 優待

郵政劃撥 / 19747069

■電話 / (02)87714051 ■傳真 / (02)87713801 ■電郵 / tssra@sinamail.com

■地址 / 台北市敦化南路一段238巷2號2F

台灣戰後資本主義論 / 台灣社會性質論名著

□涂照彥

《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 四八〇元

從日帝獨佔資本與以地主、佃農制為主軸的本地資本間之矛盾，解明殖民地台灣經濟形成的過程與本質……

□劉進慶

《台灣戰後經濟分析》 三五〇元

從「公業」、「私業」雙重構造，官商資本的支配，對美日經濟的附從化剖析台灣戰後資本主義（一九四五～一九六五）的性質與構造……

□段承璞

《台灣戰後經濟》 三五〇元

探討台灣戰後資本主義（一九四五～一九八五）中官僚資本、集團企業資本，僑資、外資、中小企業資本，分析台灣外貿與產業構造的變貌……

□谷浦孝雄

《國際加工基地的形成》 二五〇元

以六〇年代後高度成長的構造為焦點，解明做為美、日中心國家加工基地而發展的台灣戰後資本主義之結構……

□陳玉璽

《台灣的依附型發展》 二四〇元

分析深層結構轉化及帝國主義體系功能變遷，以解明台灣戰後資本主義發展之機序，並批判地探討經濟發展與政治發展的相應性……

□隅谷三喜男 / 涂照彥 / 劉進慶

《台灣之經濟》 三六〇元

刻劃台灣「獨裁下的成長」和民間經濟向海外擴展的勢頭。從農業、工業、勞動、金融財政、貿易和經濟體質，解明台灣戰後資本主義的實相。

□Winekler等編

《台灣政治經濟學諸論辯析》 三八〇元

以西方當代保守派的、自由派的和激進派的社會發展理論，分析台灣資本主義的本質和結構，並交互進行各派分析之分析，檢視三派政治經濟學在台灣研究上的貢獻和極限。著名社會學者，除編者外，R. E. Barret、T. Gold、D. F. Simon之台灣資本主義論的總匯，向台灣在地社會學界提出無從迴避的詰問……

■杜繼平

《階級·民族與統獨爭議》 三八〇元

——統獨左右的上下求索

台灣戰後世代第一個接受完整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教育的學者杜繼平，在科學對待當前大陸社會主義性質的基礎上，闡明當前台灣左翼應以克服民族在外力干涉下的分裂構造，追求祖國統一，並從世界資本主義體系揭發台獨運動的本質，批判郎中「左」派陳芳明知識上的荒疏，振臂呼喊「做一個理直氣壯的統一派」……

/ 本書要目 /

1. 從世界體系的觀點看台獨運動的過去與未來
2. 統獨左右問題的上下求索
3. 跳蚤「左派」的滿紙荒唐言
——評陳芳明的所謂左翼台灣史觀
4. 做一個理直氣壯的左翼統一派
5. 從《台灣論》風波剖視台灣分離主義的奴才意識

凡 可享有以上書籍 優惠，郵撥時
請填上訂戶編號。若須 則加收。

出版社
郵撥帳號：一一七四六四七三 / 電話（〇二）二三二二二三五七